三百年来伤国乱

庄秋水 作品

晚清至民国中国记忆

重温300年来
兴衰变乱荣辱悲欢锻造的中国记忆
再现大变革时代
奇人奇事背后蕴藏的激荡与抗争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当我呼吸，

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

卑湿的草原，

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

多少欢欣，忧郁，澎湃的乐声，

随着红的，绿的，天蓝色的水，

向远方的

山谷，森林，荒漠里消溶。

——穆旦

上架建议◎近现代史通俗读物

ISBN 978-7-5404-5065-6

百年来伤国乱

庄秋水

三百年来伤国乱：晚清至民国中国记忆 / 庄秋水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04-5065-6

Ⅰ. ①三…　Ⅱ. ①庄…　Ⅲ. ①中国历史—近现代—通俗读物
Ⅳ. ① 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0901 号

上架建议：近现代史通俗读物

三百年来伤国乱：晚清至民国中国记忆

作　　者： 庄秋水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伍　志
策划编辑： 张　丽
版式设计： 付　莉
封面设计： 大观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70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065-6
定　　价： 36.00 元

序 在历史中生活

身陷繁忙生活的大多数人很容易感觉到自己和历史的距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心灵深处的记忆，所有那些叹息和欢笑，均将成为历史。而在历史学家约翰·托兰眼中，普通人刻骨铭心的东西与重大事件的真相及来龙去脉，一起融合成历史。

如果我们以同理心，以温情和敬意去打量、欣赏过去的每个角落，去发现历史创造背后那些令人惊叹与神秘之处，即便在那些疏远和陌生的时代，仍然可以以一颗活泼泼的心与历史人物相会。

如果我们可以把许多历史成见搁置一旁，追求一种不被偏见沾染的历史，我们就不是去研究历史，而是“在历史中生活”。在覆盖着灰尘的档案史料背后，重新捕捉过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

毫无疑问，在历史探索中，我们自有本能的道德感和评判立场，这是一种更加真挚和内在的立场。史景迁为了探寻雍正朝曾静投书一案，于两百多年后亲自抵达永兴县的北边，

他说："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最切近地感受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这种因历史探索而产生的情感，把我们和历史人物连接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梦想和共同的情感体验。

历史将帮助我们洞察现在，这是了解任何一个文化或了解我们自己的终南捷径。过去的每一天终将成为历史，不管是18世纪的大清皇帝，还是20世纪的投敌文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最终委身黄土，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串串名字中的一个。此种不可逆转的结局，让我们可以越过时间和偏见造成的隔阂，去探寻他们的故事，体贴他们的情感，重新组织一段被历史因果和必然规律解释得支离破碎的人生。

尤其是现在，在通往新秩序扑朔迷离的道路上，在崩溃和重构的过程中，有了和历史的对话、参与，或许我们能够抑制内心深处的躁动，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此时此刻的位置，去敏锐地理解我们的未来。

这些文章是我过去两年多沉湎于"历史侦察学"的结果，当我按时间序重新排列后，发现它们无意中贯穿了近现代中国。"一个完美的历史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以装饰他的叙事"，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 *Essay on History* 一文里说，"并使之构成画面"。

对，画面，这正是我试图安置这些不同立场的历史人物之所在。历史的过程是行动的过程，行动编织了画面。我选择他们，因为我以为真正的历史故事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

第一辑
帝国的回响

帝国的荣耀　002

18世纪的乾隆皇帝，堪称一位地道的“中国控”，他把历史上最华丽的陈词滥调和一座最美丽的园林，毫不谦逊地送给自己和中华帝国。

江湖的崛起　015

18世纪的中国，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生机蓬勃的文明国度。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盛世”下，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和商业扩展渐渐引出了一个“游民社会”——帝国的城镇到处是四处游荡的陌生人。当年的郑开是否就经常面朝大海，等候一个勃发的时机呢?

上帝的中国之子　029

如果他的运气足够好，如果批卷的考官稍稍松一点，如果他不是自视甚高到了偏执的地步，也许洪秀全走的就会是另外一种人生之路。他也许会一直都是孔夫子的忠实信徒，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19世纪中期那个最为奇异而荒诞的事件了。

绿金诱惑　042
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就立志到长满茶树的中国去传教，去解救那些可怜的、不信上帝的采茶人。

秋风宝剑孤臣泪　055
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却不是可以造时势的英雄。

始于荣华，终于憔悴　076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帝王们对于过去繁华的回忆往往更能博得普通人的一掬眼泪。追究起来，不过是繁华事散，更显出无比的凄凉，两相对照，自然令破败也闪闪发光。

慈禧的选择　087
1900年，世纪之交，内外交困衰败不堪的大清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而危险：那些来自于华北平原，被饥饿和绝望驱使着的农民，喧嚷着进入了北京城；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军队亦已开进了与皇宫相距不远的东交民巷。帝国朝廷里吵吵嚷嚷，臣子们分成了两派。剿除，还是抚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慈禧太后的面前。

疾风中的白露　102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黄河终将入海　115
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人，奉命拟制海军规划。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在错过了太多机遇之后，从海防到海权，中国人的海洋意识逐渐走入了现代。

1910，紫禁城的黄昏　131
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1910年的中枢政局。但横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党争阴云和日益激进的立宪派。

第二辑
民国人与事

谣言与革命　146
1911年，但凡头脑清醒之人，都明白迟早有一天，一场大规模起义将在中国发生。至于起义将发生于何时何地，则无人可以准确预测。

我以我血荐轩辕　156
这是甲午战争之后被逼到边缘的中国精英打造、实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他们开始在自身文化系统内寻求文化自主和政治独立的可能性，他们力图以世界化的标准来改造中国。

法与刀　168
在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段祺瑞的最后十年　182
这个北洋政坛的大佬，几度沉浮，三造共和，事功不可谓不大。然而，1926年3月18日执政府前淋漓的鲜血，被文学家鲁迅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晕染开去，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事迹不凡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摄魂者　195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为最有效的报复手段。

一个革命者的自白　207
“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诉，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

归来，司徒雷登！　221
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青灯坐时细论文——萧红在青岛　232
“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不仅仅是那个大时代中民族的悲剧，也是一个柔软女性试图精神突围却最终失败的悲剧。

胡兰成：人如乱世　239
于性命家国大事，他待之如云影水流、风吹花开。虽说举重可以若轻，然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到底不是真轻，历史自有其沉重分量。

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254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帝国的回响

第一辑

帝国的荣耀

主要人物：乾隆皇帝（1711—1799）

18 世纪的乾隆皇帝，堪称一位地道的“中国控”，他把历史上最华丽的陈词滥调和一座最美丽的园林，毫不谦逊地送给自己和中华帝国。

1736 年 11 月，宫廷画师郎世宁接到了皇帝的一份圣旨。继位不久的乾隆命令中西画师们协作画一张圆明园的全景图。一年多后，郎世宁与其他几位宫廷画师唐岱、孙祜、沈源绘制的《圆明园全图》完工，被张贴在园内“九洲清晏”景区西一路第二进殿的清晖阁内。

这座北京城西郊的美丽园林，自 1725 年成为皇帝的离宫以来，不断被修葺、扩建，最终成为帝国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帝王乐土

自从 1714 年以传教士身份离开欧洲来到东方，郎世宁已经服务了三代帝国君主。很少有人还记得他的意大利名

字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与他的耶稣会前辈们一样，郎世宁很努力地融入他传教的这个国家，甚至学会了用毛笔作画。他在康熙朝资历尚浅，到了雍正朝就已经是宫廷最出色的艺术家之一。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显示，这位洋大人经常被皇帝和亲王们召去，对着臣子孝敬的两个哈密瓜或一只暹罗国进贡的狗鹿画静物画。有时，皇帝会挑剔他画的小狗尾巴上的毛太短，身子也不够伟岸，要求他照样再画上一张。不过，显然他已经得到皇帝和贵族们的充分信任，还奉命向中国画家传授欧洲绘画技法。他还和中国学者一道完成了一部绘画方面的著作《视学》，专门介绍欧洲焦点透视绘画。

两年前，郎世宁曾为当时还是皇子的宝亲王弘历画了一幅《采芝图》。这幅肖像画颇具欧洲素描的特色，人物面部用浓淡不一的墨色渲染，线条痕迹浑然不露。图中年轻的皇子穿戴着汉式衣冠，右手持如意，左手扶着一只梅花鹿，一个便装少年肩扛小锄、手提花篮，相随在侧。他还要为喜欢欧洲绘画风格的乾隆画更多的肖像画，但此时，他要全神贯注于圆明园的修建工作。

新皇帝对圆明园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二十五日，12岁的未来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祖父，那是一次决定大清国未来的相会。据说，这是四皇子胤禛的手笔，正是他安排了这次祖孙三代在圆明园牡丹台的相会。时年，康熙69岁，未来的雍正皇帝45岁。

康熙特别喜欢这个孙子的机敏聪慧，他当面对儿媳说，

她生出这样一个好儿子，是有福之人。12 岁的弘历从此得以在祖父身边，陪伴他度过最后半年的时光。历史上一直盛传：康熙是因为喜欢弘历，才把帝位传给雍正这一系。登上帝位之后，弘历给牡丹台题写了一块匾额“纪恩堂”，隐约印证了他对那次牡丹台相会的深远情怀。

15 岁时，弘历住进了圆明园后湖西北角的桃花坞。这处景点来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弘历住的地方名叫“桃花深处”。这位满族皇子酷爱汉语诗赋，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品诗堂”。

这时，圆明园规模还不到后来的三分之一。1709 年，康熙把它赐给了四皇子胤禛。当上皇帝的第二年，雍正便制定了圆明园扩建总体规划。次年，他首次驻跸圆明园，当年便有超过一半时间是在这座园子里度过的。另外，这位历史上以勤政著名的皇帝还下令增建了同乐园和买卖街。

每逢年节之际，皇帝、后妃和亲贵大臣们都要在同乐园陪皇帝看戏，以示“满堂怡乐”。同乐园西侧的买卖街一年之中总要开上好几次，每到赶集之际，四五十家店铺开门做生意，凡是京城里的有名字号，在这里一个也不少。太监和宫女们扮做生意人和路人，高贵的皇帝也会亲自充当顾客，体验一下凡夫俗子的乐趣。

自然，其中也少不了务农的乐趣。买卖街一侧便是小农庄，遍布田野、牧场和农舍，也有牛、犁及所有与农作有关的东西。太监们春种秋收，播种小麦、稻米、豆类和其他作物，到秋季收割，在打谷场上脱粒。他们模仿着帝

国从南到北每一个乡村朴实的生活方式：两千年来，成千上万胼手胝足的小农辗转沟壑，讴歌着三皇五帝的大同盛世。稻田旁边的敞厅叫做“西峰秀色”，因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日落西山的美景。敞厅后面的院落种了二十多株玉兰，每到暮春，玉兰盛开，芳香袭人，此情此景雍正皇帝最为钟爱。

在圆明园长大的弘历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之后，便迫切地想要扩建这所园林。他找的理由可谓无懈可击：帝王们在临朝视政的闲暇，需要一个游观旷览之地，这样的一个处所，可以颐养心性、陶冶情操。他的祖辈们选择了圆明园，是一块真正的天宝地灵之地，作为帝王行游之所，最为合适。从此，后世子孙便不必舍弃这个园林为重建苑囿而消耗民力。

最后，乾隆说，这正是他效法父亲勤俭知足美德的一片苦心。

中西合璧

乾隆有足够的底气扩建圆明园。此时，经过一百多年休养生息的承平时期，中国进入了唐宋以后的又一盛世：帝国版图辽阔，外蒙、内蒙、青海、西藏等地皆隶属于大清王朝；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

上，最多的一年达八千多万两，可谓空前罕有。

在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充满争议的研究中，他利用20世纪的数据，推算180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个人平均所得。在他的统计数字中，亚洲整体上比西欧略为落后，但领先于整个欧洲，而中国则一直领先于西欧。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通过考察农业、运输业，人的寿命、出生率，以及资本积累和技术，来比较1800年之前的欧洲和亚洲社会，以反驳主流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领先论”。

他的观点跳出了以西方扩张作为分析重点的单向视角：“即便到十八世纪末，许多欧洲以外的地区仍在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它们后来变得微不足道，并非必然……我们也不能假定欧洲以外区域的优势，仅是过去一度辉煌、现在却停滞不前的传统所残留下来的影响。十八世纪的亚洲固然并未出现如Joel Mokyr所谓的‘宏观性发明’（即自发的、突然改变生产可能的全新概念），但欧洲于1500—1750年间，甚至通常被认定为工业革命的时代（1750—1830），亦未出现此种发明。”

1743年，当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来到圆明园时，他惊诧于这座离宫的堂皇和魅力：“它由许多不同的建筑物组成，彼此被巨大的庭院、树林和花园分隔开来，非常对称，也很好看。所有这些建筑的正面，都用镀金材料、油漆和绘画装饰，闪闪发光。房间内部陈设和装饰了从中国、印

度甚至是欧洲，只要是能够得到的最美丽和最有价值的物品。”

一向喜好新奇玩意儿的乾隆，当然不满足于仅仅在圆明园的房间里陈设来自外国的物品。

他治理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帝国，在位期间六次南巡，并在圆明园中复制了他所钟爱的江南园林。1744 年，两位宫廷画家唐岱和沈源奉命完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图》。然而，皇帝的目光放之四海。他大概在郎世宁的绘画中见过西洋的宫殿和园林，因此要求郎世宁和王致诚在“圆明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建造一片西洋楼建筑群。他要在自己的离宫里也能见到巴洛克风格的西洋建筑和美丽的喷泉——中国式的凡尔赛宫。

1745 年，西洋楼开工。那时尚没有施工图样，郎世宁、王致诚和另一位精通数学、水力学的法国人蒋友仁共同绘制图样，由中国工匠施工。身为画家的郎世宁熟悉欧洲近代建筑，他钟意晚期巴洛克风格，努力把建筑的体量化整为零，并注意运用光影的效果。尽管这些建筑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洋的，但多少带一点中国味，它们用大理石和砖建成，以中国琉璃瓦覆顶。

1751 年完工的谐奇趣是最先建成的一处，它位于西洋楼景区的最西端。这座建筑是欧洲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常见的巴洛克风格，由主楼、前后喷泉和西北的蓄水楼组成。主体部分共有三层，两个带有围栏的拱廊伸向水塘，镶着装饰性的壁柱和高大窗户，石栏杆装饰以雕刻的西式

花纹。另外，主楼前还有一座大型海棠型喷水池。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知晓室内陈设亦是西式风格。

1750年农历五月，乾隆曾命令造办处将所需西洋物件开列清单，单列的大玻璃镜便用来作谐奇趣的装修和陈设；九月，由皇商范清注携带两万两白银赴西洋采办；十一月，乾隆更传旨把正楼平台上铜栏杆改作琉璃栏杆，水池泊岸上铜异兽交铸炉依照原样制作。可见，西洋楼的建筑是由郎世宁等人起草样稿，然后由皇帝拍板修筑。可以说，乾隆亲自参与了西洋楼的整体工程设计。

整个西洋楼最宏大的建筑是海晏堂。两层建筑共有34间，汉白玉阶梯直通二层，环抱着楼前大型喷水池。水从一个巨大的蓬壳里喷出，水池两侧各有六只兽首铸像，每隔两小时依次喷水一次，正午时，十二兽首会同时喷水。

这座建筑的主楼后面是“工字形”蓄水楼，中为蓄水池，全池用锡板焊接而成，东西蓄水楼内各有水井，里面是轧水机，用来为蓄水池注水。除了海晏堂的喷泉，东部的远瀛观、大水法的喷泉也是这里供水。蒋友仁为皇帝制作的提水机械，一直使用到1774年他去世时为止。

圆明园内的耶稣会士们希望通过艺术和科技的成就来影响皇帝，就像他们的前辈们所做的那样，然后让大清帝国皈依上帝。乾隆确实喜欢那些粗壮的壁柱和繁复的浮雕，还有那些贝壳形花饰和装饰性花坛。西洋楼的最东端，是七道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断墙。砖墙上，以一种假透视的画法绘制了郎世宁的故乡威尼斯的街景图，其中使用的

“线法画”得到皇帝的特别赞赏。

西洋楼室内陈设着西洋玻璃灯、西洋显微镜、西洋挂镜、西洋幔子、自动玩偶、摆钟和天球仪。蒋友仁常常被好奇的皇帝召见，当场演示那些机械玩意儿。他在写回欧洲的书信中描述道：“亚洲最有权力的中国皇帝虽然对欧洲所知不多，却显得颇为开放。”

皇帝问，在那些从欧洲带来的铜版画中，有些是在夸耀你们君主的胜利，他们是如何击退敌人才取得这些胜利的？在这些公侯中，难道没有一位能够维持和平吗？他又问这位法国教士，耶稣会能不能从欧洲把葡萄酒运来，能不能在中国酿造他们的酒，葡萄烈酒是不是比米谷烈酒更有益于健康等问题。

尽管当时的欧洲向往“东方情调”已有一个多世纪，欧洲贵族们也流行在自家的宅院和宫殿中仿造中式庭园，而这一切，大多只是基于他们从水手和传教士那里听到的关于中国的传奇碎片和所看到的工艺品。

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建筑师 1670 年便在凡尔赛宫里建造了瓷宫；18 世纪的头二十年，德国皇帝在易北河上的匹灵堡建造了几座中国式宫殿；1753 年，瑞典国王为庆祝王后生日也建造了一座中国式木构建筑；1765 年，普鲁士王子建造了八角形中国式阁楼。而第一本向西欧介绍中国建筑的著作《中国的庙宇、凉亭及牌坊建筑》也于 1750 年在伦敦出版，作者哈夫彭尼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建筑，1756 年再版时增加的图样也没有超出当时的《旅游行纪》所刊登

的中国风情画。

东西建筑风格交互影响，相较之下，圆明园西洋楼倒称得上真正的中西融会，真正的西洋风格，而欧洲的中国式建筑只能算是学习了中国风格的一鳞半爪。

彼时英国最重要的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曾经在广东居住过两年。他在 1757 年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装、器械及用品设计》一书，但他 1757—1763 年间为肯特公爵扩建蔻园时建造的八角形中国宝塔，却是十层，而中国宝塔层数一般均为单数。也就是说，中国建筑所包含的传统内涵，欧洲人无从领会，他们常常进行的“创造性”改动，让这些建筑犹如玩物。

怀柔远人

乾隆的个性一贯自信而骄傲，他的风格原就不像他的父祖那么质朴，而是崇尚浮华缛文。他对外来文化的接纳有着坚实的基础——他那伟大的离宫应有尽有，让外来者赞叹不已。王致诚如是慨叹：“这座乐园一定消耗了巨额资金。的确，没有哪个国家的君主能像中国皇帝那样，是这样巨大的一个国家的主人；或者能负担得起如此巨大的开支；或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1771 年三月，重修岱庙拆下的 14 根楠木被解送到了圆

明园。仅仅这一年，圆明、长春、熙春、绮春四园的添建工程便耗银33万余两。帝国的商人们也主动或被动地为皇家园林捐献巨资：1756年，两淮盐商程正可捐银100万两，其中25万两被拨给圆明园银库；次年，两淮盐商黄源德又捐了100万两，乾隆下令把其中的30万两用来修建圆明园。

“圆明”二字，“圆”是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则意味着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无缺。“圆明”二字，对这位承平皇帝而言，大概觉得妥帖至极。在他当政之时，尽管皇权已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仍要运用园林艺术手段，间接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思想。

圆明园的中心名为“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代表着“禹贡”九洲，象征国家的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的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其所处方位与紫、碧为名的含义，就是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疑是宇宙范围的缩影——在他手上，帝国臻于巅峰，他自己亦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控”。

除了用美丽的园林装点自己的帝国，这位虚荣的皇帝自我吹捧所用的华丽辞藻可能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宫廷。1760年，平定西陲后，乾隆亲自编写了昆曲《八佾舞虞庭》。此剧名源自《论语》中的“八佾舞于庭”，八佾舞则是宫廷专用的天子规格的军舞。因为舜帝曾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乾隆取名虞庭，当是以舜帝自居，那可是中国传统中的理想国。

晚年的乾隆再次摩挲着《采芝图》，他在上面题了一句诗“谁识当年真面貌”。是呀，当年谁晓得那个年轻的皇子，有一天会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建设成一个尧舜再世般的“桃花源”呢？此时，侍郎郎世宁早已在阜成门外的墓地里安息多年。圆明园内蒋友仁制造的水力机械也早就不能运转了——蒋友仁死后，太监们采用了最传统的方式——人工供水。每当皇帝要来看西洋楼时，他们就动用大批劳力，花几天工夫灌满巨大的储水池，当皇帝来看时，所有的喷泉就正常喷水了。

皇帝的个人爱好，并没有在民间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学习教育。而在 1750 年后，欧洲大部分技术和加速出现的各式发明突然出现，正得益于此前日渐兴起的科学教育。

也许，帝王的好奇只是一种游戏，而普遍的学习则事关尊严。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以满人而入主中原的帝国皇帝，较以往更加注重天朝的尊严，严守夷夏之防。西洋楼在长春园的最北端，一条东西横向的土岭把它和其他景区隔开，正如中央帝国之外，便皆为夷狄藩属。

1793 年 9 月 14 日，已届垂暮之年的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勋爵希望能说服大清皇帝通商，并在北京派驻使节。在上一年，刚接到英国国王将派使臣前来的奏报时，好大喜功的老皇帝欣喜万分。他亲自过问访问的细节，这次中西交流的相关文件竟有 783 件。

18 日当晚，乐工们为远道而来的使臣们表演了中国戏

曲，其中就有乾隆亲自编写的昆曲《四海升平》，这可是难得的殊荣。开场是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引领从仙楼出场。文昌帝的唱词，全是《尚书》、《诗经》、《论语》等经典中赞美上古圣贤帝王的文德武功之语，最后，他唱道："故有英咭唎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其国较之越裳，远隔数倍。或行数载，难抵中华。此番朝贡，自新正月启舶登程，六月已抵京畿矣。此皆圣天子，仁德格天，所以万灵效顺，非有神灵护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载之史策，诚为亘古未有之盛事也。"

戏中，星神和水怪大战，英国使团看得如坠五里雾中，出于良好的意愿，他们以为这是一出关于大地与海洋联姻的戏。其实，戏中已借文昌君之口说出了清廷的计划："英咭唎国贡使等，进表赐宴毕，不日赏赉遣还。"

所以，当马戛尔尼回到北京，被告知要立即离开中国时，他们完全被中国人搞得不知所措。学者叶晓青认为，乾隆的态度突然改变，是因为英国国王的礼品单太丰厚了，以至于"夺走了乾隆的优越感"。英国方面苦心挑选的代表欧洲最先进的科技和英国最精致的手工艺的厚礼，让自大的皇帝感到"远人"的强大。当英使提出所携带的部分礼品形制高大精密，安装便需要一个月，安装后不能再拆开，不宜长途运送时，乾隆大为不悦，命令把其中的八件分别放置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和长春园的澹怀堂。

他命令官员带英使去"瞻仰"圆明园之壮伟："该贡使从未观光上国，其前此向徵瑞称贡品高大原不免夸张其词。

兹金简（时为工部尚书）等带同在园瞻仰，伊一见天朝殿宇辉煌壮丽，即以为尽容全分安设。”或许，他是想给英使一个下马威——你们国家所有的我天朝皆有。此外，他还斥责接待官员——长芦盐政徵瑞没当过粤海关监督，没见过世面，这才被英国人吓住了。

然而，英国人肯定要让老皇帝失望了。马戛尔尼勋爵的秘书约翰·巴罗一直留在圆明园，他为此次的中国之行作了大量准备，还研读了钱伯斯等人的作品。显然，圆明园让他感到了些微失望：“我感到全园各部分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离威廉、钱伯斯爵士的那种富于幻想的和过分赞美的描述相差甚远……”

表面上对英国礼品等闲视之的乾隆，命令内务府为每件物品都配上了内衬黄缎的精美匣子。一年后，他还命令将之与最后一个荷兰使团带来的礼物相比较。沉浸在文德武功一统江山中的骄傲和自大，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其内心的真实愿望。

这些来自远洋的礼物要在六十多年后，英法联军焚毁、劫掠圆明园时，才再次为人所见。

江湖的崛起

主要人物：洪二和尚（？—1779）

18世纪的中国，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生机蓬勃的文明国度。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盛世”下，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和商业扩展渐渐引出了一个“游民社会”——帝国的城镇到处是游荡四方的陌生人。当年的郑开是否就经常面朝大海，等候一个勃发的时机呢？

追捕天地会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皇帝接到了一份奏折。

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请，他要亲自赴台湾镇压新近发生的民变。之前，闽浙总督已经调派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三千人马渡海平乱。此时，乾隆已经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和回部等内乱，这位皇帝正处于一个帝王所能达到的事业“顶峰”，对台湾小小的叛乱，他颇不以为然，“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因此，当福建巡抚徐嗣曾未同闽浙总督谘商，便命令闽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赴台，这种“越制”行为受到乾隆的严厉训斥。

然而，他未曾想到，水陆两路提督同时抵台平乱，竟然持续经年，任承恩和黄仕简因贻误军机被革职拿问。最

终，他不得不调陕甘总督福康安以“钦差协办大学士”身份，统领湖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号称十万（实际上为六万）大军，登台作战，这场耗费了一千万两白银军饷的战争方告终结。乾隆更不曾想到的是，在平乱过程中，官员们从被擒获的民变首领杨振国、林爽文和庄大田等人的供状里，第一次发现了“天地会”——如此这般的镀金时代，居然存在着一个不为官府所知的秘密社会，且已有二十多年之久！

台湾“林爽文事变”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的十一月，副元帅杨振国十二月便被俘获，正是他的交代让天地会浮出水面：“听得严烟说及天地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凤花亭，不知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那里。”官员们不敢怠慢，赶紧上报。于是，清政府开始了全国范围内持续数年的追捕天地会会众的行动。

此时，离清人刚刚入主中原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经远了，怀抱亡国之痛的士大夫早已凋谢，大一统帝国看起来平静和谐。钟情汉族文化的满族统治者认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早已毫无异议，难道他们不是凭借优秀的儒家德性赢得上天的护佑了吗？然而，征服者对于任何反对的声音和谋叛的力量仍然极为敏感。就在 1768 年，朝廷刚处理了发轫于江南的妖术大恐慌。二十年前，庞大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曾被一股剪辫风波搅得天昏地暗。对于盛行于民间的

异性结拜这种汉族文化习俗，征服者更是一直严加防范，“国初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此后惩罚更进一步，“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着即正法”。

如今，发觉天地会这一民间秘密结社的存在，乾隆自然非常重视，严谕两广总督查办。在嘉应州海阳县，还真查到有洪和尚和姓朱之人，只不过，经过审讯，发现这两人并非天地会众，也无不法行迹，而那个“凤花亭”也毫无下落。但谁让他们生在大清国，而且倒霉地姓洪和朱呢，两人终究还是被发送伊犁为奴。不过，案子很快有了转机。

1787 年正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在饶平县拿获了许阿协、赖阿思、林阿俊等天地会会犯。许阿协供认自己是被赖阿边勾引入会的，赖还告诉他头人姓名为“洪李桃”，还传了他两首诗，其中有两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据许阿协说，“木立斗世”是隐语，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孙士毅再次奏报，拿获了一名新会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人，这些人都是福建天地会会众。

叫严烟的人

于是，乾隆和官员们的办案方向转向了福建，可能福

建才是天地会的老巢。乾隆甚至大胆猜测，之前杨振国所供的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和朱姓之人，会不会便是洪李桃和朱洪德二犯?

闽浙总督李侍尧于次年一月奏报，漳浦县天地会起事，焚抢盐场，烧毁营房。被拿获的首领张妈求供认："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地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这再次证明福建是天地会发源之地。

在台湾平乱的福康安适时奏报，重要人犯杨振国提到的严烟在台湾被抓获。这可是一个重大收获，严烟是把天地会从福建传到台湾的始作俑者。他是福建平和县人，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渡海到台湾谋生，公开职业是彰化布铺老板。正在台湾和清军开战的叛军首领林爽文和庄大田也是福建平和县人，只不过他们两人的父亲比严烟更早移民台湾。

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之后，大陆移民不断踏上这个气候湿润的宝岛。台湾的农业水利设施在乾隆时已经基本完成，旱地改作水田，稻米产量大幅提高。台湾稻米不仅在岛内消费，还运输至漳州、泉州一带。邻省福建则是山岩陡峭，人口稠密。尽管政府不鼓励甚至禁止大陆人移民到台湾，但还是有很多福建农民渡海讨生活。只要有福建农工前往的地方，通常会有一些福建贸易商跟进前往，提供给同乡农工零售商品（包括合他们口味的米、辛辣调味品、乃至鸦片）、信贷，并协助他们汇款回家。

严烟大概便是这样的一位小贸易商人。他在供词里首

次交代出“涂喜和尚”这个人：“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哪里，实不知道。”此外，他还供出三个天地会的高层，“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至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内。其取烟吃茶，俱用三指，及木立斗世等暗号”。

被作为“钦犯”押送到北京后，严烟在刑部吐露了更多有关天地会的秘密。他自己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被陈彪劝入会的，天地会的根由、暗号也都是陈彪告诉他的。他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陈彪曾教他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据他说，朱姓李姓在四川，万和尚在广东。而之前被抓的同会众人所供的洪二房和尚，或许是出于保护会内的秘密，严烟供认并未实有其人，不过是朱、李二姓和万和尚的总称。

作为要犯，严烟的供词很受重视，他为追查案件提供了两条线索。乾隆一面让闽粤总督追查陈彪、陈丕和张破脸狗等要犯，一面严令四川总督在省内严密查办天地会众。

尽管福康安等人奏说并未听闻四川有天地会名目，但乾隆对此并未掉以轻心。四川本为天府之国，经过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人口剧减。在他的祖父康熙当政之际，四川人口从明末的六十八万余丁降到一万八千五百丁。

而东南八省，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咸丰初年，人口增加到一亿八千万丁。

为了寻求生存空间，外省人口不断涌入四川盆地，是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迁移民潮。官府亦以“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起科年限延长为五年等优惠政策召民垦荒。于是，闽粤、江西、湖广等地之人，纷纷前往川陕云贵等地谋生。至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已无地可耕，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

大量迁入的移民重新恢复了四川的活力，在雍正年间，四川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产区。然而持续涌入的移民很快发现已经无地可耕，于是不断进入川陕云贵等地的深山峻岭。在高山上，稻米菽麦无法生长，来自于美洲的玉米耐旱耐寒，适合在高山陡坡上生长，很快成为西南山地的主要农作物。山区人口因之骤然增加，于是只好继续垦荒，如是则不断砍伐森林，寸土必争。生态破坏又造成移民们迁移不定，生活颠沛流离。而白莲教、啰噜（即哥老会前身）这些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既能给处于困苦中的移民们提供物质上的互助，也能提供精神慰藉。

对这样一个动荡不已的地区，乾隆怎能不抱有警惕之心？在他统治晚年，直至咸丰初年，湘黔苗民起义、川鄂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先后起于东经110度附近的中南山区。

僧人提喜

案情进展很快。

李侍尧报告，张破脸狗被抓获，供认说来自广东的赵明德、陈丕、陈栋在他家赌博，被赵劝入天地会。一个突破性进展是广东巡抚图萨布抓到了陈丕，查明此人“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三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据陈丕说，师父提喜住在漳浦高溪乡观音亭，同会的陈彪住在平和县，赵明德亦住在漳浦云霄城北门内的仓边巷。

此时，起事失败被俘的林爽文亦在审讯中供认：“时常听见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集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故此，当严烟赴台一年后，他们相熟之后便提出入会。入会之后，其他林氏子弟和彰化等几处地方之人亦随之相继加入，天地会在台湾声势大振。此次举事，便因诸罗县天地会杨姓首领兄弟为争家产欲行械斗，引致官府大行搜捕所致。

提喜—陈彪—严烟—林爽文，这样一条传会线索变得完整起来，提喜成为天地会最重要的会犯。乾隆下旨严令大学士福康安务必拿获传会僧人提喜。随后，福康安很快抓获了陈彪和僧人行义。在福建漳浦被抓获的行义供认，自己的师父提喜也是其亲生父亲，提喜因为乳名为洪，

兼之排行第二，所以人称洪二和尚，已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身故，父亲在日，也曾经教给他三指诀。不过，行义说，那只是用来诓骗银钱的手段。陈彪则坚称，并不晓得天地会与洪二和尚传自何人。

乾隆则保持着他一贯的精明和谨慎。他提醒大臣们："即或实系病故，亦须得有实据，不可因行义有病故之供，迩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网。"负责的官员们严刑审问行义，最终找到了提喜墓地，开棺验了骨殖，这桩持续数年的案子才算了结。

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十二日以前，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建巡抚徐嗣曾多次提审行义和陈彪，最终，这个秘密会党才得以显露大致的轮廓。

原来，天地会是起源于提喜，其俗家名字是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而这个洪二和尚便是天地会犯口中的万和尚。当初陈彪传给严烟的诗句，据说就是传自提喜之口。实际上"结万"便是指结交万和尚，因为在漳浦土话里，"万"和"洪"是同音字。至于天地会的创会元老们，在给乾隆的奏折里，伍拉纳写道："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人。"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捕的天地会骨干张破脸狗，原是提喜初期的弟子之一，早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便已入会，但在受审时，却坚称其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方入会。或许是为了故意迷惑主审官员的视线，他伪

供会内骨干赵明德乃广东潮州府大埔县人，在东门外下寮乡居住。但伍拉纳在奏折中指出，赵明德其实是福建云霄人，住在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死后葬于乌石坑。

于是，伍拉纳的奏折、洪门秘籍和清廷档案，共同勾勒出了天地会创立之初的一段往事。出生于福建漳浦的僧人提喜，最初在本村（高塘）的寅钱寺出家，后来才到高溪观音亭为僧。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他以结拜弟兄的方式，在高溪观音亭创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并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取名为天地会。他创造了三指诀，大指指天，小指指地，直伸中指按于心口，接烟递茶都用三指这个暗号，会内之人一见便知是“自己人”，又用五点二十一隐指洪字。其首批弟子有卢茂、方劝、陈彪、赵明德、陈丕、张破脸狗等人。

至此，乾隆和官员们方知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福建漳浦卢茂举事，三十五年（1770 年）李少敏、蔡乌强举事，亦是提喜和尚的手笔。

这个神秘的僧人到底有何能耐，使得他所开创的一个秘密组织，在二十多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网罗了众多农民、佣工、小差役、小商人、算命人和乞丐，形成地跨闽、浙、粤等省一股巨大的社会潜流?

天地会本身是秘密组织，传徒结会都十分隐秘，对于叛徒的惩罚也很严厉。被拿获的会众们即便作伪供，往往也只知一二。是以关于提喜此人的生平，称得上是查无所据。据云霄县人方群达考证，云霄县高塘村郑氏正是提喜

之后，高塘村如今尚有郑氏的私塾。

1988年，当方群达前往高塘村之际，看到“这座坍废已久的庭院残基，坐落于高塘村北门内（北城门已于1959年被拆毁）东北隅，坐西南向东北。虽然此前曾有一些村民在此废基址上杂建了几个简陋的猪舍，并挖了几个小粪坑，以及种有数棵果树，但是还保留着原来遗存下来的几道石砌墙基和三合土夯筑的残墙断壁，尽管漫布苔痕，甚至有的已湮没……”

据说，郑开就出生在这私塾里。

他生长的年代，正是帝制晚期的回光返照。汉学家孔复礼如是评价：“在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极富号召力的现象，并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他接着说道，“但它们对于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却可能不尽相同。”

如今，重修的高溪庙观音亭依山面海，酷似天地会切口“地镇高岗，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中描绘的景象。那么，当年的郑开是否就经常面朝大海，等候一个勃发的时机呢？这个高塘村郑家的次子，又为何选择出家这样一条道路呢？

游民社会

在郑开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从明朝的崩溃与清朝的征服中恢复过来。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商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尤其是闽粤一带发展速度更快。商品经济密集的商业网络连接起了村庄和市镇，但商业的发展不只意味着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着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百姓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尤其是人口大爆炸的压力——康熙后期，人口不过一亿多，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中国人口猛增到三亿一千万丁，大量劳动人口流入市井，无所归依。

到了帝制晚期，农民阶层的特点是“小”、“少”、“散”：小，指耕种规模小；少，指财产少，也就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散，指分散的劳动、居住条件，使农民与外界隔绝。“小、少、散”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农民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大量沦为游民，在帝国的通衢大道、市镇乡村、水陆码头四处游荡。

郑开选择出家当和尚，正是当时无业游民的出路之一。他应该未曾在官府注册在案，可能只是一位边缘僧侣，像 18 世纪常见的游方僧一样，到处化缘乞讨。有学者考证，洪二和尚是在四川创办了天地会，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完全有可能随西迁的移民们到四川讨生活。在那里，他和那些传统的自然经济容纳不了的游民阶层厮混，结成帮伙，

患难与共，敛财分用。

于是，独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之外，第三种社会组织“会党”产生了，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整体中自成体系，可以说是“社会中的社会”。

于是，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以及那些谋求不正当生活来源的盗匪和家业衰败的地主，都投入会党的山堂，借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因林爽文举事被捕的许阿协，他加入天地会的经历，就很能说明这种经济上的联系。

他是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闽南平和县小溪地方贩卖酒曲。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十月初八日，他携带银两到平和小溪赖阿边处购买酒曲，途中银两被人抢走。他向赖阿边求助，赖阿边告诉他：“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便与他一同“焚香拜会”，赖果然把被夺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

许阿协的同乡赖阿恩，儿子在福建漳州唱戏，他在去探望儿子的途中，也被会内之人将衣物抢去。他将此事告知漳州戏馆的梁阿步后，梁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赖阿恩遂与他一同结拜。梁阿步不但为他讨回被抢之衣物，还教他今后“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被抢了”。

那些头脑灵活富于想象力之人，便顺势而出做了领袖。福建云霄高塘村郑氏宗族里一直流传说，洪二和尚每次要

做事以前，都要在庙埕中的一根通天柱旁作法，开始时把自己的身体紧靠着通天柱，将嘴紧贴着柱子念念有词，然后又把耳朵紧贴着柱子，像是在凝神细听，说是在听天地公复降给他谕旨，批准他替天行道做大事，救苦救难救百姓。看来，极有可能是洪二和尚为了增强在徒众中的威信，伪托身有异术。而他不但熟悉民间文化中结拜聚义等江湖规矩，也深谙如何营聚吸纳下层民众之术。

在表面的盛世之下，我们所见的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个人所得资源比例恶化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生存、安全这样的基本问题，已经无法经由个人努力来改善，这种情况由于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既然社会无法提供公平，人们便寻求一种补偿机制。“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天地会的信念，吸引着那些生存无着流离失所之人，吸引着那些无权无势备受不公之人，也吸引着那些四方浪荡打劫偷盗之人。

身处 18 世纪中叶的洪二和尚无从想象，他正处于中华农业帝国的艰难转型之际。许多人和他一样，不再依存于祖祖辈辈耕种着的土地之上，他们游荡于帝国的繁华市镇，远及荒僻乡野。于是，在移民五方杂处的市镇，在商品和交通发达的地域，一个游民社会诞生了。

这个秘密社会分解着传统的封建帝制和自然经济。在洪二和尚身后，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天地会组织激增，且披上了“反清复明”这一政治诉求的外衣。两百年来，天地会虽是秘密组织，却拥有广阔天地。以此为肇端，哥

老会、袍哥、青红帮等秘密会党和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会等秘密教门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其中，天地会（后世的洪门）更是为推翻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会党长于破旧，却不能立新。此时西方早已风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这一股无所不在的社会势力却始终只能作为武装力量，一再被利用、被消灭——中西社会由此拉开差距。

上帝的中国之子

主要人物：洪秀全（1814—1864）

如果他的运气足够好，如果批卷的考官稍稍松一点，如果他不是自视甚高到了偏执的地步，也许洪秀全走的就会是另外一种人生之路。他也许会一直都是孔夫子的忠实信徒，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19世纪中期那个最为奇异而荒诞的事件了。

着魔了

1837年农历的三月，广州北边的花县官禄布村。这时候，南方已然如初夏般温暖，村子里的大户洪家却气氛凝重。在一间由土灰墙和板条瓦盖成的平房里，女人们哭哭啼啼。躺在床上的洪火秀被两个哥哥扶着坐了起来，他奄奄一息，请求父母原谅他的早逝，不仅无法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也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了。他叮嘱自己即将临盆的妻子，在他死后，不论生男生女，也不要再嫁，为他守节，拉扯大他的孩子。

洪火秀躺下来，似乎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家人或暗暗抽泣或偷偷抹泪，悲叹这个家族一直寄予的希望和可能的荣耀渐渐濒于死亡境地。然而，此时的洪火秀仿佛看到了一番奇景：

一龙一虎和一只雄鸡走进了房间，天空中奏起了乐声。几个穿着黄袍的俊美少年，簇拥着一个华丽的轿子，请洪火秀上轿。他们很快到了一处光明的处所，无数气质高贵的男女向他表示敬意。最高的宝座上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他穿着乌龙袍，浓密的金色胡须一直拖到了腹部。洪火秀匍匐膜拜，向他的父亲谦恭致敬，然后站于一边。

看到自己的次子，父亲流下了眼泪。他对他的儿子说，世界上的人类全是他所生他所养，可是他们并没有真心地信仰他，尊敬他，却要受魔鬼的引诱。洪火秀被父亲的悲哀感染，马上要去世上揭发魔鬼的诡计，父亲阻止了他。洪火秀发觉领头的妖魔正是阎罗王。他带着父亲给的金银和一把宝剑，和阎罗王大战一番，每当他感觉疲惫的时候，就有天女给他吃黄色的果子，让他恢复体力。最后他打败了可恶的妖魔。在天上，他还有一位美丽温柔的妻子“第一月宫”，他们共同过着愉悦的日子，直到父亲教导他读完了一些经卷，让他返回尘世，去教化芸芸众生。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洪秀全。

偶尔经过的邻人都能听到洪火秀的喊叫声，有时候是“斩妖”，有时候是“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他的家人则要不断按住这个垂危病人，他总是试图从床上跳跃而起。

终于，洪火秀从昏睡中苏醒。他姐姐洪辛英来探望他，发觉这个识文断字的弟弟精神错乱，满嘴鬼话。他自称上

了天堂，受命斩妖除魔。他说："姊，朕是太平天子"，然后写了"太平天子"四个字给姐姐看。他甚至不承认眼前的老人是自己的父亲，他和自己的两位兄长激辩，还不时对客人唱颂他从天上学来的高天之音。

洪家的儿子疯了，官禄布的村民们议论纷纷。

受挫的年轻人

在做这场奇异的梦之前，洪秀全已经三次参加科举考试。他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显亲扬名的家族期望系于一身。何况，一千多年来，考取功名带来的荣耀对读书人可谓无与伦比。从初次在私塾里在孔夫子牌位前磕头的那一天起，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做着一举成名的美梦，怀抱着"登科第，步青云，立功名"的理想。十六岁时，洪秀全就到广州应试。然而，命运似乎一直在捉弄这个虔诚的年轻人，初考时他名列榜上，复考时则又落第，连秀才这个最低级别的功名也没有得到过。

据说洪秀全自幼素有大志，与小伙伴游戏时总是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洪仁玕口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整理的《太平天国起义记》里说："秀全自幼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

即得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优俊如此，人皆谓取青紫如拾芥，行见其显扬父母。”

这个洪氏子弟逐渐变得自负而胸怀大志，而连番近乎恶搞式的落第沉重打击了这个年轻人。悲苦，失望，羞愤，种种强烈的情感刺激，足以让一个人得急性精神病，短暂出现幻觉也不是什么奇异之事。“在梦里，我们欺骗着自己。每一个梦都是自我陶醉，自我催眠。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引起一种让我们准备应付某种问题的心境。”洪秀全死去六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他的话足以解释这个梦的深层心理基础。

1836年，洪秀全赴广州应试之际，在贡院附近的大街上碰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本地人，另外一个洋人则相貌奇怪，汉语讲得结结巴巴。《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提到，那个洋人对洪秀全说，他将要登上至尊之位。当然，很可能这是洪秀全后来的自我粉饰，以夸大个人能力的奇异，证明他地位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他们送给了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这是广州一位基督徒梁发的作品，他从《旧约》和《新约》里摘录了多段引文，探讨上帝的恩惠和人类的愚昧。洪秀全在一堆他闻所未闻的故事里，如大洪水、诺亚方舟、毁灭蛾摩拉和索多玛等中，注意到其中多处提到了“洪”字，而那位上帝居然叫“爷火华”，和洪秀全的原名“火秀”有相同的字。

他留下了这本书。

1837年的广州府试再次失败后，极度的挫败感导致了

洪秀全的精神错乱。阿德勒曾说："发狂的人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现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断言'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最引人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也许，《劝世良言》里洪秀全注意到的上帝和他的微妙联系，激发了这次奇异的梦。

他生性傲岸，若干年后，当他决心要为打造一个不同于现存世界的"天国"而发动战争时，他曾说："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江山，当开创新朝……甚至孙膑、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中之娴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三合会更卑卑不足道矣"。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许。

不过，在1837年，即使是第三次科考失败，与上帝相比，洪秀全还是更加亲近孔子。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儒家学说已经渗透进他的灵魂深处，与他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相缠绕。

在做了那个奇异的梦之后，洪秀全继续他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他到邻村的私塾教书，同时准备再次赴考。1843年，洪秀全再次出现在广州贡院。很不幸，他又一次失望了。

科举考试是如此虚妄，梁发在那本小册子里揭露说：

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

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神像，而不以虚灵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

这些话肯定击中了屡屡落第的洪秀全的心。历史学家史景迁猜测此时洪秀全的心理，“科举考试是毫无价值的虚妄之举，它传播虚假的期望，产生错误的程序。洋人虽然贩卖鸦片，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性情暴躁，但他们有好心念，或许他们将把这个国度救出死亡之境”。而他，洪秀全，“在世上还要斩杀无数的妖魔，因为罪恶已渗透到了全人类中间。由于耶稣是上帝之子，也是洪秀全的兄长，那么，洪秀全实际上就是上帝的中国之子”。

“孔子为不通秀才”

而那个屡屡折辱于他的孔子算什么？

“孔子为不通秀才，得罪天父，每考四等，只有‘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二句能合天父之意。”后来，太平天国所创办的刊物里每每如是奚落这位圣人。如果上帝的中国之子屡试不中，那便是孔子所开创的这个儒学世界出了问题。

阿德勒对这种心态分析得颇透彻：“他们已经丧失以往生活中有用的前进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在合作中获取成功没有你的份。’他们已经避开了真正的生活问题，而和虚无的阴影作战，以使他们自己重新肯定自己的力量。”

洪秀全此时面对的倒不是“虚无的阴影”，他开始遵从上帝教会的教义，打破一切偶像。他最熟悉的偶像正是日日相对的孔子牌位，那牌位高二尺三寸七分，宽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朱底金字。我们大概都能够体会洪秀全拿下孔子牌位时的畅快之情，就像是小孩子看着一件自己想了很久却从未抱在怀中的玩具，有一天，突然发觉那玩具被摔烂了，别人再也无法抱在怀中。多少年来，他向他叩头，向他祭拜，他却不理会他的诚意，鄙视他的天赋。

他拿下执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之际，也打碎了自己的饭碗。童生们的家长早就对他莫名其妙的宗教宣传感到忧虑了，如今他们领回了自己的孩子。洪秀全决定和他的几个信徒去游遍世界，去宣传上帝的敬拜救赎之道。

从 1844 年四月初离开官禄布至 1850 年和清廷开战之间，洪秀全和他的远亲、乡村塾师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的深山老林里传教。像所有充满激情的传教者一样，洪秀全

不断添加他那个预兆之梦的内容。在这个2.0版本的梦境里，他的父亲，“独一真神”皇上帝指责孔丘用他那些经书迷惑中国人，指点凡间妖魔害人。《太平天日》里说上帝怒斥孔子：“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这无疑道出了洪秀全的隐衷，他清除孔子的影响，正是为了给自己的传教工作扫清障碍。

当然，其中也不乏发泄他内心深处长久累积的愤怒之情。在新版本的梦境里，洪秀全的哥哥耶稣还痛斥孔子毒害了自己的胞弟。孔子反驳这些指责，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逃走：“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偕走。天父皇上帝即差主（洪秀全）同忠天使追孔丘，并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不过，他也承认孔子有一定的功劳。在1853年焚禁经书之前，洪秀全尚保持着对孔子的某种敬意。在他那些糅合了《圣经》和儒家典籍的宗教诗文里，他有时还奉孔子为道德楷模，“周文孔丘身能正，陟绛灵魂在帝旁”（《原道救世歌》），还不时抬出孔子来为拜上帝教佐证，“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原道醒世训》）。这些诗文在1852年被辑成《太平诏书》刊印发行。

多少年来，他晨诵夕读，儒家学说早已潜移默化并渗透到他的生命之中。他的父亲，他的皇上帝本身便是一个

中西合璧，经过他的儒学头脑消化之后的基督教上帝，所以，他的宗教伦理亦不脱儒家的伦理学说。

然而，当洪秀全在1853年进入他的人间天堂时，孔子，这个中国文化的精神象征，却遭遇了祝融之灾。

坑灰未冷

秀才马寿龄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里焚禁古书的场面：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文章浩劫古原有，贤圣精灵自不朽。(《金陵癸甲新乐府》)

定都南京之后，经洪秀全批准，1853年内出版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撰写，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政权指斥孔孟和儒家经籍为妖和妖书，严加禁绝，违者严惩。出台这个政策的思想背景是这一年刊行了《三字经》，这无疑出自了不起的上帝次子洪秀全之手。

按照他的说法，原初中国和番国同样拜上帝，从盘古

到三代，一直都敬拜上帝，但自从秦朝出现神仙怪事之后，中国历史便陷入一团漆黑。如今上帝亲派他的次子下凡廓清中国，由他来开始新的纪元。新史观下自然要廓除中国古人的影响，让四海之内的兄弟以纯洁的品质拥抱皇上帝。

愤怒的马寿龄质问："尔本不读书，书于尔何辜，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确实，太平天国也用读书人做一些文书工作，但这些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兄弟大多不识字。当时便有人断言："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回答曾国藩幕僚比较交战双方的得失时，归结为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没有读书人，未尝不是肺腑之言。

苏州、宁波、常熟等太平军的占领区，那些经历多少代人搜集而来的奇珍古书，被武人们拿来当抹布。心血来潮之时，他们也会把那些装帧得十分精致的宋版书撕裂，扔到地上用脚踩踏，或者干脆把这些古老中国的"幽灵"扔到厕所里。

洪秀全过激的焚书政策甚至引发了领导层内的质疑。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一更时分，天父（杨秀清）再度下凡，做出最高指示：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

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

在天父的干预下，焚书运动算是告一段落了。洪秀全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设立删书衙，宣布一切儒学经书要经过删改才准许刊行诵习。而且，孔子亦不再是“妖”了，是可以经过劳动改造好的兄弟：“孔某向本在天堂，忽逃下凡间，变妖惑人，所以天父大怒，今已捉上高天，罚他种菜园了。”无疑，孔夫子此刻又充当了天国领导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道具。

南京的夜晚漫长而寒冷，如史景迁所言，洪秀全不仅要处理死者、生者和天父之间的关系，他与尘世亲属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与宫中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他还要留意他本人作为上帝次子与《圣经》经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已如此巨大地支配了他的生活。

也许是他全情投入宗教事务，已无暇或没有兴趣继续和孔子作战了，晚期的洪秀全对孔子增加了些温情，认为他是个好人，于是让他在天上做了寓公，享受清福。也许这只是为了缓和外界的敌对情绪，而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愤恨不已。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曾交代，干王在杭州进献万余卷古书，天王看完后“总用火焚”，并且“总不准官

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太平天国开科举，虽沿用八股取士，亦只是考上帝教教义，曾有官员因据经书出题而被砍了脑袋。

洪秀全反孔从未触及儒学的深层内部，看起来倒像是一个愤怒的小孩被侮辱后的全力发泄。他的那些粗鄙不文的宗教诗歌显示出他的文学才华一般，他根本就缺乏从理论上批判孔子的实力。

“传统代表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说，“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给传统造成的变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洪秀全那激进而荒谬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改造，只是为敌人树立了巨大的靶子。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便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至“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

他唯一彻底改造的可能只有自己一人。

风很大，焚毁后的书籍残片在空中旋舞着。

苏州虎丘山塘街，卖糖豆的小贩吆喝着。一位读书人想买一包糖豆，当他接过小贩递来的糖豆包时，惊讶地发现包装纸竟然是一页宋版书。从此，他每天都要来买上数十包糖豆，如此，竟然保全了几百页的宋版书。

得来是如此艰难，毁坏却不费吹灰之力。战后江南的几座藏书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

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宁波天一阁，都被扫荡无余，藏书散失毁弃。这场浩劫惊醒了风雅好古的士大夫，使他们从此转而关注日益严峻的中国现实。

绿金诱惑

主要人物：卢公明（Justus Doolitt1e 1824—1880）

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就立志到长满茶树的中国去传教，去解救那些可怜的、不信上帝的采茶人。

剪剪飞船运茶来

1868年，卢公明心情颇为矛盾地从北方赶回了福州。

早年他还在奥本神学院读书之际，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就立志到长满茶树的中国去传教，去解救那些可怜的、不信上帝的采茶人。他知道，在中国，即使是最穷之人，也有自己的茶。茶，是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

然而，如今卢公明却退出了美国美部会的传教活动，成为美国琼记洋行从事茶叶贸易的一名翻译。

十八年前，卢公明来到福州，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堪称最成功的传教士。甫到福州，他就因在南台郊区售卖传教书籍而颇负盛名。数年中，他编写、出版的传教小册子达二十余种。福州首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就是他所办学校里的学生。那时候，他想，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像

饮茶一般，把信奉上帝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将是上帝福音传播者何等的荣耀。

事实上，卢公明来到福州的这十几年，恰恰是福州开埠历经十来年的沉寂后，茶叶贸易终于开辟了新商路的时候，福州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茶港。

18 世纪以来，饮茶成为一种国际性风尚。尤其是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长。茶叶来到英国之际，正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向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转变。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绿金：茶叶帝国》一书里认为，中国茶叶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可以说，茶叶不仅塑造了英国中上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促进英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是，靠贩运胡椒发家的东印度公司转而从事利润可观的茶叶贸易，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尤其是产自福建武夷山的红茶，在英国就是茶叶的代名词。但在 1840 年之前，清帝国实行海禁政策，一切对外贸易只能通过广州港，武夷茶输往欧美的中转站便是广州。

在崇安县的武夷山麓，每当茶季来临，茶树上的叶子便被采摘下来，运送到县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门别类，烘焙、调和并包装以后，再运至通商港口。包装在箱子里的茶叶从星村和赤石出发，先是装在木筏上，每只筏子上

装十二箱，运至崇安，然后再由苦力们背着翻越武夷山，抵达江西铅山。

这一路上，山道宽约六尺，路面为小方块花岗岩铺就。苦力们每次担着一两箱茶叶，需要八天才能送达目的地，再由从铅山出发的小船运至河口，然后换乘载重量为两百箱的船只顺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经过十八滩抵达赣州，至赣州再用船运至南安。然后，苦力们扛着茶箱穿过梅岭，在南雄装船到韶州，再换乘载重量为五六百箱的大船，顺北江南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星村——广州这条茶叶线路长达 2885 里，费时五六十天。

这些珍贵的茶叶在路上的运输时间如此之长，自然提高了运费，每一百斤运费就是三两六钱五分银子。再加上沿途有七个税卡，到了广州，还要贿赂海关，此外英国还有茶叶税，每磅三钱七分五厘，所以武夷茶在伦敦出售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好多倍。

早在卢公明来到福州前十几年，英国人已经试图进入神秘的武夷茶区。1832 年，英国船“阿美士德”号进入闽江口侦察福建沿海。这次航行的指挥官英商胡夏米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发现，如果在福州直接贸易，仅运费一年就可以节省 60 万两白银。他们在福州停留了 27 天后返航。两年后，郭士立再次与英国鸦片商人戈登乘小船，沿着闽江进入武夷茶区。

这次，他们如愿以偿地了解到传说中中国茶的有关情况，包括种植、加工、病虫害和销售等环节。戈登还亲自

在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并带回了茶种。一年后，他们再次前往茶区，途中被福建当局拦截。这三次探险和商业刺探所得情报，让英国人了解到福州独有的经济价值，直接导致福州日后成为通商口岸。

然而，1844年开埠后，福州的茶叶贸易却出乎英国人的意料，简直堪称惨淡。来福州的第一艘美国船停泊了一个多月，却无人前来交易，最后只好把船上的胡椒、洋布减价出售作为回程的旅费。驻福州领事若逊在1849年初，沮丧地向香港总督报告说："我再次担任这个不愉快的任务，向你报告，我们曾经怀着使这个港口成为欧洲商船的常临之地和英国商人驻中之点的希望，仍未实现。……在过去这半年中，没有任何英国商船或其他国家的商船曾经到过这个港口。"为此，英国对新口岸的商业价值进行了调查，曾经想用福州和宁波交换杭州、苏州和镇江这三个内地口岸，最后由于中国反对而作罢。

当卢公明在1850年来到福州的时候，外国人寥寥可数，除了几个领事馆人员，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们和商人一样，都是被福州的贸易前景吸引来到此地的。但是，道光皇帝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外国人深入茶区腹地。福州开埠后，闽浙总督刘韵珂揣摩圣意，暗中要当地商人不与外国人做生意。所以，传教士的工作自然也颇不顺利。当卢公明奉命在南台建造住所，去查看建筑工地时，被当地民众用石头赶跑。

这时，因为上海崛起，武夷红茶转由上海港出口。茶

叶被运到江西河口，经水路运至玉山，再由人工搬运到常山，这段路比较好走。再沿钱塘江顺流而下，经杭州至上海。由崇安到上海，全程1840里，24天可以到达，运费和时间都节省了不少。

然而，1853年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到广州的旧茶路和通往上海的新茶路。美国的旗昌洋行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茶季来临时，派遣中国买办携带茶款到武夷茶区收购红茶，运至福州港出口。恰好福建巡抚也上奏，茶叶贸易因为战乱受到阻隔，担心那些靠茶叶糊口之人失业生事，请求朝廷暂开海禁。于是，一条新茶路开通了。从武夷山到福州只要四至八天，这是最合理、最快捷的一条茶路，大宗红茶沿着闽江直运到福州，直接出口欧美。

一个世界性的茶叶贸易港逐渐形成。

旗昌洋行的第一次茶叶采购非常成功，到了该年9月，已经有两艘满载着武夷红茶的船只离港。各国资金雄厚的洋行纷纷仿效，日后，卢公明供职的琼记洋行也在第二年设立福州代办处（琼记洋行的创始人曾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

卢公明一定目睹了春季时福州港的盛景，武夷头春新茶上市之际，无数张挂着白帆的运茶船从福州港罗星塔下起航。那是英国造船师特地设计的“中国茶叶飞剪船”，这让武夷新茶比之前提前了两个月到伦敦。在茶船到港的第二天，要是伦敦的杂货店在橱窗里没有摆出武夷茶，这家

店的生意就堪忧了。

于是，茶叶的输出量直线上升。1855 年是近 1600 万磅，1860 年就达到了近 4000 万磅。在茶季开市之前，大量商业资本流入福州。

鸦片馆多过米店

卢公明希望西方教会和基督徒们支持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一如他们喜爱香味四溢的茶水一样，他呼吁教会把最好的教士派到中国来。

然而，他的兄弟们派来的最有力量的并非传教士，而是鸦片，一种成瘾性毒品。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对华茶叶贸易。从 1815 年起，每年的茶叶贸易就让它获利 100 万镑以上，占到了该公司商业总利润的 90%。东印度公司 1758 年在广州设立了常驻管理会，一方面大量购买跌价的“冬茶”——每年的贸易季过后，茶叶价格大幅下跌；一方面签订下一个季度要购买的新茶合约。管理会一般先与行商预定一份买卖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购买茶叶的总值预付 50% ~ 80% 的定银。而广州的行商也必须将合约上的数额交付后，才可以把剩下的茶叶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商人。

在预付货款的基础上，东印度公司为了推销英国的毛纺织品，在茶叶贸易中强行将毛织品按比例搭配销售：公司向行商购买茶叶，行商就得购买一定比例的毛纺织品。借此，东印度公司堵住了英国国内对其垄断权的责难，哪怕这些毛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无人问津。

于是，大量的白银输入中国，只是为了用来购买茶叶。据估算，1700—1840 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 1.7 亿两。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逆差愈拉愈大，1785—1786 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 328%。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并运往中国销售，将这项收入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英国人把工业品卖给印度，再通过走私把鸦片卖给中国，中国人则把茶叶卖给英国，英—中—印这种独特的三角贸易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回吐外流，巨额白银重新装进了英国人的腰包，而中国则出现了“银荒”。

当卢公明来到福州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市的居民中居然有如此多的瘾君子。据他说，截至 1863 年 12 月 31 日，福州进口货物总值超过 1050 万美元，其中 500 多万美元是用来购买鸦片的。红茶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鸦片则是最大宗的进口货物。福州的鸦片馆甚至比米店还多。

在卢公明所写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里，他描述了福州城居民日常生活的变化。在这种“提神醒脑”的鸦片没有输入之前，当地人接待宾客总是用一杯热茶，或

是请客人抽上一口水烟，如果没有热茶待客，那就是主人的失礼。现在，人们经常一边抽鸦片，一边聊天或谈生意，“在上层社会里，请客人或朋友抽鸦片可能已经达到和美国三四十年前请朋友喝葡萄酒、朗姆酒、白兰地等传统的待客之道一样普遍了”。

他看到，在福州“吸鸦片这种恶习成为当地人追求财富和幸福的障碍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福州的鸦片消费和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增长迅速，它所带来的破坏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和可怕”。因此，虔诚的教徒卢公明写了中文小册子《劝戒鸦片论》。他向中国的瘾君子们推荐了一位高明医者，便是救世主耶稣，这位医生有个奇方妙药，就是上帝福音。然而，一贯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反唇相讥：要是耶稣能帮人戒除鸦片就拜他，不能革除就不拜他。

卢公明自然无法给出一个有速效的戒烟方子，事实上，他日后供职的琼记洋行也做着贩卖鸦片的生意。19 世纪 50 年代，这家美国商行一直用小船在沿海一带兜售鸦片。

而戈登从中国运回的八万棵茶种，早已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中发芽、生长，这些幼苗被广泛种植在印度各地，以便确定哪里适宜茶树的生长。

传教士商人

福州茶叶贸易的兴盛一度看起来是传教者们的福音，卢公明在日记里写道："一开始的时候，当地存在着对我们的敌对态度，现在看起来，对我们的偏见和抵触情绪正在慢慢地减退。"

他兴办了格致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他编写发行的传教小册子也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商业的繁荣，逐渐改变了福州人的价值观，他们开始追求享受，崇尚财富，就连传教士们的生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卢公明写信给波士顿美部会总部，抱怨他的薪水连日常开销都应付不了。他几乎每月都要向同事们借钱，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此外，疾病也时时困扰着他，他的两位妻子和幼女都先后在福州患病去世，他自己在1868年失音症再次复发。这些，让这位怀抱理想的福音传播者心灰意冷。

此时，福州的茶叶贸易进入全盛时期。到1867年底，福州有十五家英国商行、三家美国商行、两家德国商行和一家布律吉商行，以及三家银行、两家货栈和一个印刷局。茶叶贸易竞争变得十分激烈，风险也颇大。于是，那些长居福州、精通中文并且了解茶叶市场的传教士成为各大洋行青睐的人才。卢公明此时来福州传教已逾十四年，他会讲福州方言，了解中国社会，并且曾经实地考察过茶叶种植、制作和生产情况。经过一番痛苦的比较、抉择，他终

于决定弃教从商。

“我已接受了福州琼记洋行的邀请，职责是充当译者，从那天起，我与美部会的合作就终止了。我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的声誉代表了我向往一种积极的生活；第二，我喉咙的病况使我无法进行有规律的频繁传教；第三，由于我的学校经营失败，没有任何美好前景。”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他吐露心声：健康问题和传教事业不理想，使他选择弃教从商。他希望好友了解他是被迫接受这个工作邀请的。他的朋友安慰他，在商业圈里做一名忠实的基督教徒，这无损于他的价值。

卢公明没有详细记录他在琼记洋行的工作，但通过美国人斯蒂芬·洛克伍德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还原他的工作概貌。洛克伍德根据琼记洋行的档案资料，写了《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一书。

由旗昌洋行开创的内地采办制度，已经是各外国商行的常规。早春时节，洋行的买办把现钱送到产茶地区。5月初，从福州前往内地贸易区收购红茶（尚需烘焙加工）。到夏季晚期再去采办日后作为绿茶出售的茶叶。从6月到9月，茶叶运到福州，采购茶叶的活动持续到夏末。然后，琼记洋行在自己的仓库里进行茶叶的烘焙和重新包装（也有部分茶叶在集散地烘焙）。烘焙和包装工作从7月持续到11月。在通商口岸还见不到茶叶以前，约有数万美元陆续汇往内地贸易区。

以1860年为例，琼记洋行派一位买办携带25万美元

从福州前往内地采购。具体采购计划如下：从福州采办的第一批茶叶，将以3.8万美元购买白毫1300箱，以1.3万美元购买乌龙1300箱。如果战争没有引起茶价波动，打算到5月份再拨付2.5万美元，然后相机行事。

卢公明的工作应该包括随从琼记的福州买办到茶叶产地收购茶叶，在他所写的《英华萃林韵府》附录中，记述了许多茶叶贸易的具体过程。他提到当时福州茶行已经是精细化作业，茶行分工十分细致：看门，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钉箱人……作为当时三大茶市之一（其他两处为上海、武汉），福州销售的最上等红茶如功夫茶和小种，来自武夷山区；青茶如乌龙和宝春，大部分来自沙县、高桥、洋溪等地；最好的白毫则来自邵武、梨源、将口、小湖等地。在他从商的两年间，福州市场上的茶名多达281种。

这位曾经的传教士于是有机会目睹资本的巨大力量，那是一种远比福音更有吸引力的东西。那些与外国商行订了供应合同的茶商迅速致富，譬如崇安县人邹茂章，他以经营茶叶起家，数年家产便达二百多万两白银。福建许多地方原本是穷乡僻壤，因为种茶而商贾云集，随即成市。曾经有两位美国传教士前往内地游历，在闽北下洋茶区遇见一群快乐的采茶人。茶农们以为他们是前来采购茶叶的洋商，大为欣喜，当得知他们不过是传教士时，脸上很快就浮现出失望的表情。

欧美国家对武夷红茶巨大的需求量，刺激着福建茶叶

经济的发展，伪茶随之而生。19 世纪 60 年代，外国商人就抗议中国茶商们在新茶中混有老茶，或者把茶叶末掺进茶叶中。有的茶商则没有在装箱时使用足够的铅，以至到目的地时，茶已经受潮发霉。卢公明对此说过一句狠话："如果要比商业贸易中欺骗无知、诈骗粗心人的方法的话，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超过中国人。"

种种缺乏商业道德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1872 年，福建省通商总局特地颁发了一份"打假檄文"。布告首先指出，近年来出口的乌龙、功夫等茶掺入碎末，或用梗黄拌入增重，这种行为导致洋商运回国内而亏本。通商总局呼吁茶商们守信用，保护中国茶的声名："查商贾贸易全凭信实力能近悦远来。本口茶叶一向为货物大宗，自各国通商以来行栈增多生意日盛，自应各整行规公平互市，以期于国驰名信孚中外。"同时，如有奸商样货不符，或制作伪茶，一旦被洋商告发，"定即严拿究办决不宽贷"。

或许是内心深处一直矛盾重重，卢公明对自己在琼记洋行的工作情况记述很少。我们不晓得他薪金多少，但琼记洋行似乎对员工颇为慷慨。19 世纪后期，一名上海分行的品茶员，年薪便有 5000 美元，卢公明的薪水即便没有这个数目，也肯定比他当传教士时宽裕舒服得多。1873 年，他因为疾病回国治疗，并在七年后去世。

他无从知晓的是，如同他曾经昙花一现的传教事业一样，武夷茶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福州港在 19 世纪 80 年代慢慢沉寂下去，茶叶"中国制造"的垄断地位从此

丧失了——1888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从中国进口的数量。因为过度采摘，茶树被破坏，以及加工过程中粗制滥造的现象，武夷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

更令人惋惜的是，武夷茶叶出口总值的一半，是用来支付鸦片的款项。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福建的茶农和茶商们收入丰厚，然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没有给福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实力。

而到了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直到20世纪末，英国品牌主导了世界茶叶市场。

秋风宝剑孤臣泪

主要人物：李鸿章（1823—1901）

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却不是可以造时势的英雄。

一

贤良寺。

李鸿章躺在病床上，处理电文。

最终，他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和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件空前屈辱，外国军队居然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驻扎军队。

李鸿章躺在床上，双眼圆睁，却再也说不出话来，就这样残喘了一天。身边的一个官员，他的老部下周馥号哭着说："您放心去吧，未了之事，我们会办的。"

两行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用手合上了他的双眼。1901 年 11 月 7 日，这位晚清权倾一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大臣，离开了人世。

死讯传开，曾被李鸿章派去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写了

一副挽联，对他最被人诟病的洋务和外交，作了一个颇为公允的评价：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说，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却不是可以造时势的英雄。

带着《马关条约》草案和脸上的绷带回到了祖国的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他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这座寺庙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临摹古人碑帖。

天当正午，穿着短衣的李鸿章在廊下散步，一个家人在旁数着数。他走了数十次后，家人大声报告："够了！"掀开门帘，李鸿章走到屋里，坐在椅子上，一个仆人端了一杯酒进来，另外一个仆人蹲着帮他捏腿。

中日甲午战争给李鸿章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自从1875年他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以来，他一直是这个老大帝国冲在最前面的大臣，他也是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现在，他和他的淮军以及北洋水师，在日本和当朝清流主战派的夹击下，声名扫地。三十年来的第一权臣从此沦落，他的老对手翁同龢一系此时权势方炽。这场战争也让大清国皇帝和真正的实力人物太后之间的矛盾浮出了水面，宫廷之中，"帝党"、"后党"双峰峙立，二水争流。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在这场海战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军将领指挥上的无能，编队变阵的错误，军舰航速落后，弹药供应不足，军队训练水平和保养水平都十分低下……

清军改革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的德国人冯·汉纳根上校指责他的清国同事一贯妨碍改革，他们与朝廷中枢的一些高官结成死党，并仰仗这些同伙的支持，使他们不受北洋大臣的节制。

《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通讯记者如是报道。

而就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上海《万国公报》的主笔、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发表了一篇《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这位勤奋的报人痛心疾首地说，中日两国原本都是遵守古法，与西方格格不入，东西相通之后，两国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然而中国浅尝辄止，日本却孜孜以求。

战争的结果无比清楚地、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帝国军事准备的失误和日本军事准备上的有效性。泱泱中华帝国败在这个邻居小国手里，无论如何都是天朝大国的统治者和臣子们无法接受的事实。

梦想被戳破了。

二

强兵富国，是李鸿章和那些致力于洋务事业的有志之士做了几十年的梦，如今却被帝国深入骨髓的腐朽气息和趾高气扬的小日本共同打碎了，击沉了，毁灭了。

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1862年，大清帝国正陷在太平天国的泥淖中。

初夏的上海，一群士兵走下了上海码头。他们脚穿草鞋，头裹破布，身上还散发着臭味，所过之处，行人纷纷掩鼻。领头的军官约四十来岁，他身材高大，比一般军官高了许多，他就是李鸿章。这支近万人的士兵乘坐洋轮船来到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驻扎在城南的徽州会馆。

失望之情在忧心忡忡的上层社会中弥漫，上海的士绅们聚集在中西结合风格的客厅里窃窃私语，他们花了大把银子，请来的却是这样的“叫花子兵”。

“军队贵在能打仗，外表不重要，等我打完一仗，你们再来笑我吧！”雄心勃勃的李鸿章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种我行我素的自信和勇气。

“叫花子兵”很快就让上海文质彬彬的士绅们和租界的洋人老爷们刮目相看。三千淮军在虹桥和十万太平军交战。据记载，李鸿章搬了一把西式椅子，坐在虹桥桥头督战，甚至要砍掉败退的心腹爱将张遇春的脑袋，逼他重返再战。打赢了这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李鸿章在上海声名大振。

正深陷在太平军困局中的朝廷，此时对每一个为大清出力的人都毫不吝啬，李鸿章被实授江苏巡抚。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他们一起受到了朝廷重赏。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的李鸿章被封为一等伯爵，封肃毅侯，戴双眼花翎。

从此，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晚期，一直闪现着这个安徽人的身影。他相貌堂堂又满腹经纶，他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他狡猾阴郁又我行我素。没有人像他那样重要，几乎一力支撑起19世纪下半叶衰老帝国的主梁。也没有人像他那样生前死后招致如此猛烈的抨击——卖国求荣——他全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把中华花花世界的万千财富出卖给洋人——他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他就是一个按钮，随时触动着饱受欺凌而万分敏感的中国人的自尊。

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由于和外国雇佣军“常胜军”打交道最多，洋枪洋炮的厉害让这位帝国新晋权力人物颇为兴奋。

他敏锐地注意到，上海在士农工商外出现了一个新兴职业：通事，这些未曾经历过科班训练的翻译，在中外交涉中往来传话，往往挑拨是非，从中渔利。这位敏感的帝国官员希望在总理衙门创办京师同文馆之后，也能在上海再办一所学校，专门培养外语人才。

在给皇帝的奏折（《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中，他汇报了具体的办学方案，将依照同文馆之例。当然，这

绝非这位雄心勃勃的官员内心的真实想法。京师同文馆只招八旗子弟，上海同文馆则从附近地方招收了十四岁以下的文童。

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渐由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在奏折的结尾，这位大清国未来最著名的大臣，预言了以后四十年自己及这个国家最聪慧的人们将投身的事业。

于是，上海广方言馆成立了。在一座中式楼阁房廊的学馆里，学生们居然在学洋鬼子说话，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林乐知是首任英文教习。广方言馆学生开始时均免费住馆就读，并享受由馆方发放的伙食费每日一钱。后来这项制度有所改变，规定学生初入馆时，每人发伙食洋两元、油烛洋半元，以后视其学习情况，酌予增加，特别优秀者，随时增加。实际上是由先前的助学金制改为奖学金制。

设立广方言馆，是李鸿章开始自强运动的第一步。他比他的同路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接下来，他将要设立军工企业，武装帝国落后的军队，并最终惠及民生。

“富国强兵”自此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梦想，并成为历届政府最高的治国方针。

三

此时的上海，繁华程度超过了帝都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十多年间英、法、美租界相继设立，上海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骤然突出，对外贸易额迅速爬升，很快超过了广州。从小刀会起义到太平天国，数百年富庶无比的江南地区顿成一片废墟。此时，上海租界成了一个“巨大的避难所”，江南的世家豪富纷纷投奔上海的租界，来自各个省份的逃难者和淘金者也挤满了上海的街道。他们把外国商人租过去的土地再租过来，形成了一个“再租界”。尽管从法律上说，租界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就这样，外商“永久租赁”了中国土地，做起了“二房东”。华人再从“永久租赁”者手上租过来土地，又成了“三房东”。

在房地产业和对外贸易的推动下，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兴城市开始崛起，成为一个畸形而又生机勃勃的帝国前哨。这个帝国东南的小小县城，变成了一座豪华的“十里洋场”。洋人们迅速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具有欧洲风格的建筑，成立了各种贸易机构和企业集团。在圆明园被毁之后的十年间，洋人们在帝国境内建立了 40 多家企业，仅上海就有 25 家。

上海发展起来，发展得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

展之快，有如肿瘤。——《出卖的上海滩》

那些怀抱着淘金梦的外国人来到上海，很难不沉湎于这远东殖民地的壮丽，这上帝眼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为了拯救这罪恶之城里的罪人，传教士们纷纷前来拯救迷途的羔羊。传教士林乐知正是怀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宏大目标来到了中国，却迫于生计做起了教书匠。

海面上刮起了清新的风，逆流而上的帆船驶过黄浦江面。这些帆船有五根桅杆，每根都挂着一面帆。一艘挂着红帆的船只，在阳光照耀下，像是成熟的栗子树。

外滩上生机勃勃。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穿着青布大褂，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高大的锡克族印度警察表情严峻，头上裹着鲜红的头巾。混杂在人群中的苦力们扛着竹扁担挑着大包小包。外国水兵吆喝着人力车夫，不时拍打一下他们。

正是得益于上海已有的近代工业基础和较为开放的思想环境，帝国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和曾国藩计划在上海建立军工企业，自己生产“坚船”和“利炮”。曾国藩此前设立了安庆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李鸿章也在上海设立了两所洋炮局，并从国外购置了一些机器。

造炮之法，先铸一实心大铁块，头大尾小，外如塔形。铸就后，锉削炮质，先定何处为炮耳，何处为浮线。外面锉磨光滑，然后用铁车对准中线。车空炮腹，由小而大，

由浅而深……

这封帝国大臣写给北京总理衙门的信函，像是一份说明书，对枪炮、炸弹和蒸汽机作出最浅显的解释。在这封三千多字的奏章里，除了向帝国中枢讲解洋武器的制作原理，李鸿章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的知识和技术背景。在当时的泱泱帝国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存在。就是李鸿章本人，彼时也许也未曾意识到蒸汽动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四

1865年，捻军起义，威胁京畿，朝廷接连发出几道圣谕，要求李鸿章带着机器和技术人员北上，在天津开办机器局。此时，这位帝国大员却另有打算。

这年夏天，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江海关道丁日昌以六万两白银买下了美商旗记铁厂，包括他们所储存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有的两所洋炮局后，中国第一家大型兵工厂诞生了，李鸿章将之取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取名为“江南”，就是为了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

李鸿章的这番解释后来被引申出更多的含义，比如，这是一个汉族人的企业，那涉及帝国晚期满汉之间微妙的对峙。

其中一个牵强的证据是，几个月后，李鸿章才在给朝廷的奏折里陈述了开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办厂理念和过程。事实上，江南制造总局是被清廷“追认”的。在这份奏折里，他承诺厂中生产的机器将仿制一份运到天津。

这年年末，中国通——英国人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了《局外旁观论》，提出工业化、财务、外交以及开办合资企业等建议。事实上，外国人不断为这个老大帝国出谋划策。1879 年，美国总统格兰特访问日本，路过中国，也力劝李鸿章仿效日本实行西法，并写信给李，预言了中日之间的差距以及战争。

此后，曾国藩因为平叛捻军不力，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由此，曾国藩成为江南制造总局的直接主管。在他的努力下，工厂在两年后从虹口搬到了高昌庙。

从现今留存的一些照片和曾国藩的奏折看，高昌庙的新局局门坐北朝南而设，正门高悬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牌匾。东、西、北三面环为高墙，正门两侧以木栅栏围之。进门中央为公务厅，东设文案房、画图房、总库房，迤北为生铁厂、木工厂；北设炮厂、大火器厂、汽锤厂、轮船器机锅炉厂，迤西设公局、翻译房、广方言馆；西为汽机厂，西北为熟铁厂，北为卷枪厂。局门外至黄浦江边

是一大片空地，有直道直通码头。直道东为长达 99 米的泥船坞和造船厂，西为木栈。

不几年间，又增设了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面积拓展到四百余亩。此外还在龙华设立了制造分局，在陈家巷设火箭分厂，在松江设火药库。19 世纪 70 年代初，这座富于近代工业气息的兵工厂，不仅成为黄浦江边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在整个远东也称得上是首屈一指。

从此，黎明中响起的机器制造声穿透了帝国南方浓浓的湿雾，向着辽阔的天宇扩散，直至迎来普照青山绿水的明媚阳光。

此时，被曾国藩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也顺利返回。在容闳的带领下，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设备。尽管不如他的学生李鸿章走得更远，曾国藩仍然是那个时代眼光最深远的大臣之一。在容闳的推动下，1871 年 8 月 5 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联名会奏，请求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

这项前无古人的留学计划尽管在第十个年头夭折了，却为中国培养了最初的一大批精通西学的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牺牲在中法、中日海战中；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一些人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他们中间出现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

1870 年春天，林乐知正在给他的学生们示范电报机的使用原理，那些梳着长辫子的学生满脸惊奇之色。林乐知再次回到广方言馆担任英文老师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了，

在中国待了数年之后，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明白不可能硬生生地把耶稣塞给中国人，他决定先从传播西方科技开始，从而吸引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并接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在传教和教学之余，他创办了一份周报《教会新报》，宣传基督教的同时也介绍一些科技知识。这份报纸在 1874 年改名为《万国公报》，北京官员们的动态、各省督抚的抚辕门抄都成了它报道的对象，北京、上海和一些大城市的官员和士人们是它的主要读者。

这个勤奋的传教士上午在楼下的广方言馆授课，下午在楼上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那位神气的江海关道道台大人都要对学生们进行考试。方法是叫学生们将简短的英文照会译成中文，这些照会都是道台大人最近一周从美国或英国领事馆收到的。这些照会同时附有一份中文译本，所以，这位不懂外文的道台大人能够对照领事馆的文件，检查每个学生的翻译水平。

五

林乐知的收入如何呢?

现存的两份译书合约副本，是林乐知的同事、美国人傅兰雅的劳动合同书。1871 年，江南制造总局聘请傅兰雅

译书的一份合约中这样记载：

聘书以三年为期，由西国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十日起，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止，照西日每月送规平银二百五十两，均连伙食、油烛、房租等项并计在内。傅先生拟欲回国省亲，约期六个月往返，回国若干月，其修金按月停支。

在另一份1874年续订的译书合约中，傅兰雅的工资涨到了英洋三百五十圆，并对辞职提出了要求："彼此如欲辞馆，皆必先半年说知。"

洋员不同时期的薪俸待遇不同，不同洋员之间应该也有差异。当时江南制造总局聘用的洋员，其中译员与教习总计十二人，其他各厂技工等一百多人。据1872年创刊的华文报纸《申报》报道，1876年4月13日，经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合具奏，清政府授予傅兰雅三品衔，同时被加衔的还有金楷理、林乐知，分别为四品和五品。由此可知，林乐知的工资收入肯定不如傅兰雅丰厚。

华人员工的收入相比之下就低廉多了。制造局的工人一开始以福建、浙江和宁波人为主，初期，工人实行按月领取工资，后来相继出现了点工制（按日取酬）、包工制（包工老板直接雇用工人）和学徒制（工资仅有成年人的四分之一）。

江南制造总局的管理大权操纵在官僚手里，因为它不

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而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受到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还有总理衙门的节制。局、厂的总办、会办、提调、委员、司事等管理人员，同其他局如厘金局、善后局等官僚机构的职别、等级一样。同时，不仅机器设备、原材料来自外国，工程师、工匠从外国请来，而且执掌企业大权的正副监督也从外国“引用”，对外国的依赖性颇高。

在新厂安顿停当后，曾国藩接续李鸿章提出的造船建议，上书要求从江海关税收入内拨出专款，供制造局造船使用。1867 年 5 月 16 日，朝廷正式批准他的请求，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酌留一成专供沪局造船之用。大为兴奋的曾国藩立即责成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应宝时、会办冯竣光、沈保靖，以及技术负责人徐寿、华蘅芳等，抓紧进行轮船的试制工作。

与当时船厂的技术水平一致，第一号轮船是木质船体，采用铁钉连接捻缝工艺制造的明轮蒸汽船。1868 年 7 月 23 日，耗费工料 81397.3 两白银的第一号轮船正式下水。曾国藩取“四海恬波，厂务安吉”之意，将之命名为“恬吉”号（后因光绪帝载湉继位，为避名讳而更名为“惠吉”号）。

“恬吉”号的排水量为 600 吨，船长 56.39 米（185 英尺），宽 8.27 米（27.2 英尺），吃水 2.44 米（8 英尺），采用一台卧式蒸汽机，额定马力 150 匹，指示马力 392 匹，顺流时速 16.2 节，逆流时速 9.45 节，装备各型火炮 9 门。轮船建成后，出吴淞口外试航，直抵舟山而返，显示其航海性能

相当不错。9 月 28 日，又上驶江宁，曾国藩亲自登舰视察，并一路驶至采石矶。

从 1868 年到 1876 年，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生产效率非常高，八年之内建造了十一艘船，有十艘是战舰，其中五艘是木壳船，其余五艘则是铁壳船。每一艘船的所有部件，包括引擎，都是在制造总局生产的。制造总局还尝试不同的设计，从单螺旋桨到多螺旋桨，从木壳船体到铁壳船体，以及从单纯的战舰到带有回转炮塔的船只。与 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制造的战舰相比，江南制造总局的船舶制造技术水平无疑要高于日本最先进的造船厂。

六

江苏人徐寿是江南制造总局技术方面的灵魂人物，他幼时学经史，研究诸子百家，与众不同的是，他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大有裨益，转而研读格致之学。因此，徐寿与同乡华蘅芳去上海，从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买回《博物新编》等一批西方科技书籍自学。经过 20 多年的刻苦学习，徐寿掌握了化学、物理、机械、数学、医学等多门学科的基础知识。1865 年，在曾国藩主持的安庆军械所，他和华蘅芳成功自制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二艘轮船“操江”号，同样是

由徐寿等人设计监造的。“操江”号船型与“恬吉”号相仿，装备80毫米克虏伯炮两门、47毫米神机炮一门，载货640吨，乘员91人，造价白银83305.9两。“操江”号的所有船体、轮机、锅炉均为厂内自造，主机还是较为新式的立机。可见，江南制造总局所产舰艇的国产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这艘军舰将在北方海域度过它的前半生，其后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海军俘获，在东瀛异国结束了它一百年的传奇一生。

1875年9月17日，江南制造总局下水了一艘自造的“蚊子船”。这艘名为“金瓯”的军舰诞生得极为突兀，可以看成是当时中国的军工技术人员紧密关注世界舰船发展潮流的结果。“金瓯”号后来的命运鲜为人知，甚至很少有关于它的照片存世。

此时，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迟缓了下来。1875年，清廷掀起了一股购买外国军舰的浪潮。朝廷大员们相信“造船不如买船”，与其花大把银子制造性能落伍的国产船舰，不如直接从外国购买。几年前坚决反对停止造船的李鸿章，如今却是最积极的外国舰船购买者。

南洋大臣沈葆桢千方百计希望购买一艘铁甲舰，出于平衡势力的需要，恭亲王支持南洋一系。李鸿章则迅速把用来买铁甲舰的钱买了两艘其他军舰——帝国内部的派系争斗，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官员。

然而，有专家认为，直到1889年，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技术比起日本兵工厂可能仍有些微领先。

1889 年之后，横须贺船厂设计了新式的钢制战船，它的第一艘现代战船比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同类型战船，马力更为强劲，最高时速也更快一些。

1876 年的一天，李鸿章和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登上一艘炮艇。一年前，李鸿章和赫德议定了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定购两艘炮艇，此番两人前去验收。李鸿章视察了一番，对这洋玩意儿表示满意。当他坐下休息时，一颗子弹突然从他头顶飞过，随从们顿时乱作一团。一个英国士兵又惊又怕，一次意外的走火事件差点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

但历史上其实少有意外。回顾以往，人们总是愿意假设：如果当时主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位英明开放雄心勃勃的伟大人物，而不是一个迷恋权术和贪图享受的女人，中国的革命又将如何？

1888 年，从德国定购的四艘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号回国，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加上此前所购买的“定远”、“镇远”和“济远”号等，北洋海军拥有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两艘铁甲舰、十艘巡洋舰和四艘蚊子船。

这年夏天，北京刚刚兴建的三海旁枝叶婆娑，水面上波光粼粼。慈禧兴奋地游览着皇宫附近的美丽山水——太后在光绪皇帝大婚后归政，然后在这里颐养天年。

这项工程花费了大清国 600 万两白银。除了内务府奉宸苑工程处从各位“忠诚的”官员那里得到的献银，就是

各海关解银，海军衙门拨银。三年后，以经费紧张为借口，户部尚书翁同龢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1894 年 11 月 7 日，慈禧庆祝她的万寿吉日，花费在 1000 万两以上，而她半个月的花费就可以买一艘英德洋舰。

也是在这一年，在紫禁城体和殿，五个花枝招展的秀女站成一排，她们羞涩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此刻，命运其实掌握在坐在上面的那个大清国最有权力的女人手里。在慈禧的授意下，皇帝选择了慈禧的侄女做帝国的皇后，户部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为妃子。后世传言，年轻的光绪帝对长叙的小女儿一见钟情。但也有人说，其实光绪真正喜欢的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大女儿——帝国的皇帝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他已经习惯了对座上的女人唯命是从。

也是在这年底，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

几件似乎不怎么相干的事情，最终在 1894 年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引发了中国历史的大震荡。

七

前往日本马关议和的代表团正行驶在日本海海面上。在中国，在帝国通往京师的官道上，成千上万名身穿蓝色长袍的文人正在匆忙赶路。

帝国文人们被国家不幸的消息震晕了。林乐知在他的报纸上，公布了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和日本人谈判的谈话记录和往来文件，这份报纸的发行量随之激增到4000份，为当时各刊物之首。康有为也是它的忠实读者。

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发动参加考试的举人们，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反对中日签订和约，要求帝国进行最深刻的变革。

输在日本手上的那场没有预料到的海军大灾难，震惊了许多文人和官员。在帝国文人圈中，引发一种对于西方学问的新的敬意。“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美国传教士傅兰雅说。

《中外纪闻》、《官书局汇报》、《时务报》、《湘报》，帝国知识分子们掀起了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石印，类似传单的东西满天飞。由知识分子和官吏们发起的学会已经有50多个，最有名的是“强学会”，会员都是高层知识分子和各级官员，甚至一些洋人也入了会。居住在贤良寺的李鸿章也像翁同龢一样想捐5000两银子入会，结果被骄傲的帝国文人们拒绝了。

变法！变法！变法！

年轻的光绪皇帝热血沸腾了。

皇帝恨不得一天之内让他的天下焕然一新。在短短103天里，他发出了七十多条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变革令，文教变革令八十多条，政治变革令则多达九十多条。政令

鼓励民间工商业投资，发展铁路和矿业，改革考试制度，要求王公贵族们出国游学，撤销诸多衙门，鼓励官民论政……

帝国的变法匆匆忙忙地开始，又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这场变法的策划人、几个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官员逃的逃，死的死。康有为、梁启超成功出逃，谭嗣同慷慨就义，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一起罹难。

这也许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变革，尽管事后当事人用颇有戏剧性的说法归罪于袁世凯的告密。但这场一开始便没有主要力量支持的变法，就像种在没有土壤的花盆里的花儿，注定会夭折。单凭底层知识分子的一腔热情已经浇灌不了这太过贫瘠的土地了，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知识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大多数传统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然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可能也并未想到，这次事件直接把知识分子推到了暴力革命的那一面。

“戊戌变法”失败后，皇帝孤零零地被囚禁在皇宫西面的瀛台，他宠爱的妃子珍妃也被打入了冷宫。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月里，帝国官方声称皇帝病得很重，洋人们表示怀疑。驻华公使们联合提出派外国医生，用医学领域里最新的科技成果为皇帝检查身体。

年迈的李鸿章则再次迎来朝廷任命的诏书，他将到距离京城十分遥远的南方出任两广总督。两年后，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一生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达权

力的高峰。之后，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把珍妃扔进了皇宫冷冰冰的井里，带着光绪狼狈逃往西安，途中发出一道道谕令，催李鸿章北上收拾她一手造成的烂摊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可以看成是几十年来与西方对抗中民族情绪的总爆发，或者说是一个自大的不开化的民族的盲目反抗。朝廷情绪化、戏剧化的宣战，使一场灾难以挑逗开始，以惨烈告终。

负责签订空前屈辱的城下之盟，使多年搞洋务的李鸿章迅速衰老，他在条约签订的两个月之后，背着“汉奸”的骂名寂寞地死去。签约后，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皎洁的明月照耀着大清帝国，宫殿巍峨，古木参天，城墙绵延，夜市繁华。

但是，离结局已经不远。

始于荣华，终于憔悴

主要人物：恭亲王奕䜣（1833—1898）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帝王们对于过去繁华的回忆往往更能博得普通人的一掬眼泪。追究起来，不过是繁华事散，更显出无比的凄凉，两相对照，自然令破败也闪闪发光。

1898年5月29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的黄昏，大清王族里最后的光辉人物在与死神作无益的抗争。

恭亲王奕䜣，这位大清帝国曾经的中流砥柱，终生深陷在与政治的缠绵之中，时而位及人臣，时而避居山野，但总是处于大清国政治光线的映照之下。然而，出身的无与伦比，天生的智慧过人，都无法解除他此刻的痛苦。他的声音再也无法越过王府的高墙，传达到朝臣中间，此刻，只有呻吟飘荡于什刹海的水面之上。

作为天潢贵胄，他依然充满了担忧，为朝局动荡，为列强环伺，为大清命运，而迟迟不肯西归。当慈禧与光绪帝探望他时，他流着眼泪嘱咐年轻的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

年轻而充满了中兴热情的光绪把这当成是垂死者的呓语。在奕䜣死后的第十三天，在康有为等一帮维新人士的鼓动下，光绪皇帝昭告天下，宣布了一系列变法举措。然

而，仅仅在 103 天之后，他便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囚禁于瀛台，此后在那里寂寞地死去。

13 年后，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彻底摧毁了统治中国达 267 年之久的大清帝国。奕䜣生前殚精竭虑为之奔波数十年而避免出现的历史命运，还是降临到了爱新觉罗的子孙和无数臣民身上。

恭亲王地下有知，一定会垂泪痛哭，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长命到目睹王朝覆灭的悲惨景象。在与慈禧明争暗斗了二十余年后，恭亲王安静地长眠了，只留下一座美丽的王府。

一座王府

著名史学家单士元 1938 年曾著有《恭王府沿革考略》一书，介绍“恭王府初为乾隆时内阁大学士和珅第宅，嘉庆四年（1799 年），和珅获罪，第宅入官，嘉庆将其一部分赐给其弟永璘，是为庆王府。咸丰元年（1851 年），咸丰帝收回后又转赐给其弟奕䜣，是为恭王府”。据说，永璘改造和珅府的时候，只是加了一些“门面”。到同治初年，经过“辛酉政变”，奕䜣和慈禧处于密切合作时期。身兼议政王、军机领班大臣等要职，在权力的顶峰之际，奕䜣对恭王府大加改建，确定了恭王府的最终规模。

如今对外开放的其实只是恭王府的花园部分。作为典型的明清王府，恭王府整座建筑坐北朝南，西邻柳荫街，东至毡子胡同（乾隆时叫未厂门口），南到前海西街，北至大翔凤胡同（据说原来叫大墙缝胡同），南北长 330 米，东西宽 180 米，总占地面积近 6 万平方米。

恭王府的建筑格局为三路四进，布局极其工整，皆由严格的轴线贯穿着的四合院组成，最后面环抱着 160 米长的通脊连檐两层后罩楼，楼后面就是王府花园——萃锦园。

现在，站在前海西街音乐学院附中大门外，远远能看到一座三开间的大门，门前是一对虎虎有生气的石狮子。绿色的琉璃瓦脊上装饰着走兽，过去王府里的人们还管这里叫“狮子院”。恭王府中轴线上的建筑物全部覆以绿琉璃瓦和琉璃屋脊，吻兽，而两厢配殿则用灰筒瓦。1949 年后，这里成了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

进入大门，正北是一座五开间的二门。穿二门则为中路的正殿，俗称“银安殿”。根据清朝对王侯府第的规定，府第的规模布局与主人的级别直接相关。亲王府应有正殿七间，郡王减少到五间，从贝勒起再向下根本就无正殿。正殿在王府中承担着最重要的功能：重大庆典，比如过年，过生日以及重大喜庆活动，等。

1921 年元宵节的一次火灾，把银安殿和东西配殿烧了个干净，如今只有高大的石台基和柱础显示出当日大殿的雄壮。

府邸东路的轴线上，目前只存两座院落。前院正房有

个很喜庆的名字“多福轩”，墙上挂满了各种字体的福字，是奕䜣的客厅。据说，恭亲王当年就是在这里接待了英法联军的谈判代表。设身处地地想，当时的奕䜣肯定没有觉得“多福”，相反，应当叫“多难”。建筑的细部所体现出的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惊心动魄。

我去的那年，艺术学院已经搬走，正在修整整个府邸，从北向南，也就是从花园方向开始逐一修缮这些古建筑，修完一处就开放一处，最先完工的将是多福轩。到时，我们将有机会站在多福轩里体会恭亲王当年面对入侵者时复杂的心情。

西路中进院，有正厅五间，名为“葆光室”，是恭亲王的亲哥哥咸丰皇帝的手笔。两旁有耳房三间，配房五间。据说，这里曾是奕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的居所。西路院落最后一进的正厅在和珅时期名为“庆颐堂”，缘起于乾隆赐给他的“庆颐良辅”的匾额。《嘉庆实录》记载，和珅罪状第十三款：“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隔断式样皆仿宁寿宫制度……”其中所说的“楠木房屋”即指庆颐堂。恭亲王则选择在这里存放西晋文豪陆机价值连城的《平复帖》，遂改其名为“锡晋斋”。权臣因之获罪的会客厅，后来成为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们可以堂而皇之进入的地方，在这里探讨艺术和美。锡晋斋这个名字的内涵倒是得到了延续，没有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主人和过客们来来去去。在锡晋斋和葆光室之间，有垂花门一座，两株粗壮茂盛的海棠已经静立近三百年。人

非草木，人又哪里比得上草木？

三路院落的后面，是两层的后罩楼。楼中间的一扇过道门，通向府后的花园——萃锦园。

花园的布局也分三路。进入花园，一条180米长、宽10米多的青砖箭道延伸着游客的视野。八旗之弟入关之后仍重骑射等武功，过去，这里就是王爷和子弟们跑马射箭之地。

箭道向北，是土石小山，令园中景物若隐若现。偏西有一小段青砖“城墙”，石额上书写着“榆关”两字。“榆关”是山海关的别称，在自家的园子里修建这样的景观，无非是寄寓着心怀天下、不忘关外故土的心境吧，这种作派在古建筑里比比皆是。贴着榆关内墙，在西南土山的脚下，是三间敞轩，名字就叫“秋水山房”。在它以东的小山旁有一座木制的方亭，名字叫“妙香亭”。上下两层，底层有十二根柱子，为八角式，上层则是四角平顶，结构很是新奇。

箭道向东行，是王府的“三绝”之一：“西洋门”。据说在当时的北京，这样的门只有三个。两段带花窗的青砖簇拥着的西洋式砖石雕花拱券门。便是花园的正门。步入西洋门，一块巨大的高约五米的太湖石遮挡住了园里大部分景物，就如同花园的屏风一般。中路的“福字碑”也被称为“三绝”之一。福字碑置于假山下的秘云洞正中。康熙手书的福字碑，正面书一草书“福”字，正上方是“康熙御笔”玺印。用糯米砌筑而成的假山非常坚固，山上有

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来增加院中的湿度，据说从前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秘云洞一侧的两株小海棠，花苞累累可爱。若干年前，王孙们在此流连之时，海棠相伴，他们会不会怕夜深花睡去，而点燃红烛，照亮这一方胜景？

沿秘云洞两侧的石级盘旋，就上到假山顶的“邀月台”。这是全园的最高点，登临览胜，古木轩院，尽收眼底。沿邀月台的爬山彩廊而下，可抵达东路最重要的建筑——“大戏楼”的北门。大戏楼是王府“三绝”的另外一绝，整座大厅无一根立柱，各方均可直视戏台。中间是主宾席，两侧为女眷的陪座。

大戏楼最后一次盛大演出是 1936 年，当时仍然住在萃锦园里的奕䜣之孙溥心畬为母亲祝寿。京剧界的名角梅兰芳、程继先纷纷献艺，以介眉寿。这次热闹非凡的堂会是恭王府的最后一次盛筵，从此，王孙风流云散，沦为庶民。

如今，大戏楼定期举办一些京剧、昆曲演出，不过是游人们怀古的许多项目中微小的一项，再不复当年的繁华气象。

一个传闻

民间有一种说法，和珅府之前，恭王府的前身一度为

曹寅的旧宅。而曹雪芹本人五岁来京后，也曾住在什刹海附近。

什刹海附近的老居民都听过大观园在此的传闻。据说，《红楼梦》里贾母带领一干人等打平安醮的“清虚观”，就在后海之北旧鼓楼大街的清虚观胡同；贾琏偷娶尤二姐的花枝胡同，就在恭王府的西北方；而薛蟠被柳湘莲痛扁的苇子坑，也在离府不远的德胜门外。

早在1938年，单士元先生在《恭王府沿革考略》一文中，就记录了这些传闻：

府之最初历史，有谓为康熙间大学士明珠旧第，遂以说部《红楼梦》之大观园附会之。关于此点，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闾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

这个传闻立足点是索隐派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其实早在清末民初，类似说法已被形诸笔墨。徐珂在《清稗类钞》里就说：“京师后城之西北，有大观园旧址，树石池水，犹隐约可辨。”

尽管单先生认为“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但诸多红学家还是孜孜以求，对此地进行考证与推论，结果仍是各执一词，难有定论。20世纪40年代，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根据《红楼梦》原文绘了一张《荣国府院宇示意图》，图中的荣国府在布局上竟然与现在的恭王府如出一辙。与之对立的一种意见认为：清代实行分旗居住，曹雪芹属正白旗，

曹家故宅应在正白旗的领地上，那就在北京城东，与恭王府扯不上半点关系。

在一个口头上尊重历史，实际上却似乎蔑视历史（帝王史除外，但许多记载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的国度，即使仅仅过去两三百年，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一个人的原始材料也极其有限，遑论历经变迁的建筑，因而文人诗赋、民间传说充斥着这座传奇的王府。

在恭王府花园里游览，导游往往大讲特讲和珅的种种“逸事”，大概是得益于好几部关于和珅的电视剧的热播。园子的销售厅摆放的都是《和珅传奇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和珅秘传》这样的书籍。在导游的带领下，游客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和珅曾经走过的“官道”，议论着这位权相如何弄权。倒是这园子确凿无误的主人奕䜣，很少有人提起。也许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奕䜣此人，即使知道，也只是历史课本上平板的介绍，比如崇洋卖国之类。

府里设置的“清史展”只是一些谕令和清朝的一些文告，以及王府里的一些实物（复制品）。如果不是曾经读过一些晚清的历史，恐怕参观完恭王府，对奕䜣此人，我的了解还是极其有限，或者说非常片面。恭王府里实在应该有一本《奕䜣传》啊！

几个王孙

与祖父相比，第二代恭亲王溥伟更加生不逢时。奕䜣病逝后，长孙多罗贝勒溥伟承袭王爵，被称为“小恭王”。在清末的王公亲贵中，溥伟堪称优秀的人才，只是他愿意为之努力的一切早已不堪一击。经十余年之激荡，清廷终于式微，任是奕䜣再生，也只能徒唤奈何。

1908年，二十八岁的溥伟接受摄政王载沣的派遣，自愿带着祖传的白虹刀前去刺杀袁世凯，但由于一些“亲袁派”大臣的反对而作罢，但小恭王的血性表露无疑。风雨飘摇的大清朝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孰料袁利用军权逼宫。溥伟和升允、良弼等人共同组建“宗社党”，宗旨就是反对皇帝退位，反对袁世凯，反对议和，挽救大清朝。

但在无情的历史命运面前，溥伟的努力于国无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复国梦一直不曾打消。为筹集复国经费，溥伟卖掉价值不菲的珍宝古玩，又将土地作为抵押，向日本银行借款，以三年为期。自信的溥伟相信，他可以在三年内恢复大清的统治。之后，由于开销太大，他不得不以恭王府作为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借贷八万大洋。

复国梦遥，借款却是越积越多，原先的八万大洋滚到了二十万。末路王孙无力偿还，只好把府邸部分用来还债。1932年，由罗马教会兴办的辅仁大学通过教会之间的关系，用一百零八根金条代偿了这笔贷款，产权遂归这所教会大

学。1937 年，因扩充校舍，府邸部分作为女院，并把后罩楼通向花园的通道堵死。

国亡家毁，大清复辟梦终成一场空。1936 年，复国无望的溥伟死于沈阳。伪满皇帝溥仪在“上谕”里称赞他“辛亥以还，毁家奔走，历经艰苦，坚贞不渝”，概括可谓准确之至。

也在 1937 年，原来居住在萃锦园的溥伟二弟溥儒（溥心畬），也以十万银元的价格把花园卖给了辅仁大学。在此居住了数十年的恭王子孙，从此永远离开了宛若桃源的恭王府，投入了园子外面繁杂滚烫的世俗世界里。

相较溥伟的血性和坚贞，溥心畬更像是一位末代王孙的典型。

他出生的时候，恰好祖父奕䜣于甲午战争时期重新被起用。不到半岁的溥心畬因此被赐予头品顶戴，又蒙帝后召见，小小年纪已然沾染到不少皇恩。甲午惨败，创痛深巨，奕䜣老调重弹，继续搞起了此前的洋务运动。然而既迁延日久，积重难返，终不能大见成效，况形势已变，洋务已成旧饽饽。恭亲王病逝后，迨及清朝覆灭，恭亲王府随之衰落。

在权力和富贵失去之后，贵族遗留的只能是庶民难以企及的文化修养。像大部分没落贵族一样，溥心畬选择寄情诗、书、画。20 世纪 20 年代，溥心畬声名渐起，他与张大千的画作经常一起出现在北京的书画流通中心琉璃厂，销路甚广。一时有“南张北溥”之说，因他二人分别专攻

南宗、北宗山水画。

被称做“中国最后一个文人画家”的溥心畬1963年病逝于台北，被安葬在阳明山后山，墓碑上刻着“西山逸士溥儒之墓”。

他的大部分书画作品盖的都是一枚“旧王孙”图章，书画落款也从未使用过民国纪年。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帝王们对于过去繁华的回忆往往更能博得普通人的一掬眼泪。追究起来，不过是繁华事散，更显出无比的凄凉，两相对照，自然令破败也闪闪发光。然而无论怎样痛挽，也难以追回逝去的时间，这种留恋遂转换成为一种审美上的力量。兴衰存亡，既是对一个家族的，也是对人生的。

清末一位文人说过：“帝王将相的权力为一百年，而文人的权力可以有一万年。”作为王孙的溥心畬生于末世，贵运消磨，但作为文人的他，却重重地烙印在历史之中。

一座王府，始于荣华，终于憔悴，就如同对一段历史小范围的模仿。在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前，人的思想和意识早已与传统断裂。倒是建筑，在蜕变与分割中渐渐成为历史的代言。

慈禧的选择

主要人物：慈禧太后（1835—1908）

1900年，世纪之交，内外交困衰败不堪的大清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而危险：那些来自于华北平原，被饥饿和绝望驱使着的农民，喧嚷着进入了北京城；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军队亦已开进了与皇宫相距不远的东交民巷。帝国朝廷里吵吵嚷嚷，臣子们分成了两派。剿除，还是抚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慈禧太后的面前。

考察

一队清兵簇拥着两乘轿子行走在帝国的官道上。

这是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奉命前往河北涿州“考察”义和团的实力。赵舒翘为科举出身，任职刑部，据吴永在《庚子西绥丛谈》里说，他“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在戊戌变法中，赵舒翘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对六君子下手又快又狠，因此深得宠信，入了军机处。

如今，他被委以重任。名义上，他们是前去“宣抚拳勇”，这是自义和团闹事以来，朝廷暧昧态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在两天前，朝廷刚刚指示文渊阁大学士、京畿武卫五军统帅荣禄，近畿一带有拳民聚众滋事，然而“此等拳

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不准其派兵剿办。帝国的政策，如同玩跷跷板，在“剿”和“抚”之间游离徘徊。

“戊戌变法”后再度听政的慈禧太后此时住在颐和园里，尽管已六十有余，她仍然精力充沛，决断非常。在此非常之际，她照旧在园子里召戏班唱戏，欣赏一出出戏曲。和山东、河北的拳民一样，太后喜欢看戏。戏曲把政治的纷繁复杂、人生的沉重哀伤皆化为唱念做打，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最朴素的情感模式和道德观念。

到达涿州城的赵舒翘也在欣赏一出极为特别的戏剧，此时，涿州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城门上插着义和团的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城墙上，城里，到处是红巾红衣的团民。5 月底，义和团蜂拥进入这个京畿小城。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农民接管了当地军政，涿州知府龚荫培左右为难。朝廷态度暧昧，该如何是好？幸亏帝国官员极富聪明才智，他选择主动绝食：非暴力，不合作，不表态。

赵舒翘欣赏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些义和团的看家本领。这些青壮农民，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呼呼跳跳，如狂醉之人。

饱读诗书、精通律法的赵舒翘大人如何向慈禧太后汇报这次考察结果的呢？

当太后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时任直隶怀来知县的吴永曾在庚子

年两宫西狩时接驾，据他口述，曾听慈禧说皆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

随后到达涿州的另一位军机大臣刚毅是狂热的仇洋派，他和赵舒翘的看法大相径庭。吴永又回忆说，赵舒翘明白义和团不可凭恃，同行的何乃莹代拟了一折。然而他碍于端王和刚毅是义和团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刚毅推举，关系甚好，踌躇再三，还是没有上折。如果赵舒翘以一个标准儒家“奉君忘身、殉国忘家”的精神，能把他所见的真实情状一一陈奏，明白无误地主张拳民不可靠，太后还会不会开战呢?

自然，历史没有分岔口，也无法设想，但赵舒翘无疑作了一个彼时对自己有利的决定。然而，古老的中国哲学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此赵舒翘与刚毅连在一起，被目为援引义和团入京的朝廷大员，后来李鸿章亦有“刚、赵祖匪”的电奏。

一年之后，八国联军要求惩罚义和团事件的罪魁，赵舒翘名列其中。刚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赵舒翘被赐自尽。他的死亡过程极其痛苦，据吴永记述，前来护驾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被派去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覆数次而后毙命”。

开会

像在“庚子事变”之中与之后接二连三掉了脑袋的朝廷大员们一样，赵舒翘也许只是一个牺牲品。

谁也无法忖度老太后的真实想法。在她眼里，义和团到底是何等模样？在她心里，局势到底要向哪个方向发展？

到这一年，她执政已届四十年。她早已成为一个娴熟的政治家，历经过无数政治上的惊涛，也亲自体验过战争骇浪，性格坚毅，决断不二。多年的政治生活也让她心思深沉，轻易不外露，连身边服侍多年的宫女都觉得她的心比海还深。

多年以后，她在历史书上的形象都是颟顸愚蠢，迹近胡搅蛮缠的无知妇女。然而，能够成为大清国几十年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其才力绝非一般。对于义和团，她的心情极为矛盾。按说，以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她当然知晓这群被饥饿结合起来的拳民，除了骚乱，不可能带给大清国真正的安全。而且，在5月29日到6月4日之间，她的心腹荣禄连上七书，提醒太后，不管拳民是良是莠，他们的行为将导致外国的武装干涉，这比拳乱还要危险。就在派赵舒翘查看义和团实力的第二天，慈禧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满清王公。也就在这天，拳民们在天津落垡车站破坏了京津铁路，和聂士成军开战达两小时。

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层吵成一团，会上明显分为两派。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于6月14日所上的一份奏折里，对此讲得极为明白："今廷臣持论，约有两端，均非弥患之道。一则谓该匪声势已大，宜一律痛剿，以除内乱。此未免不分良莠，殊失我国家子惠元元之意。一则认该匪为义民，欲倚以剿灭洋人。此论虽出血诚，召乱尤速……"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徐桐（汉族，大学士，大阿哥师傅）、崇绮（满族，同治岳父）、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大声疾呼，要求太后承认义和团，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慷慨激昂，别的大臣稍有异议，便谓之"通夷"。里通外国，出卖国家，这个罪名历来都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仇洋派完全主导了这次会议。

饶是如此，慈禧仍然没有作出最终决断。6月6日到8日，朝廷继续发布禁拳的上谕。同时，6日的宫廷会议决定派刚毅去视察拳民。一路上，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同时要武卫中军停止剿拳行动。6月7日，大批拳民公开进入北京城。原本驻扎在京郊南苑的董福祥部也奉调入京，以对抗外国使馆卫队。

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北方的初夏绿意盎然，点缀着古老帝都的沉重色调，空气中尚遗留着槐花的香味。习惯了安静清新的居民们突然发现，头戴红巾标志的拳民们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入了帝都。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朝廷上下都认为，太后无疑是支持

拳民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日记里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

端郡王的王府成了义和团北京总部，北京居民们第一次看到"普通人"在王府里进出。府邸大门口香烟缭绕，念咒声、刀枪声，声声入耳。一时间，义和团成了城中的热门话题。

任命

京城铁匠铺日夜打造刀剑，生意红火，大刀、长矛的价格疯长。京郊各县乡的武器也纷纷运进京城，而官府居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许，这可真是千古以来未曾有之事。

巡视铁路沿线回京后的荣禄觉得事态严重，请求太后从颐和园回宫主持朝政。

6 月 9 日，慈禧重返紫禁城。

6 月 10 日，她任命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名随同载漪进入总理衙门的官员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和礼部侍郎那桐皆为仇洋派，庆亲王奕劻顿时没有了实权。

这个任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外国人尤其视此为太后和外国决裂的决心。

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算是慈禧的子侄辈。这位在史书里被描述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

的皇亲，因为娶了慈禧的内侄女，而从毫无希望的公爵摇身一变成了郡王。他被过继给瑞怀亲王，被封为贝勒，以后承袭的也应该是“瑞郡王”，由于办理手续的大臣写了错字，结果成了“端郡王”。在1899年以前，这位清王爷的身影并未出现在中国的权力中枢。

直到1900年1月1日。

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自己身体不好，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立端郡王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皇帝子嗣。各国公使则频频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表示他们只承认光绪帝为中国首脑。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为一位中国皇帝体检——1899年12月19日，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瀛台，用当时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听诊器、压舌板为光绪看病。

关于皇帝企图逃跑的消息在民间四处流传。各国公使则实打实地发了份外交照会，说明如果光绪不明不白地死去，将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戊戌变法”中逃到国外的康有为也向全世界发电文，号召华侨们起来反对慈禧，支持光绪。

满心期望着儿子承继大宝的端郡王由此成为铁杆的仇洋派。无疑，慈禧对关于最高权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高度敏感，载漪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废黜光绪遭到了外交使团的一致反对，借用一下底层的政治力量未尝不是一着妙棋。

普遍的说法是载漪不断挑起慈禧对洋人的痛恨，同时，又在老太后心里为义和团加码。慈禧西逃之后，曾对吴永

回忆当时情状："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多年来浸淫中国官场，他对这一备受关注的任命自有独特的看法。在写给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中，他这样说："过去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一些极端的仇洋派在进入总理衙门之后，由于责任重大，在对外交更加熟悉之后，反而变得友善起来。所以我认为端王入总署未必是件坏事。"

这位从 1854 年便服务于清廷的中国通揣测，慈禧把端王推到前台，让他亲自解决，毕竟他需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利益。西方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饱受中国文化毒害的老迈之人的谵妄之语。赫德无疑也抓住了慈禧太后的部分心理，毕竟，6 月 10 日的任命并未显示出太后抗洋的决心已定。

这一天，西摩联军上千名先头部队从天津出发，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北京将面临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

犹豫

慈禧陷入两难之中。

一方面，义和团在北京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她回忆说："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端郡王为首的仇洋派散布流言，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便是光绪皇帝，因他效法外洋，是教民"总教主"；"二虎"指办洋务的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则指京师所有的洋人。6 月 16 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熊熊燃烧，彼时天空刮起了大风，约一千余民宅和大批商铺被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慈禧曾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占据北京，二十几岁的她和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烧，咸丰死于热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她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真正与列强彻底决裂。

于是，从朝廷发出的上谕互相矛盾。既未明确发出命令指示武卫军阻挡联军前进，一会儿又要军队进京剿匪，一会儿又要武卫军去保卫天津和大沽口，前线军队不知所从。他们大概处于历史上最乌龙之状态：同时面临势同水火的两方敌人，又都无法明确该予以剿除还是抵抗。6 月 10 日，驻守杨村的聂士成急电直隶总督裕禄："今午忽有

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车直赴北京。正欲诘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饬办理等语。”

夹在义和团和联军之间，聂士成在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此时，对于联军的真正目的，慈禧仍然不能确定。

此时，华北的军力颇为可观：武卫军共有10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16营1万人，董福祥后军1.1万人，共25营驻守北京。宋庆左军1.2万人在山海关一带驻防，袁世凯右军7营7000多人在山东，直隶尚有聂士成前军20营1.6万人。京师庆亲王奕劻统领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有1万人，此外还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

慈禧太后决定，调集宋庆部和袁世凯部驻扎京津一带。同时，她电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

同时，清廷和公使团的接触仍未中断，这证明赫德所言未尝不是慈禧太后心中所想。总署大臣许景澄分别在6月11日和13日前往拜会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11日一同前去的是另外一位大臣袁昶，两位富有洋务经验的大臣一贯主张剿拳。13日，则有三位重臣和许景澄一道前来。可惜，因为西摩联军撑腰，窦纳乐对中方建议西摩联军暂缓进京之说不屑一顾。

既然劝阻无效，慈禧在给裕禄的上谕中说，北京洋兵已有千余名，“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她下令，“倘再有各国军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

命令“迅将聂士成一军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以阻止洋兵。

这是迄今为止意思最为明确的一道上谕，在洋人步步进逼下，慈禧已决心抗洋。

宣战

6 月 15 日，北京的义和团开始攻击教堂和使馆。16 日，义和团向天主教北方教区总堂西什库大教堂发起了进攻。就在这一天，慈禧召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谈论如何对付联军，近百名高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首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仇洋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辩论。太常寺卿袁昶说拳民法术不可恃，不能倚靠他们保卫国家。

“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出乎意料，慈禧太后突然质问。

太后一表态，主和派自然偃旗息鼓。

会议作出了几项决策：一是那桐和许景澄出城劝说联军返回天津；二是荣禄全力保护使馆，同时发谕给直隶总督裕禄，让他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交涉，不再续派洋兵北上；三是招募拳民参加防御战；四是调袁世凯部开

赴直隶。

毫无疑问，慈禧此时“用拳抗洋”之心已明，但是和还是战，尚存狐疑。在给刚毅等人的上谕里，她特别提醒这位极端仇洋派：“究竟该拳民临敌结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严加察验，谋定后动。”

次日，许景澄和那桐刚出城门，就被义和团拦截下来，被痛骂之后释放，折返城中。朝廷在 17 日这天也收到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消息：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送来一份紧急报告：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慈禧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天，大沽口炮台已经在上午八时沦陷。战争事实上已经正式打响了。

就在这天，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据恽毓鼎记载，太后抛出了一份洋人照会，内容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在会议上，慈禧只宣布了前三条。恽毓鼎和吴永事后所记，都称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密报荣禄后转给慈禧的。

“洋人照会”是整个“庚子事变”里最扑朔迷离的事件，照会是真是假？甚至御前会议上有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份照会，都没有确定无疑的史料证据。学者相蓝欣多年来潜心研究义和团，他在西方史料中亦未曾发现有提及照会之处。不少学者认为，照会里的每一条都足以导致战争，这样一份照会应该是由端郡王伪造的，他太急于让儿子坐上龙椅了。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一向为人持重、主张剿拳的荣禄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慈禧的心境可想而知。当天早晨荣禄送达照会之后，太监和宫女们就耳语说太后哭了。从1900年初以来，她一直恐惧、担心的事情便是洋人们要夺走她的权力。这次会议，她一到场，开口便说道："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载漪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到了。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仇洋派大哭大喊，请求立刻开战。年轻的皇帝眼见开战势所不免，痛哭不已。在一片激愤中，慈禧宣布：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出乎意料的是，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尚书立山，这两位满族大臣这时表示乱民不可靠，中国军力太弱，不是洋人对手。兵部尚书徐用仪也站出来表示反对。也许是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加之裕禄一直未把大沽沦陷的军情上报，因此大沽炮台是否失陷成为慈禧下一步决策的最重要依据。

她派三位主和的大臣去公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炮台。18日的这次访问气氛甚好，却全无效用。因此，在

当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攻打使馆。联元再次站出来表示反对，被载漪目为“汉奸”，差点被斩首。

慈禧还在等待裕禄进一步的报告。

19 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慈禧宣布把洋人驱逐出京，在 24 小时内执行，许景澄奉命去使馆传达帝国政府的命令。此时，光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走下来，他走到许面前，拉着他的手，问是否有转圜余地。孱弱的皇帝泪光闪闪，许景澄也不由得眼眶湿润。

君臣挥泪相对。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据恽毓鼎记载，联元，这位勇敢的满族大臣再次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慈禧命令草拟《宣战诏书》。6 月 20 日的御前会议上，她对着黑压压一片的满汉大臣解释，洋人欺辱太甚，皇帝已经承认没有能力管理国家，洋人还要来干预！如今又来索要大沽炮台，无礼至极。今日臣民同心协力，永杜外人欺侮。最后，她命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送各省。

宣战诏书出自军机章京连文冲之手，大气磅礴，下笔含情。这份有中国特色的宣战诏书，先是历数洋人传教，欺压中国，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之境：“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

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于是，饱受欺压的中国皇帝悲壮地宣布：“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6 月 21 日，这份史无前例的《宣战诏书》发表，矛头所指，是一个指代不明确的“彼等”。

疾风中的白露

主要人物：秋瑾（1875—1907）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1907年7月15日破晓，绍兴城浓云蔽天，阴风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轩亭口，秋瑾以谋反罪被斩首。

红颜喋血，以身殉国，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犹如疾风中的白露，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学者夏晓虹指出：“从民间团体的抗争到统治阵营的离析，从质询法律依据到实行革命暗杀，晚清社会变动的诸般征兆，在此案例中已有充足的表现。”

后来的评论者们认为，秋瑾以先觉者的姿态，为中国的女性创立了一个新纪元，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娜拉出走后究竟往哪里去”的答案。然而，秋瑾短暂的一生，却是其他女性所无法复制的人生。她姓秋，在汉语里，这个词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她的早年诗歌中，即便在留学归国后，她亦有“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那样的悲凉之句。

肃杀的悲剧情怀一直是她内心深处的底色。在写给王

时泽的信里，她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从中可以看出她强烈的自我牺牲的心怀——她发现了崇高的社会理想，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事实上，她的文章和诗词里，一直有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期许和欣快。

秋瑾对国家命运的强烈感情，则毫无疑义。这种感情与她所处之时代环境有特别的关联，在其背后亦有社会经济的背景，自然也与她的个性密切相关。正是这些条件，把秋瑾塑造成一位传统中国情怀滋养下的近代女性，而非欧洲式的人物，一如她的偶像——法国大革命女英雄罗兰夫人那样。

弃家·留学

1903年10月5日，正是传统的中秋佳节，秋瑾从北京的家出走。这可视做她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抛弃。此时，她已是两个子女的母亲。从此，她只身留学日本，仅探视过一次子女，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向公公索款办学。朋友问起她的家庭，她说"如隔世矣"。天伦情淡，母性转薄，这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缺乏情义。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事实上，她此后的言行代表了全中国女性的觉醒，"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

秋瑾的出走，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她所生活的时代。她20岁奉父命嫁到湖南的富豪之家，却“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丈夫王廷钧虽为翩翩佳公子，却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到1903年，两人已是南辕北辙。如果她是一个旧式的才女，面对这样的人生悲剧，慑于伦常约束，大概只能郁郁而终。值得庆幸的是，这已是20世纪初。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早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这两点提出来，作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

19世纪90年代，这些批评家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一个先决条件。1898年，中国女学堂（后更名为“中国女学会书塾”）在上海创立。女子社会化教育兴起，传统的三从四德观念被冲开了一道缺口，而且愈来愈大。

正是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时期，秋瑾结识了书法家吴芝瑛。吴发起了“上层妇女谈话会”和“妇人不缠足会”，两位才女成为金兰之契。离家出走后，秋瑾便住在吴家，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其幼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秋瑾当时阅读新书报，目睹国家危亡，“思以改革为己任”。这样一个眼界渐开的女性，当丈夫出去吃“花酒”时，她便女扮男装，带上仆人出去看京戏，遭到丈夫暴力相向后，终至夫妻反目。

秋瑾生于江南的知识官僚家庭，后来，出于宣讲女权的目的，她说中国女子“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我们在今天可以质疑：过去的女子

都是祥林嫂吗？在国族危机之下，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女性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演变成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

陈东原写《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其前提便是："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事实上，在秋瑾所生活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一直存在一个拥有文学和传统教育的闺秀群体。秋宗章曾忆及父女之间的温情场面，父亲在公余或饭后，为秋瑾讲授旧籍，为她点批小诗，那正是数个世纪以来江南士大夫家庭的传统场景。

在女性没有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的时代，这样的教育里蕴涵着饱满个性的可能性。秋瑾崇仰历史上的人杰鬼雄，比如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梁红玉等。17 岁，她便写下"红颜谁说不封侯"这样的诗句。这样的野心，终于发展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她的方式，就是她对日本友人服部繁子所言："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从 1903 年 2 月 23 日起，秋瑾正式改穿男装，曾令初次见面的服部繁子不辨雄雌："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1904 年至 1905 年，秋瑾至少参加了天地会、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六个会党、革

命组织，其热情和精力为大部分男子所不及。

历史学家范文澜也在《女革命家秋瑾》里说："绍兴乃江南水乡，骑马者本已罕见，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着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秋瑾死难后，风传绍兴士绅汤寿潜为告密者之一，而他正是因为看不惯她的此种做派。

赴死·拷问

1907年1月，就在秋瑾死难的前半年，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秋瑾集总务、印刷、发行、编辑、撰稿于一身，在北京、杭州、绍兴设立了特约代销处，每期售价二角。这份只出了两期的报纸（第三期未印刷），志向非凡，在发刊词里，秋瑾比喻《中国女报》为"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盏神灯"。她曾对好友吴芝瑛剖白自己的想法："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但日渐扩散的暴力氛围，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又让秋瑾选择了暴力的革命行动。她和表兄徐锡麟成为光复会领导浙江起义的合适人选。为此，秋瑾往来于杭州和上海，"运动军学两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

秋瑾人生的最后一幕，是在绍兴大通学堂。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身亡。一周后，官府包围了大通学堂，严刑拷问，毫无结果，秋瑾两日后被处决。

秋瑾的死给当地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多年后，有位种菜老人回忆说，当年他十二三岁，行刑队伍就从他家门前经过，他亲眼看见临刑前的秋瑾神态自若。那时候，人们对革命党普遍觉得神秘，而且是一个女犯，但见到秋瑾的英雄气概，都为之感动。

公众舆论则不断抨击浙省官员对秋案的处理，在此过程中，各界人士不拘是出于开脱、同情或怜惜，秋瑾的女性身份被有意无意地凸显、放大。一心一意要像男人一样参与社会变革，甚至做得比男人还要好，若地下有知，鉴湖女侠不晓得会作何感想？

秋瑾甫被捕，媒体迅即把对徐锡麟一案的关注转移到秋瑾案上，前因后果，细枝末节，追踪报道，秋瑾之死很快扩散到社会上。就在清廷刚刚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以如此残酷的方式杀死一位新学界的女性，这最为当时社会舆论诟病。

据范文澜回忆，当时他所接触的大都是守旧派，不同情革命，可是他们也不赞同清政府的凶暴行为。大家议论纷纷，大致是：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对秋瑾不应该用斩刑。留日浙江学生会等民间社团，《申报》等媒体，都以1905

年光绪帝的上谕据理力争，“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看即永远删除”。地方官吏如此杀害一位学界中人，堪称横行不法。

而在媒体的连续报道中，秋瑾被描述成一位弱质女流，面对官府的残暴无能为力，更激发了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时报》质问当局：“仅一弱女子，藏一手枪，遂足以扰一郡之治安，岂真如吾国社会所崇拜之九天玄女、骊山老母，有撒豆成兵之神术耶？”

浙江巡抚张曾敭和绍兴知府贵福不得不尽快搜集证据，贴出安民告示。此后秋瑾的革命诗文、军队编制均被披露，她的革命党身份确证无疑，但舆论仍以为，在预备立宪时期，依照法律办案最为重要。

这一切超出了张曾敭的料想，不过杀一乱党而已，哪想到竟有赔上仕途性命之虞！吴芝瑛在《祭秋女士瑾文》里，公开表达对张的嘲讽：“反常移性者欲也，触情纵欲者禽兽也。以浙帅之贤，岂嗜欲之流、禽兽之类与？”

如此压力之下，张曾敭无奈托病请假二十天。8月5日，他被调补江苏巡抚。江苏士绅立即集体行动，由写过《孽海花》的曾朴领衔，致电都察院，拒绝接受这位民愤极大的“父母官”。已经宣布要开启新政治的清廷不得不对民意让步，调补张曾敭为山西巡抚，次年年初即因病免职。

绍兴知府贵福也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他和张曾敭一样，调任安徽被当地士民所拒，无奈蹉跎余生。进入民国后，不得不改易姓名，苟活于世。

而此案的具体执行者、山阴县令李钟岳，则一开始便承受着良心的拷问。据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李钟岳对秋瑾家人颇为回护，查抄其家时，也亲自监督，保证没有损失，并屡屡安慰秋家人。对秋瑾一案，他消极办案，多方维护，最终仍不得不听命于贵福，把秋瑾送上刑场。8 月份，他因在秋案中和上司意见不合被撤职。10 月 29 日，饱受内心折磨的李钟岳第三次自杀成功，自缢身亡。

借着为秋瑾鸣冤、平反，江浙的民间力量迅速增长，开始联合行动。三十年后，秋宗章回首当日，慨叹“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千古伤心第一事，裙钗授首断头台”，一位诗人写给秋瑾的挽诗里，极尽悲剧的情调。说到底，一个女子被斩首这个事实，真正激发了人们的义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增加了悲壮的底子。她的死，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思想来源和激进女性们参与革命绵延不断的动力源泉。

营葬·洗羞

女性，鲜血，这些在任何时代均是传奇的基因。秋瑾死时年仅 31 岁。如果以成败论，这是一个短暂不幸而无所成就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以身许国的女性榜样，鼓动

了天下之气。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和徐自华，不顾自身安危，决心为好友下葬。慷慨悲壮，舍生取义，无不可为，此种肝胆相照的侠风激扬，遂成就一部留名青史的传奇。

据秋宗章回忆，秋瑾处决当日，里保即来通知秋家收尸。秋家人事先已经到乡间避难，听闻秋瑾死难事后，害怕被株连，逃到深山，无人领尸。遗骨便由善堂施棺，暂时存放在卧龙山上。两个月后，风声渐缓，方由秋瑾之兄雇人移梓于严家潭丙舍。

秋瑾罹难半月，便有一位“慕秋”女士致信吴芝瑛，认为秋瑾之死“可为吾女界第一最惨之记念也”，吴芝瑛义心侠骨，发起众人开会追悼秋瑾。11 月 10 日，徐自华写信给吴芝瑛，约吴联名登报，以葬秋瑾。吴芝瑛见多识广，认为如登报可能会引起政府的干涉，反而于事无补。而后，两人相约分任购买墓地和营葬之事。

《时报》刊登了吴芝瑛将赴山阴为秋瑾营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震撼。在上海的绍兴人越凡投书《时报》，赞赏吴芝瑛“义肠侠骨”，愿共成义举。浙江象山的一位林放卿先生也来信说：“浙中之须眉男子汗颜无地”，愿资助一臂之力。

秋瑾曾与徐自华相约“埋骨西泠”。徐的幼女不幸患病身亡，她无法亲往西湖觅地。此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尼姑慧珠。这位自称西湖大悲庵主的女尼投书吴芝瑛，言及当年秋天，听闻山阴道友说到秋瑾冤狱，于是在城中搜购报纸，方晓得事情的始末。于是，更为关注秋瑾下葬一事。

她对吴芝瑛极为激赏，“我佛慈悲，侠士肝胆，惟夫人兼而有之”，因此，愿以庵堂余地奉献，安葬秋女士，“且愿终吾之身，躬奉祭扫”。于是，吴芝瑛致函徐自华，告知已有墓地，但她已有身孕，而且病体缠绵，只得请徐亲自前往山阴移柩。

徐自华上路之际，已是江南深冬。12 月 29 日，满江风雪，孤舟渡江，抵达山阴秋家。当时，秋瑾的小弟宗章只有 12 岁，多年之后他忆及这段往事，仍历历在目：“一主一婢，间关西度，勾留三日，一舸赴杭”。徐自华义气深重，那是一种氤氲于江南文化下的女性传统，她们纯净，高雅，富有激情和自我牺牲精神。

徐自华与秋家人和绍兴同人商议后回报吴芝瑛：同人决议，秋瑾为人一贯独立不肯依附于人，因此反对合葬。她和同道数次到西湖相地，在西湖的中心点得了一块地，旁有苏小小墓、郑节妇墓。仍服膺旧礼教的徐自华因此大为欣慰，“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同时，徐自华遍访西湖，却未找到大悲庵，也没有一位慧珠比丘尼。日后，吴芝瑛偕同丈夫访慧珠，还在《时报》刊登广告，约来相会，终不见其人。

一切准备妥当，1908 年 1 月 25 日，秋瑾正式落葬西泠。吴芝瑛虽生病未能前来，仍亲笔题写墓碑“呜呼山阴女子秋瑾之墓”。徐自华还在《时报》上刊登《公祭鉴湖公函》。2 月 25 日，数百人在杭州凤林寺举行秋瑾追悼会。秋瑾兄长秋誉章演说她一生故事，一同致祭行礼。与会者还发起

组建秋社，募得管理墓地经费 361 元。

吴芝瑛则一直非常持重。她深知，秋瑾仍是清朝的重犯，在西子湖畔为一个“女匪”筑墓，还举行祭奠活动，不啻于对官府的示威。4 月 3 日，在写给徐自华的信中，她提议善后事宜由两人徐徐为之，尽量避免他人过问。对于成立秋社，她亦不很赞同。当然，她并非胆小怕事，她曾说过：“一息尚存，必将此狱平反，方为不负死友。”不出吴芝瑛所料，她们的大胆为自己招来了灾祸。当年 10 月，御史常徽路经杭州，大为震惊，奏请平秋坟，严惩吴芝瑛和徐自华。秋墓在 12 月 11 日被毁，棺柩由秋誉章迁运回绍兴。

此时，两位女士的义举经报章、诗词传播，早已海内皆知，人人感佩。吴芝瑛发电给两江总督端方，全力担当营葬秋墓一事，“愿一身当之”，“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

上海、江苏等地的士绅亦上书两江总督，为吴芝瑛鸣冤。北京协和女书院监院、美国女教师麦美德还把吴芝瑛的故事投送欧美报纸，也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最终，在浙江巡抚增韫和端方的斡旋下，吴徐二人被免予置议。

在给端方的电文中，吴芝瑛谈及她和秋瑾的不同，“芝瑛守家学，而秋瑾好为高论”。吴芝瑛是桐城派后人，在服部繁子的印象中，她谦恭贞淑，很有学问。而秋瑾秉性质直，胸无宿物。所以，吴芝瑛总觉得秋瑾锋芒太露，经常劝诫她慎言。然而，时代风雷激荡，个人性格往往成为命

运的推手。

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文部省应驻日公使杨枢的请求，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浙江同学会集会讨论。轮到秋瑾发言时，她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里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一时震动会场。

秋瑾死后，浙江等地的光复军余部纷纷举事为她复仇。1910年8月15日，秋瑾被害三年后，涉嫌告密的绍兴士绅胡道南被刺杀，胡道南的老友蔡元培颇为之打抱不平。

女侠毅然赴死，至交肝胆相照，同志暴力复仇。秋瑾去世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中皆出现了取材于秋瑾的作品，影响力之大，令那位常御史痛诋"目无法纪，败坏人心，殊堪痛恨"。

在被捕前两日，秋瑾自知性命不保，作《致徐小淑绝命词》，悲叹"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秋瑾绝笔词"秋雨秋风愁煞人"早已为人所知，而秋瑾最后的几天，是在伤感中挣扎过去的。这或许也是她挣扎、奋斗，壮志未酬一生的缩影，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被革命话语过滤后的丰富人性。晚清民初，女性要面对和男性一样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

一百多年后，我来到绍兴，站在古轩亭口，看着汽车和人力车簇拥着疾驰而过，这里和其他城市一样繁忙芜杂。

秋瑾纪念碑正对着西边的古轩亭口牌楼，它的东后侧，是一尊秋瑾的汉白玉雕像，背后是孙中山的题字“巾帼英雄”。

我碰到的每一个绍兴人似乎都知晓这位“秋先烈”，对她在城里的踪迹了如指掌。仰赖他们的指点，我顺利地走访了城南的秋家故居和畅堂，她教学和被捕的大通学堂。正值劳动节前夕，纪念馆里参观者寥寥，与同城熙攘的鲁迅纪念馆相比，明显冷清了许多。

是的，秋瑾所开启的女性独立自主的历程，还远未结束。

黄河终将入海

主要人物：姚锡光（1857—？）

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人，奉命拟制海军规划。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在错过了太多机遇之后，从海防到海权，中国人的海洋意识逐渐走入了现代。

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1907 年的夏天忙碌而充满激情。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人奉命拟制海军规划，经过一番努力，最后姚锡光拿出了急就、分年两套方案。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他拟定了《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三个说贴，建议将现有的舰艇编成两支统一的巡洋、巡江舰队，由海军提督一员统领两支舰队，根据各国海军舰长一般都官至上校的惯例，建议以参将作为管带的最高品秩。

而在 1875 年 5 月 30 日《看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里，清政府考虑到“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因此组建了南北洋区域舰队。此时，姚锡光的目光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先辈们。

20世纪初的中国，不论是民间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均已认识到一支统一而强大的海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不仅于此。姚锡光的海军复兴规划里，海权思想充盈其中。他认为，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无法控制，近海权益也难以保全。“方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在《筹海军刍议》里，他提醒清政府：“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守内者哉！”因此，在他所制订的两个分年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集中在具有强大远洋作战能力的远洋战舰上。

这三份说贴，凝聚了这位前李鸿章幕僚对甲午海战的总结，当时风行中国的马汉海权论思想的影响也宛然可见。

但是，姚锡光的振兴海军规划并没有被采纳。

华夏中心主义解体

此时，清政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每一件均关系重大，政治改革首先迫在眉睫。1905年，清政府派遣载泽等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考察，调查在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之后，中国施行立宪的可能性。半年多之后，考察团回国，每一位考察团员都赞同立

宪政体。在致力于实行立宪政体之后，首先要处理的便是改定官制。

大臣们提议，皇帝是海陆军的总统领，“海军制度宜次第筹划规复，宜指定一款为分年筹划之需，先以五年为期，造就军官若干人、兵舰若干只、军港若干处、工厂衙署若干所，逐款预计，决一定数，分年而筹。不准挪借，循序渐进。”海军复兴问题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被提上了日程，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政务处在1906年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

不过十余年时间，中国人对海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受世界海权潮流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大清的政府特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六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到西安。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末，帝国的高级官员奉命上书，陈述举凡行政、军事、财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

清政府改革的目标，不再只是“船坚炮利”，而是涉及了制度层面的某些东西。经太后同意，皇帝发布上谕，命令高级官员在三纲五常的前提下，“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此外，政府特别创立政务处，处理这些改革建议。海军复兴规划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不管愿意与否，

为了继续维持统治，除了改革，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改革的活动得以加速进行。这个政府的眼界和认识已经和甲午战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甲午战败以前，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种“文化的天下观”。这种认识由诸夏及蛮夷这个中心—边缘的世界图式组成。以中国为中心，按照道德中心论的视角，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天朝上国，在她的周围，是道德文化低下的“夷”，再外面是未开化的“蛮”，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可以无限扩张。世界环绕在以中国为中心的道德等级秩序中，由此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视做各国向中国君主纳贡的朝贡关系。

在古老的典籍《周易》“大有卦”里，便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这样的文化基因，那些应天行时，被华夏视为同人的诸侯，将受到天子的款待，而那些没有被王化的小人则没有这个荣誉。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沉重打击之后，清政府长久以来的文化优越感荡然无存。“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上书中，从一开始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危险不仅仅是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治法文学”的文教传统里，中国的优势也不复存在。而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严复则翻译了《天演论》，把社会进化论的竞

争进化观引入了刚刚受到重挫的中国，大声疾呼中国已面临劣汰的危境。世界格局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把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推向了高峰。通过文化的深层变革，造就一个新国家的意向呼之欲出。

世界格局认知的变化，加上甲午战争引发的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使中国人有了足够的动力和知识资源来突破传统的世界范式。姚锡光们的出现，正是古老中国迈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步。

海防启动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的地理有一大特点：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发祥地的华夏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则是漫漫黄沙的西域边地，除了逃亡者和商人，少有人去；西南是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则是浩翰大洋，茫无际涯。

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对此充满了无力感。一是华夏内部腹地开阔，北方一有战乱和自然灾害，可以南迁，反之亦然。特定的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始终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注到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

而那些处于不断迁徙中的游牧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整个古代史，就是汉族政权抵抗南下的外族铁骑的战斗史，为此政府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墙——绵延万里的长城——中原人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

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抵御北方蛮族劫掠的传统，深深影响着民族性格。个体无限依赖于整个族群，这种凝聚力的另一面则是无限挤压人民，推向一个权力核心。有上千年的历史为时间坐标，朝代的兴替，政权的兴衰往复，似乎像四季的更替一样平常。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感，以及独特的、听天由命的个体无力感。

各部落以及各个时期的游牧民族不断征服中国，爬上皇帝的宝座，像统治自己的领地一样几百年几百年地统治这个国家。历史的命运虽然奇怪，但却无可置疑……

1907 年，来到中国的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感叹："即使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内部生活始终遵循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中国容忍了侵略者政权，就像俘虏忍受匪徒的统治一样。感受到宽容姑息的变节者当然会依照统治者的精神行事，但对中国文人内心的坚定信念束手无策。中国人视眼前发生的一切为灾难，即使他本人不能获得解脱，其后代也一定能达到目的。"

15 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

中，则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麻烦，为此，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传统的农耕社会和贸易上的朝贡体现，曾经稳定了对外关系，尽可能避免了军事冲突。清代自康、雍、乾三朝，东征西讨，周边地区皆被征服，除日本外的东亚诸国也纷纷入贡。海洋方面，只有郑成功曾占据台澎一度与朝廷对峙，并未遭遇到强大的挑战。所以，清代的水师仅仅是用来巡防捕盗、维持秩序的。

直至19世纪，来自西方的陌生人大规模闯入了中国的朝贡贸易圈。这一次，太平洋的海水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呼啸而来；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同化了。

此时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海洋的世界。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来，经过两三百年的经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与英法等欧洲各国，以商业殖民、传教和武力手段先后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此时，“天朝的统治者们对它却还是茫然无知，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版图以及它的边缘上一些属国以外的世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三载，英国人以区区一万人左右，对阵清朝二十多万的陆军和几万水师，蒸汽机推动的战舰兵锋所及，攻城略地，沿海各地无力自卫。英国人先进的技术设备震动了清朝的官员们，给皇帝的报告中，英国人的火焰船（蒸汽动力船）有如神迹：“火乘风起，烟气上熏，

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和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堂堂天朝，为数万里之外的蛮夷所败，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意识到中国海防所潜伏的危机。

曾在广东主政的林则徐首先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他派人翻译了美国人穆勒的《地理丛书》以及《澳门月报》等新闻报纸，以了解海外诸国。早期为对抗英军的海上攻击，他曾采用“弃大洋、守内河、择地利、设奇伏”等防海措施，但这位目光远大的官员，知道最重要的是船炮和海军，“惟有坚船利炮，始为最佳防海之物”。

在被谪戍伊犁的途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南中国的海防。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忧心忡忡：“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已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他相信，假如我方有船有炮，由水军主导，往来海上，他们能到的地方，我们也能到，届时，“彼敢合舟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然而，林则徐购买、仿造西式军舰的想法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一片胡言”，皇帝的朱批显示了这个朝廷当时的认识水平。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起源和演进依赖于挑战—应战模式。英国人的海上打击造成了中国人海防意识的觉醒，而中国社会早期的近代化，每次均以造船、筹办海军发端。

林则徐的好友魏源，目光投射得更加深远。他在《海国图志》里提出了一系列操作层面上的海防举措：在广东

设立译馆，翻译西书西报，了解世界大势；在广东设立造船厂和制炮局，延请美法的工程师和西洋技工主持，数年之内，可以尽得西人长计；改组旧有水师，开设“水师特科”，模仿西洋造船架势，最后集合战舰与新水军兵士，在天津由皇帝阅兵，“以创中国千年来水师未有之盛”；发展科学工艺，使“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而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为民用”。其后洋务派的种种自强举措，魏源在19世纪40年代皆已论及。

不仅如此，魏源还注意到了南洋地区。他认为南洋自明以来，属华人活动范围，只是现在西洋人占据了优势，皆因为政府缺乏远谋。华人在南洋人数众多，其中不乏雄杰高明之人，如果能给予资助鼓励，他们可以在当地开疆拓土，建立新国，不仅可以抗衡西洋诸国，也可以作为大清的屏障。

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他说：“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大熟悉海洋的情形，对之既无特别的兴趣，亦无特别的知识。而于海洋力量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之深远决定性的影响，遂因此而予以忽视，尤以海权史的研究更为如所周知，利用及统治海洋，在世界史上实为一重大因素，但若寻求与展现其在某一时机的正确方位，亦属不易。”

魏源关于海防的某些认识似乎触动了历史先机。六十余年后，热心海权的中国人正式提出：要建立我们的战略

防御体系，而不止于保护本国的海防线。

海权觉醒

然而，战争过后，清政府并未着力解决我们现在认为所应迫切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开拓的新的机遇，在长期的文化保守和制度惯性下轻易地错过了。

紧接着便是“致命的国内叛乱危机”，东南半壁落入太平天国之手。屋漏偏逢连夜雨，咸丰这个“苦命天子”（茅海建语）又遭遇英法联军兵临城下，驾崩于热河。清政府两百余年来的统治，几臻瓦解。

在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湘军水师与长江水师相继成立，意图使内江和外海连为一体，既保全江南财赋之地的安全，又可以加强南洋沿海的战力。太平天国战事未了，一个统筹全局、变法自强的一揽子计划已经提出。初期那些分散而孤立的新试验，成为一部分官员的共识。

自强从变兵制、筹海防、靖内患、御外侮发端，海防的中心问题是造船。于是在 1865 年，中国第一家大型兵工厂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中即设有造船厂。1866 年，另一位洋务派重臣左宗棠创办了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

此时，李鸿章等人的意识并未超越魏源的海防思想。当有官员上书，以国家财政困难的理由，要求福州船政局

和江南制造总局停止造船时，李鸿章上折指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他反对裁撤沪局、闽省轮船，因造船是海疆久远之计。对于中国的海防，李鸿章认为："中国大势陆多于水，练陆军视练水军尤亟。即使兵船造精，非专恃轮船可以御侮。况如天津海口最浅，次则江南之吴淞口、福州、广东进口均有浅处，外洋大兵船、铁甲船势难深入"，何况我们造船的目的，"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可见，当时人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造船上，以为可占用地利之便，而于海防筹划着力甚少。

1874 年，因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朝廷的衮衮诸公，尽管仍未摆脱传统的陆防观念，但海防得到了更多重视，创建一支外洋海军进入了具体的筹划阶段。1888 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

马汉来到中国

六年后，中国经营多年的海防、海军被推到了战争前线。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1894 年 9 月 17 日，中国与日本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海战。双方在战斗中都投入了 12 艘战舰，中国船只在一次齐射中的装甲和吨位方面有优势，而日本船只在航速和齐射的持续转换中弹头抛扔速度上有绝

对优势——日本有更多快速发射的枪炮，可以发射三倍于中国从6毫米到12毫米炮的重量。

然而，技术不仅仅是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事实证明，日本在海军指挥、舰船操作，以及弹壳的有效性等方面都占有优势。而北洋海军将领指挥上无能，编队变阵错误，军舰航速落后，弹药供应不足。

次年2月1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的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于黄海损失5舰，剩下的10舰被日本人所得。

这场战争带来的变化，决定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战败的原因在哪里呢？号称世界排名第八的大清海军真是如此不堪一击吗？为何同时仿效西方改革的东方两个古国，在甲午战争中成败高下判然？曾为李鸿章幕僚的姚锡光，用两年时间搜集材料，撰写了《东方兵事纪略》一书，比较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甲午战争发生、发展的过程。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翻译了马汉论述海权的著作，且为每一艘兵舰舰长的必读书。马汉认为，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如想争霸天下，如想国内繁荣安全，控制海权都是先决条件。马汉的书“犹如火上浇油一样，使每一个地方扩张殖民地的主张都振振有词”。一位英国作家这样评价他的影响力。1900年后，英国皇家海军实力大增，“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除了马汉之外，我们谁也不感谢”，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如是

说。在马汉访英期间，牛津和剑桥大学在一个礼拜之内，同时赠与他荣誉博士学位。

1900年，出版已经有十年之久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经日本留学生介绍到中国，在上海中文月刊《亚东时报》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之名连载。尽管只连载了两期，却不啻一股清风，令封闭多年的中国海洋界为之一新。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和日本留学时，发现、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

不少人认为甲午海战的失败，在于中国没有制海权。在马汉的著作里，海权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当时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三海里之领海的主权。

至于中国这个海洋大国为何没有海权观念，也可以在马汉那里找到答案。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中国，无疑，政府特质和民族性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这个陌生领域。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他认为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

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一篇刊载在1905年《华北杂志》第9卷名为《论海权》的文章，则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留日学生则筹办了《海军》杂志，在《海军发刊意见书》里，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称“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

这个在大陆上待惯了的民族，突然对海洋、海军、海权有了如此浓烈的兴趣，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认识得更加深刻。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结果，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捐，各组织、团体、个人竞相认捐。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希望像马汉著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

而政府也显示了对海权的重视。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在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察，并计划进行开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

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妥善布置，以辟地利”。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了西沙群岛筹办处，在勘察后拟议了开办办法八条。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这篇文章的看法则更进了一步，作者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

1907年的那个夏天，在练兵处忙碌的姚锡光肯定无数次地想起马汉。在他的海军复兴规划中，有一个空前的建议，便是设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管轮、驾驶，而是研究军事学术：“海军研究所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

两年后，肃亲王善耆依照姚锡光的海军发展规划，提出规划海军教育、统编舰艇、开办军港、整顿厂坞，这年夏天，南北洋舰队归为统一，分巡洋、长江两舰队，萨镇

冰任海军提督。多年来争论不休的统一调度问题终于解决了。

1911 年初，朝廷开始对海军军官受衔。从世纪初开始的复兴海军工作，达到了一个高潮。然而，大清王朝也在此时走到了尽头。就在南方炮火连天的时候，海军大臣载洵和美国贝里咸钢铁公司订立了借款造船合同，总额为 2500 万两白银，借此发展中国海军。辛亥革命的到来，使得合同未能履行。此后的新政权，由于是北洋陆军为主导，海军建设陷入了低谷。

从海防到海权，从理论到实践，与几十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如影随形。危险从海上来，然而黄河终将入海，这是它的命运，也是它的希望。

1910，紫禁城的黄昏

主要人物：载沣（1883—1951）

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1910年的中枢政局。但横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党争阴云和日益激进的立宪派。

公元1910年1月1日，也就是大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已然剩下不多的时光，再过两年零一个多月，隆裕太后和尚在冲龄的溥仪，将在紫禁城养心殿“挥泪对臣工”，举行最后一次朝见礼仪。

但在这一天，在重重宫墙遮掩中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在波澜不惊地处理政务。这已经是新政改革的第九个年头，帝国的统治者希望可以整合传统社会，并守住清廷的统治。

这是一个寒冷的北方早晨。

头天黎明的大风刮走了北京城密布的彤云和满天的雪意，什刹海的北沿，“吱呀”一声，醇亲王府邸的南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出来。那马车是由两匹白马拉着的四轮轿顶车，两旁是护卫的马队。此时大概是五更天左右，京城还陷在一片深蓝色的微曦之中。

轿子沿着王府东墙根走进了甘水桥胡同（今甘露胡同），

然后又转到了鼓楼西斜街。到达鼓楼的时候，天色渐渐放亮，穿着厚重棉袍的行人们缩着脖子走在清冷的街道上。昨日的大风扮演了清道夫的角色，使得京城看上去不那么肮脏了。马车经过鼓楼前的一道短墙，轿子里穿着锦绣官服的人掀开了轿帘，瞧了瞧外面。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扑入了轿子，轿中人打了个寒战，心里紧了紧，放下了帘子。马车接着驶过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进入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

就在此时，鼓楼大街清虚观住着的一个年轻人，也把眼光投向了鼓楼前的短墙。这个名叫汪精卫的留日革命党，正在策划一起暗杀事件，他准备“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

受命于危难之际

每当走到养心殿附近，摄政王载沣就自然而然地严肃起来。尽管只有二十六岁，载沣此时已经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自从一年多前，其长子溥仪入继大统，成为大清国的小皇帝，治理这个广袤国家的重任就落在了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身上。最近他刚刚得了一个女儿，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这个名叫韫媖的小格格的诞生，让这位年轻的父亲感到一丝久违的喜悦。

“早朝”是宫廷里最隆重的事，宫里专用名词称“早起”，这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养心殿召见军机大臣、王公、满汉大学士等最高级核心权力层的官员们，传达谕旨、听候奏对、接受觐见，偶尔也在乾清宫召见封疆勋吏，一般要持续两个小时左右。

在慈禧太后和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死去之前，身为王公、军机大臣的载沣就在无数个冬天的早晨站在养心殿里，恭敬地接受明殿的黄纱屏或者东暖阁的黄幔后面传达下的旨意。作为天潢贵胄，他的仕途也算出奇顺利。1901 年，年仅十八岁时，载沣就以皇弟身份出使德国，为前一年德国公使遇难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因为据理力争不向德皇行跪拜礼，为清国赢得了外交上的小小胜利，年轻的亲王声望激增。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 年），他被授“军机大臣学习上行走”，不到一年，便成为军机大臣。但是后来能够成为大清国实际上的一把手，载沣大概并没有想到。

诸多史学家认为，是慈禧的私心让她选择了三岁的溥仪“继嗣同治，兼祧光绪”，同时让性格软弱的载沣摄政，准备在接下来的新皇时代继续垂帘听政。

载沣之弟载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分析道：“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对自己的这位兄长，载涛评价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但这样的一位摄政王，"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很难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对某个时空点的历史行动者而言，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资源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所能作出的只能是局部理性和局部信息下的决定。光绪皇帝死时，皇室溥字辈近支王孙中，恭亲王溥伟年岁最大，他曾经被舆论认为是最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据说，两宫病危时，他在宫内盘桓了一昼夜。但慈禧太后在病榻前留下的政治遗嘱，并非毫无道理。

在他的兄弟和儿子们看来是弱点的谨慎和懦弱，使得载沣在朝廷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中一直保持着相对超然的态度，表现出谦抑退让的性格，博得不少人的好感，也易于为各种势力接受，进而成为总揽全局的统治者。

当时，载沣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人物。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首先使用汽车、电话，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自入军机以来，他参与主持过有关宪政的讨论，倾向于立宪救国，容易获得立宪派的支持，加上他是光绪的胞弟，不得不说，他是整合皇室、立宪派等各种力量的合适人选。

另外，慈禧也有用他来牵制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倒戈，醇亲王府一系的政治势力和袁世

凯有解不开的恩怨。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又传闻说，光绪临危时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据载涛回忆，载沣生前没有说过，所以不晓得是否真有其事。溥仪则断定，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

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选择载沣摄政，也许有个人的私心，也不会是完全的心血来潮、昏庸误国之举。

这是慈禧的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为致命的错误吗？

“当中国最需要一个有经验、能力和意志力的决策权威人物的关键时刻，慈禧竟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选择了最不适于作为最高执政者的人物来充当此任。”历史学家萧功秦说。但历史学家的逻辑，不一定正好就是历史的逻辑。

摄政之初，对以载沣为核心的新权力集团，社会各方其实是抱着很大期望的。

制造出来的敌人

1910年年初，摄政王载沣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艰难的困局之中。要改革深水期的帝国，可谓诸事艰难。

就在宣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学部奏陈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取日用寻常之字、目下通行之文，约之定为一千六百字，一年毕业”，目的是为了利用州县和乡镇简易

识字学堂培养通文识字的选民，以备几年后实行地方自治。

教育一直是清末新政的聚焦点之一。1901 年春，尚在西安行在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表示要学习“西政西法”以求振兴，从此进入一个传统中国寻求自我改造的新时代。

1906 年之前，新政最集中地表现在教育改革上。政府鼓励创办新学堂和出国留学，1904 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模式为范本的学堂管理制度。学堂的正规教育依次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然后是分科的大学，最高级是通儒院。按照学部的统计，1904 年学堂总数为 4 222 所，有 92 169 名学生，1909 年已经有 52 484 所学堂，1 560 270 名学生。《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刺激，促使政府在 1905 年干脆废止了科举制度。

这个改革的大手笔，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可以断定，它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社会制度的根基。原本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或主动或被动，转而投身商界，成为绅商、买办，或进入报馆。他们对政府的向心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他们成为帝国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和监督者。清末，各省的谘议局议员几乎全部来自士绅群体。第一届资政院的 98 名民选议员，人人皆有功名，其中进士（相当于博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这样的高学历

者比例达 63%。

然而，事态的发展，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和统治者在 1905 年所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往近了说，国内学堂成了反满的根据地，留日的学生团体则成了反清的大本营。往远了说，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最终被新军集团取而代之。1910 年 1 月 1 日，上早朝路上的载沣，还不晓得未来他将要经历一场谋杀，主事者便是几个留日学生——擅长制造炸弹的喻培伦和黄复生、汪精卫、罗世勋在 12 月来到了北京，这个小暗杀集团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了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

曾经激烈地要求废科举的梁启超，在 1910 年感叹道："夫科举，非恶制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下了早朝，载沣回到在东华门内专供摄政王休息的三所，屋里铜炉中的木炭烧得通红，北京深冬的寒气被挡在了夹板门帘外面。早朝上，他的弟弟载涛（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奏请挑选禁卫军兵丁，兼挑选闲散宗室为国所用。

载沣不会忘记他作为"谢罪专使"出使德国时，德皇威廉曾向他传授的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且必须由皇室直接掌握。如今，禁卫军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的一支精锐部队，只要抓住了军权，就可保皇统永固。

只是他没想到，如此也把许多政治问题激化成了民族矛盾。他的这位涛弟颇有乃祖之风，渴望纵横疆场，不但爱马，而且骑术精湛。在当年的北京城中，涛贝勒骑马、养马、相马颇有些名气。好武的载涛很看不上自己的哥哥，他总认为载沣太过懦弱，没有独立决断的能力。

但是在公元1910年，无论谁坐在大清摄政王的这个位置上，恐怕都会觉得如履薄冰。

争夺宪政领导权

此时，晚清新政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如果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为界限，那么，可以说从此改革进入了政治制度的层面。

也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帝国的统治者开始认真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这次战争被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而新政已经施行了数年，心急的中国人仍然没有看到国家迅速地强大起来，或许，“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改良知识分子，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实力派，甚至革命派，也都加入了这个大合唱。户部主事陈献哀给军机大臣所上的条陈，很能反映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心理：“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之间，不恃远识之士，而知不可为矣。”1905年12月，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冬去夏回，次

年回国的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

可以说，在1906年，绝大部分人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清统治者并不是想把自己改造成西方政府，而是想借助宪政这个外来资源，修复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整合内忧外患下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通过引入宪法、议会，对传统政治制度加以改造和更新，一句话，就是想融合最好的旧东西和最好的新东西。

在当时的立宪派里，皇室中亦不乏其人，尤其是出使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可能是对宪政最了解最精通的一位贵胄。他在给慈禧的密折里谈到立宪有三大利，句句打在这位嗜权如命的老太后的心坎上。一曰皇位永固。君主对行政失误不负责任，议会弹劾，不过就是换一个新政府，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渐轻。其他国家不能再以专制鄙视清国，说不定由侵略变为和平邦交。一曰内乱可弭。革命党再没有借口倡乱，民众也不肯相从，内乱自然冰消瓦解。对那些反对立宪的官员，他认为他们都是出于自己的私利，并非真正为国家考虑。

1908年3月，这位开明的亲王甚至建议慈禧给与新闻出版界以自由，让媒体能够批评和评论公共事务，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此外，肃亲王善耆也是一位支持宪政的亲贵。

致力于立宪之后，首先要处理的便是行政制度的改革。1901年之后，政府简化了各官署公文形式，取消书吏，废

除了捐纳制。宣布预行立宪不久，首先便是施行行政机关三权分立。当时并没有立法机关，所以只是改革了行政和司法机关，合并了职能重复的官署，增加了一些中央管理机构，在各部不再有满汉两位部级领导。但是最关键的两项改革——各省督抚改革和建立责任内阁——并没有实现。

晚清新政中最奇特的一点是，处于最高级政治旋涡中的各个派别，每个人看上去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感，都宣称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利益，都支持新政改革。

1910 年的载沣，已经在去年成功地将心腹大患袁世凯以“足疾”赶回了河南老家。尽管溥仪以后在回忆录里认为，父亲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但袁世凯并不孤独，他身后是太平天国之后崛起的地方汉族实力派。直到此时，袁世凯的开明、铁腕形象在国内外仍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载沣不是慈禧，他无法钳制这个势力独大的实力派。何况，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还是袁世凯的忠实政治联盟。

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 1910 年的中枢政局。但横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党争阴云和日益激进的立宪派。为了填补袁世凯的权力空白，载沣启用了大批从国外归来的军事留学生，他们成为新军的领导人。新任陆军部尚书荫昌是德国留学生，禁卫军协统良弼是留日士官生。在地方各省，留日归来的士官生也纷纷成为新军领导人，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和蔡锷等人已经官至标统。

老人们则纷纷谢世。1909 年 10 月 4 日，张之洞在世的

最后一天，载沣前去探视。

“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张之洞气息微弱地说。

张之洞本来希望可以向摄政王举荐几个人，像古代名臣那样为君王作最后的贡献。而载沣却急着去六国饭店，他新任命的津浦铁路督办大臣长麓已经与英德银团签了贷款条约，当晚有一场隆重的酒会。载沣离开后，帝师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如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感慨道：“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

1910 年左右，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等有大局观的老一代官员都相继去世了。极为开明能干的满族官员端方则因为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也被驱逐出了核心权力层。

大清的政治人才有些青黄不接。

补天者何人？

1 月 1 日这天，待在紫禁城三所的载沣召见了诸军机大臣，他谈到了地方的用人问题，颇为痛心。

地方和中央的权限界分，向来都是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

宣布预备立宪以后，载沣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其弟载涛为军咨大臣，掌握了陆军。1909年，载沣又颁布《清理财政章程》，中央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从本年起，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

如果我们翻看《清实录》、张謇、郑孝胥等人的日记，会发现，1910年年初，最令摄政王头痛的可能是盐政问题。1月2日的《汉口中西报》报道说："度支部尚书载公电咨各省督抚将各省盐务改归官办。"中央政府为了直接控制大宗盐税收入，设立督办盐政处，颁布盐政新章程，将盐税收入及"各省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收归中央督办大臣之手。载泽亲自兼任督办盐务大臣一职，毫不退让，坚称推行。而各省推行新政要花钱，盐税正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此举一出，以致督抚们抗议不断，和度支部的矛盾冲突极为严重。

载沣只好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

据这一天的《汉口中西报》报道，摄政王要军机大臣们注意，"近各省新政繁兴，朝廷望治方殷，原准各督抚借材异地就平日之所知者，分别调用，乃详查各该省奏调人员已居多，而吏治之废弛依然，新政之敷衍犹是。推原其故，皆因所调人员非碍于情面，即位置私人。似此积习相沿，大局何堪设想"。

排除谋夺地方实权的成分，载沣也不可谓没有见解。

新政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场，个人私心、宗党利益交织在一起。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能力。中央和地方，满汉之间，立宪派和激进派，清亲贵内部，这些不同层面的矛盾犬牙交错，兼之利益纠葛，以载沣的个人性格和政治背景，恐怕是他无法解决的。他既无法形成一个新的权威中心，也不能控制那些桀骜不驯的亲贵高官，甚至不能做到对满人里的精英们人尽其才。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钱穆先生盘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主张政治制度需要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但在 1910 年，一切都显得犹如箭在弦上。这一年，各省代表三次请愿请开国会。就在 1 月 1 日的《汉口中西报》“紧要新闻”里，不知是造势还是确实如此，报道称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振、溥伦等王公贝勒也赞成缩短国会年限，“俾宪政及早成立，得以挽救时艰”。

接见完军机大臣之后，载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铜炉里炭火已经黯淡，屋子里显得空荡而寂寞，充斥着大风过后的寒意。据说摄政王在政务之余，喜欢读报了解舆情，而这天正是西历的元旦。《顺天时报》在元旦贺词里说：“夫屈指一年之内，仅三百六十日，而自岁之首，以至年终，环球各国，所行政事，变动不居，参任错综。一胜一衰，一起一仆，曷有其极？能察知其变化无方之理，即使拒绝文明之精髓，利用文物之精良，应其潮流，顺适而至。时

行物生，发达最宜。否则日即委靡，不至于灭亡不止。”无人知晓，若摄政王读到这段话，会作何感想。

汪精卫和他的同志们，准备就在鼓楼前的那道短墙内向载沣投掷炸药。等他们准备动手时，鼓楼西斜街却开始翻修马路，载沣的上朝路线随之改变，改为出了府门径直向东，穿鸦儿胡同和烟袋斜街，再转入鼓楼大街。汪精卫等人实地考察了一番，发现进入鸦儿胡同前，载沣一行必先经过一座东西向的石板桥。于是他们决定将炸药埋在桥下，人躲在远处的阴沟里引爆炸药。

3 月 31 日，一个春风宜人的夜晚。

黄复生和喻培伦潜到石桥下挖坑，刚刚挖好，犬吠之声响起，两人赶紧盖好土返回住所。第二天午夜，两人将一铁罐炸药放入土坑里，不料发现桥上有人窥探——暗杀团被警察盯上了，他们的住所也被发现了。五天以后，警察在照相馆逮捕了黄复生和罗世勋，旋即又抓获了汪精卫。

载沣又恨又怕又怒，极力主张处死汪精卫。也许正如载涛所说的，他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在民政部尚书善耆的劝说下，在预备立宪的大形势下，他借机向全国做出宽容大度的姿态，改判汪精卫终生监禁。

而汪精卫在受审时所交代的暗杀缘由，足以让这位帝国权柄的执掌者胆寒：“摄政王既然掌握全权，就应当实心为国，选择贤才治理国家，大大振兴一番，也许还能挽回一些。谁知监国两年，毫无建树，中外民众，请开国会，一再不允许，坐以待亡。将来覆巢之下，还有什么完卵？”

民国人与事

第二辑

谣言与革命

主要人物：1911 年的新军

1911 年，但凡头脑清醒之人，都明白迟早有一天，一场大规模起义将在中国发生。至于起义将发生于何时何地，则无人可以准确预测。

这一年是辛亥年。

湖北省城民众过了一个冷冷清清的中秋节。此前，武汉三镇风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像 13—14 世纪的汉人那样，秘密联合起来准备在“中秋节杀鞑子”。

省城市面萧条，“食品涨价，银元兑价上涨，七十五两银子换一百银元，有时关平银一百两换一百四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内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在 10 月 5 日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件中写道。

制造炸药的人

此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这年 5 月，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各地商办铁路

将逐步收归国有。6 月，湖北省谘议局召开千人大会，反对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激愤的留日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

年初才创刊的《大江报》亦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呼吁"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甲午战争以后，十几年来社会精英对新兴中国的渴望，以及日渐增加的革命能量，使流血事件看起来已不可避免。

这年 7 月 20 日，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将湖北陆军十六协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开往四川，镇压四川的保路风潮。如此，武汉守备空虚，人们借着庆贺中秋的时机，传言城内将要发生大变，再后来谣言越传越盛。对那些身穿洋服或短装打扮，或剪掉辫子之人，人们纷纷投以怀疑的目光。惊弓之鸟一般的武汉市民害怕自己仅有的一些家产毁于战火，纷纷把家具器物搬迁到乡间。

政府亦如临大敌。湖广总督瑞澂命令，从闰六月（7 月 26 日）开始，武汉刀店须取得营业执照，还需同行具保。刀店售卖的刀具要刻明牌号，凡是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瑞澂还命令各兵营提前一天庆贺中秋节，以防止士兵们在预定的起义日期离开营地。

此时，武汉有二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1.7 万余名新军中，竟有三分之一成为革命党人或革命的同情者。

"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们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渴望起义反抗满清，但不愿

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唯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一年后，成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的革命党人刘公回忆说。这两个激进的革命团体在武昌开了多家旅社作为联络点，并在汉口租了密室，制造举事所需的炸药和旗帜。

中秋节总算过去了，革命党人并未如传言般举事，尽管新的传言说革命党人还是要在十几天后起事，但武汉人总算是松了口气。

突然，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了，武昌城内的气氛再度绷紧，犹如拉满的弓弦。

10 月 9 日下午三点左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弄堂，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冒出滚滚浓烟。日本三菱商社汉口支店的职员内田顾一在当天日记里记载，邻居看到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此前关于革命党举事的传言，使得邻居警惕心大起，即刻飞报警察局，于是革命党的地下工厂被发现了。

这起爆炸事件可谓非常偶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刘公的弟弟刘同从外面进到屋里，在一边观看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配置炸药，边看边抽烟，无意中落下一点火星，立即引起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烧伤。据考证，爆炸现场唯有孙武一人受伤，而当时炸药威力颇大，墙壁烧毁，连隔壁的房子也剧烈震动，为何刘同却没有受伤？

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也在场，他事后回忆，孙武用瓷

匙和炸药，由于用力过大，激发火花，引起爆炸，结果浓烟如雾，声出如雷。另外，孙武在手稿里也说是自己调药过急，引发了火药轰燃。

“剪辫者死”

孙武被同志送到日本人开设的同仁医院救治，俄国租界巡捕逮捕了刘同等三人。最为致命的是，巡捕搜去了革命党起义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地方革命党人名册。

此时，革命党面临着一个抉择。孙武等人猜想，名册被租界巡捕搜去后，一定会马上交给政府，政府很可能会按照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约有二百多人。而文学社的领袖蒋翊武恰好于当日回到武昌，他带来同盟会黄兴的建议，将起义推迟到十一月。但那颗爆炸了的炸弹让大部分革命党人极为不安。

10 月 9 日下午五点，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派人分送各新军标营，时间定在午夜 12 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不过，送信的革命党人到达南湖炮队的时候，士兵们早已就寝，信号炮从未发出。

此时，一则内容为“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已经在新军中流传。事实上，从现有的一些材料可以

证明，瑞澂选择了一种较低调的处理方法。警察并未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搜捕革命社团的集会地点，蒋翊武和其他人刚开过会的武昌机关部也未能幸免，刘复基等三人被捕。

对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个革命党人的处理很能说明瑞澂的心态。他不想扩大事态，尽管指挥巡防营的首领满人铁忠主张全面清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但当其他新军军官建议毁掉花名册，避免激发更大的冲突时，瑞澂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天晚上，瑞澂和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在督署连夜会审被捕的三位革命党人。经过简短的严刑逼供，黎明时他们就被处决。按照常理，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就应该继续审问，并套取更多的党人口供。

10 月 10 日，武汉在大风之中迎来了黎明。前一天发生的事并没有泄密，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记者都没有到现场采访。从事战地采访的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说："事实上在汉口的欧洲人直到看了报纸上的简短报道后，才知道此事，而且早晨好像没有人认为他们读的消息有多么重要。"然而，市面上和军中已经盛传，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这个谣言因为被处决的三位革命党生前都剪掉辫子而显得颇为可信，尤其是早晨另一位被捕的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也没有长辫（他的家便是武昌机关部），这更增加了谣言的真实性。

这一天的武昌城，城门紧闭，到了十点钟才开放汉阳

门。苏古敦继续发电报给总税务司，他报告安格联，因为戒严，书办十一点半才到办公室，他们情绪激动，所谈话题都是革命党人。办公室有三个人没有辫子，这样的人是有嫌疑的，苏古敦很替他们担心。另一位住在法租界的田姓办公人员已经遭到巡捕盘问，他还报告了自己听到的传闻：本地学校里没有辫子的人，都装上了一条假辫子。

“捕杀汉兵”

在大风中飞播的谣言，刺激着新军中剪去发辫的汉族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这年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面的那个象征物。尽管瑞澂只是下令搜捕革命党机关部，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以避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但是10日凌晨的处决行为，已然加深了这一变乱时刻的恐怖气氛。官府将继续杀人，恐怕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一种可能遭遇大规模报复的恐怖在新军中蔓延，甚至有谣传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

10日这天，瑞澂电奏朝廷，武昌已经不动声色地拿获了“革匪”三十二人，他成功地把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他的报告获得了上司的表彰。毫无疑问，瑞澂对自己的报告也拿不准，武昌、汉口并不安宁。但出于帝国官员一贯

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他还是汇报说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

然而，他未曾预料到时局的发展已经不可收拾。前一天，《汉口中西报》在“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否则谣言盛而人心乱，人心乱而大局危矣。”如此一来，瑞澂和革命党人打的是一场攻心战。

事实上，在辛亥年，人心是个关键词。这一年，政治谣言满天飞。陕西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在武汉地区，民间也传唱“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这样的歌谣。清政府的政治失控和信用破产，已经到了绝峭之境——激发了中国传统的“天命”预言。天命是中国人精神成分中所携带的命运定律，它有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足以唤起人们的激情，忘记恐惧和理性，去干一些“掉脑袋”的事情。

此时，革命党也在一片混乱之中：孙武在医院养伤，蒋翊武为躲避搜捕出逃，刘公藏匿在汉口。文学社约定午后以吹出操号为信，武装发难。孰料当局侦知后，命令各营不准发号，举事计划再次流产。

一天之内，革命党人两次举事计划失败，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会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省城，已经陷入了一种谣言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不管有罪还是无罪，汉族士兵都害怕自己会在大清洗中丢掉

性命，意识到投入叛乱比丢掉性命更合算——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

于是，一则谣言经过奇妙的曲解简化之后，进入新军士兵们的大脑，然后演化为行动。黄昏时刻，当工程第八营一个排长查哨时，发现有两人携带武器，双方发生了争执，当他指责那两人要“造反”时，造反真的发生了。企图弹压的军官都被击毙或打伤，此时，共进会员熊秉坤放枪为号，集合部队，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哗变的官兵们纷纷加入造反者的行列，步队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城北的二十一混成协工程营和辎重营相继响应起事，拥入城内。

这天，立宪派人士张謇正好到湖北筹办大维纱厂。这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新成立的“宪友会”（会员有梁启超、孙洪伊、谭延闿、汤化龙等人）成员均是旧精英、新绅士。他们希望扩大政府民众支持的基础，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让他们感到被清廷出卖了。张謇公开说，这个国家正在土崩瓦解。

谈完生意的张謇乘船东下。长天尽于低野，浊流滚滚，激起一江浪头，船行江中，犹如枯叶在空中飞舞，只见远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

黎明时分，革命军攻入督署，瑞澂从后墙挖洞逃走，在张彪的护送下逃到军舰上。革命军宣告武昌光复。上午，革命党人寻到了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拥他至楚望台，然后至谘议局，成立湖北军政府，改元中华民国，改行黄

帝历纪年。

学者周锡瑞认为："黎元洪的被选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继续分裂的产物，它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部是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在十月十日谣言四起的气氛中卷入兵变的。因为，参加兵变，似乎是最安全、最机灵可行的一着。这些兵士，对革命领袖并无忠诚感情，最易接受早就认识的军官的领导。"

这天，黎元洪发布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安民告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他的声名现在已经传遍了中国。"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他提醒国民，如今，革命开始了，以血还血的时候到了，"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他承诺革命军将严守军纪，并呼吁士农工商共图光复事业，建立中华民国。

他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这是1911年的时代最强音。与此相比，同时发布的皇帝谕旨不但内容多为老生常谈，而且软弱无力。清廷许诺宽宥一切政治犯，并准革命党人组党，他提出稳定胜过一切，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其心可诛，他们"意在离间满汉，檄成仇衅，祸变相寻，必使大局糜烂而后快"；他一心以国家强盛民生康乐为念，而皇帝说，这一切都需要安稳，革命会让人们流离转徙，死亡枕藉，四民失业，全国恐慌。

此时，甚至较为保守的改良派也不再支持这个腐烂至极的政权。作为舆论领袖的绅士们，也已经拒绝与清廷合作，甚至转而加入了革命党阵营。"革命党在这里胜利了，

整个长江流域都会起事，别处也可能闹起来。”苏古敦在11日的电报里这样预言。

当晚，清皇室亲贵聚在庆亲王奕劻的府邸，面对王朝信用彻底破产的现实商议对策。他们彻夜未眠。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主要人物：刘师培（1884—1919）

这是甲午战争之后被逼到边缘的中国精英打造、实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他们开始在自身文化系统内寻求文化自主和政治独立的可能性，他们力图以世界化的标准来改造中国。

1903年夏天，一篇署名为“无畏”的人写的文章在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阵阵涟漪。

这篇名为《黄帝纪年论》的文章，出自刘师培的手笔。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倡“黄帝纪年”大旗。“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刘师培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他提议国人应该继承黄帝志业，效法日本用神武天皇纪年的做法，以黄帝降生这一年作为中国纪年的开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所署的日期便是“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

这一年，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刚刚结识另一位经学大师章太炎，对这位著名的革命党颇为倾慕。为此，他改名“光汉”，表示自己“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他的这篇文章针锋相对的便是清廷支持者——改良派提出的“孔子纪年”。

于是，在20世纪初，一场关于历史纪年的论争成为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这场有关纪年的文化论争，背后是清末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近代名人的身影，都在这场论争中隐现。从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来看，这场纪年之争，正是近代中华民族建构、探寻的历史过程中所蕴涵的矛盾与冲突。

孔子纪年

中国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中国的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开始用当朝年号纪年，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都要改用新的年号。因此，纪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按照传统，王位代表着正统的合法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央集权的、伦理的和普遍的，换言之，特别带有非民族的色彩。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中，泱泱帝国败在日本这一蕞尔小国手里，从1860年以来的挫败感达到了极致，中国已经成为“落伍者”。这个事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传统“天下”观的理想提出了挑战。

一年后，著名的改良者康有为在上海创立强学会分会，

并刊行《强学报》。在报刊封面上，他令人瞩目地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样。这期创刊号中，康有为还刊登了《孔子纪年说》一文，直接提议采用孔子纪年。

康有为的灵感来源于西人的“公元纪年”。既然代表着先进和强大的欧美人选择一个圣人的诞生日作为纪元，我们何不也因循其事？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谁比孔子更有影响力呢！十几年来，他推行“孔子纪年”，孜孜以求，初心不改。多年之后，康有为伪造了一批“戊戌奏稿”，其中之一便是“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

他明确指出，西洋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然而中国的纪年，“历朝数十，阅帝数百，年号几千，记述既艰，考据不便”，为今之计，便是仿效西洋善法，改以孔子纪年。何况这一做法自有历史渊源，司马迁就曾使用过“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这样明确的史书记载，最为有力，使用起来也颇为可靠。

康有为认为，孔子所代表的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而这一套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与意义，又是数千年来中国赖以存立的命脉所系。他相信，儒家有能力从内部变化，与更新社会秩序的过程齐头并进，自身也可以得到强化。而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是中国的一个成员，就在于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在他看来，孔子之所谓“中国”与“夷狄”之别，一如现今所谓文明与

野蛮的区别。以光绪帝为首的清廷，尊孔崇儒，自然亦是真正的中国一分子。

在《强学报》第一号上，康有为写道："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縶刲割……"他高倡"保教、保种、保国"，在和师友弟子们的往来信件中，均标注"孔子纪年"，只是此纪年改以孔子出生之年始。无疑，康有为高举"孔子纪年"，和他一贯倡导孔教和奉孔子为教主的宗教性主张是一体的，其用心在于为他的政治观念与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的支撑。

"孔子纪年"随着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广为流传，他门下的弟子和过从朋辈纷纷响应。维新人士唐才常1898年撰写《师统说》一文，直接树孔子为"师统"，其位在"君统"之上。他用语严正，"不纪年则无统，不立统则无师，不系统于师则无中国"，进一步将推行"孔子纪年"与中国的存亡挂钩。影响所及，便是日后激进反满的章太炎，也在1899年提出"以素王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

梁启超不但宣扬老师的新纪年说，还有所发挥。他在1898年写了《纪年公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及了纪年的基本功用，表明纪年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的冗繁所起。随后，他又在《新史学》中直言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族，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

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

康梁是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本人，他对光绪帝的忠诚从未动摇。然而“孔子纪年”一出，无异于扔下了一颗炸弹，引发朝野震动，直接导致了南北强学会被封禁，《强学报》被迫停刊。守旧派人士的攻击颇具杀伤力：“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籍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

高梦旦，一位近代中国最具声望的出版家之一，则从纪年的基本功用角度，分析梁启超纪年论的逻辑矛盾。他指出，使用“孔子纪年”有一个现实困境：在中国无法统一使用“孔子纪年”。因为尊孔者尊“孔子纪年”，而回教、耶稣教、佛教、道教等教徒则可以遵从各自教主，并使用各自的纪年，如此一来，岂不又陷于混乱和纷杂之中？

而最激烈的攻击来自于排满的革命派。

黄帝“复活”

“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

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刘师培概括得精到至极。晚清两派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想象过程中的分野，亦正在“保教”与“保种”的区别。

就在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前不久，青年周树人给朋友许寿裳寄了自己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眉宇间英气勃勃。前一年的三月，像众多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一样，他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然后又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医，现在又回到了东京，住在公寓里，修习德文，看杂书。

在这张像上，周树人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的周树人，以救国救民的启蒙者自居。他在东京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朋友们探讨如何救国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个受到进化论影响的青年，“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

当时，慷慨激昂、救国救民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情愫。但是，周树人，这个后来以笔名“鲁迅”著名的青年，为何要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呢？“血”和“轩辕”和这个时代又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轩辕”，便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圣王“黄帝”。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然而，鲁迅血荐轩辕，一如沈松侨所言：“其所真正关

怀的，却是与他同时并存，同在一块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关的无数‘同胞’……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晚清，以黄帝符号为中介，一种崭新的意识——国族意识，确实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扩散，终至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对政治社群既有的想象方式。”

一度，中国人秉持着一种具有伦理制约性，不分种族，不受国家干预，不受政治阻碍并且是普遍性的文化理念。19 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里，一种新的爱国主义逐渐替代了这种普遍的文化主义。人们的焦点落在中国人自身之上，就是作为现代多元世界中一个特定政治实体的中国人的国家，尽管对于什么是中国人又有多种多样的定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不再区分种族，它现在与一个特定的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励着人们寻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符号。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当时流行的各类纪年新法，“我国近年有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者，乃相率欲用新纪元法；或以唐尧纪、或以夏禹纪、或以孔子纪，然揆之民族主义，皆无大纪念、无大关系”。所以，宋教仁提出，“唯有改采黄帝纪年，始能合于民族主义之精神”。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学家钱穆专门著《黄帝》一文，彰明这位先贤伟人。他亦承认，关于黄帝的传说，荒诞离奇的太多。正是在晚清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中，黄帝复活了。他被从历史记忆中发掘出来，从一个神话人物和历代

皇朝并存的系统中抽离，重新被赋予符号性认知，作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像鲁迅所写的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位关注国家未来的青年，把他的血和黄帝相系，同时也和千千万万人相系。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所有中国人（当然，对何谓中国人，也是众说纷纭）休戚相关，血脉相连。与鲁迅同为留日学生的陈天华，在自己的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上刊登黄帝画像，并且纵情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哭一声我的同胞兄弟，我和你都是一家骨肉，为什么不相认，忘着所生，替他人残同种？”

进化论影响下的晚清知识分子从事民族的构筑时，其所诉求的主要认同符号，便是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他们所想象出的中国民族，正是一个“种族化”的民族。1903年，《江苏》杂志刊载了黄帝像题词，以无比精简的形式，借由黄帝这一符号，传达了种族化民族这一信念：“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滋，我疆我理，誓死复之。”

在这种共同建构的民族想象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一位外来的征服者——为了证明中国人种和白种人一样，是文明的、优质的，晚清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

据说，在公元前23世纪左右，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的

巴克民族，在酋长奈亨台率领下大举东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中国甘肃一带，复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流域，并在此建国。这位“奈亨台”，便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巴克”便是《尚书》里所说的“百姓”。

无疑，这是面临西方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重估，其中既有现实政治利益的驱使，亦是为融入现代世界而努力“发现”自身的文化。

如此，以黄帝来纪年便顺理成章。

黄帝战孔子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传统里，诸侯接受共主所颁布的时历表示“奉正朔”，改历则意味着易代与革命。因此“黄帝纪年”说一出，便为激进、反清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各方势力所赞赏。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写文章，皆题用黄帝纪年，《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支那》等报章也纷纷改用黄帝纪年。

革命党借此与清廷划清界限，“黄帝子孙”自然不能受“犬羊贱种”的奴役。年轻的革命党邹容，在他所撰写的《革命军》里高呼：“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

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而如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以革命排满为现实政治目的的“黄帝符号”，自然难以获得不同立场知识分子的认同。康有为挟“孔子纪年”十余年不改，与革命派论战。可以说，黄帝战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利害之争。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孔子与黄帝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英雄谱系”。在章太炎眼里，洪秀全举兵反满，上绍黄虞，足可以跻身中国帝王正统，而曾国藩之辈助异族以残同类，自然就是“汉奸”；梁启超则对革命派“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不以为然。

康有为和梁启超亦不反对黄帝作为民族的认同符号。早在1899年，康有为对加拿大华人发表演讲，便有“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之语。梁启超亦在1904年应亚雅音乐会之请，作《黄帝》乐曲四章，其词曰：“巍巍我祖名轩辕，明德一何远。手辟亚洲第一国，布地金盈寸。山河锦绣烂其明，处处皆遗念。嗟我子孙！保持勿坠乃祖之光荣。”然而在康梁看来，民族凝聚融合的力量，来自于道德与文化秩序。

颇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发表文章，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国号的主张，而且皆要求以“中华”做新国名。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中国已久，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他反问：既然“俱为中国，何必内自离析，

所以生讧衅乎”？于是，康有为呼吁清廷，删除满汉名籍，正定国名曰“中华国”，使满、汉、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人。

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的“中华民国”构想里，只能以汉族为主体。“中华民国”的疆域，应以汉代华人活动范围为界。在他看来，越南、朝鲜与汉人血统相通，应当加入中国，藏人、蒙古等地，血统、语言都和汉人不同，应“任其去来”，或者教化他们的语言风俗。

可见，革命派的“黄帝纪年”漏洞也不少。他们所倡扬的“民族”，是经由日本人熔铸的西方概念，一个糅杂种族与国家等不同概念于一体的群体；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一种高度种族化的意识形态。为了反满的正当性，汉人被视为真正的黄帝嫡系。鉴于此，1905 年后，清廷的满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利用“黄帝”重新诠释自己乃为黄帝后裔。又何况黄帝本为传说人物，出生日期无以考据，以此纪年，就连史学家章太炎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黄帝纪年标注。

如史景迁所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日趋强烈和复杂只是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就在“黄帝战孔子”的热潮中，一股不那么引人瞩目的潮流亦渐渐涌出。批评梁启超“孔子纪年”的高梦旦提出，既然纪年仅仅只是符号而已，而作为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那么从西方历史的演化和整个世界使用的现状而言，

耶稣纪年无疑代表了这一趋势。不过，高梦旦仍然把采用耶稣纪年提高到“新全国之人心”的高度。

曾经鼓吹“孔子纪年”的梁启超，也在1910年写下了《改用太阳历法议》。他从国家日常管理的角度提议，改用太阳历法（耶稣纪年）会更为方便。

1911年底，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同时以民国国号开始纪年。革命派黄帝纪年的使用亦同时废止。而被塑造的孔子和被召唤出的黄帝，也并未完全退出历史，他们不时被戴上各种帽子，卷土重来。

法与刀

黎元洪（1864—1928）

在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阳佳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民国最高领导层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接着，北京东厂胡同副总统府上演了一出好戏。

一向对黎元洪敬而远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的陪同下，上门拜访。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里对这关键时刻作了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据说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让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接着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段临走时，向张交待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丁中江认为，之所以演出这幕哑剧，是因段祺瑞从内心里看不起黎，毕竟清末他的官爵便比黎元洪高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内心里自然极不情愿。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也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了。

次日上午10时，黎元洪便在东厂胡同就职。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的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着十几辆汽车、马车，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在典礼仪式即将举行的客厅内，也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屏风，庭中站了一队军乐队。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见证了这一时刻。10时10分，黎元洪穿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和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

接着，黎元洪发表了就职宣言："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总理段祺瑞也致答辞，表示要"谨遵大总统训示，竭力办理"。这样，典礼便结束了。

在这天，黎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他在通告里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自惟德薄”，黎元洪还真是自谦了。章炳麟在《大总统黎公碑》里赞美他的纯德远超同时代的大佬们：“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怵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大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了刀枪的寒光吗？

偶然上位

黎元洪之就任大总统，似为连续的偶然机缘所促成。

1911年武昌首义时，他已经47岁，职位不算高：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他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倡起义的领导人，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的首脑。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把他搜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老大。那一天，黎元洪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如今，袁世凯因复辟而遭千夫所指，仓皇死去，他又按照《约法》顺位做了总统。他能当上总统，与辛亥年可

谓异曲同工，也是得益于当时的局势。在时人及后来人眼里，这位为人忠厚的“黎菩萨”似乎占尽了便宜。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党人就讨论过由黎元洪来领带新的革命政府，因为他能够联合这两个互相竞争的革命集团。

当日，黎元洪并未想到他以后还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历史因果。学者周锡瑞目光深远：“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作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一直到一九一三年年终，黎元洪都控制统治着湖北，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是一个清高的帝制反对者。1914年初，记者黄远庸拜访黎元洪，有机会在瀛台吃了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黄远庸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据他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但黎元洪的“忍功”惊人。这时候的北京城，不论是逊清显宦，还是民国名流，多少人都被袁世凯网罗，献媚争宠，点缀升平。黎元洪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韬光养晦。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一

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当袁世凯真的称帝时，这个忠厚人表现出少见的刚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基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位洪宪皇帝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数月前，黎元洪已经借口夫人有病，要求搬离瀛台。袁世凯无奈出资十万元，替他买下了东厂胡同的新宅子。

于是，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来黎邸祝贺。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一身便装的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进了屋子，百官们只好默默离去。当天下午，袁世凯派成衣师傅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服，黎元洪坚决拒绝："我非亲王，何须制服？"

几天后，政事堂来黎邸送公文，封皮写着"武义亲王开拆"。送给黎元洪阅览时，一向和蔼的他居然大发脾气："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随即命令退还公文。后来，袁世凯又把溥仪生父摄政王居住过的集灵囿改作武义亲王府，派人请黎元洪迁入，黎照样不予理睬。

史学家唐德刚曾经惋惜袁世凯晚节不保，实则如唐德刚所言，“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练不可”。在这个转型期，混乱、反复在所难免。民国初年的乱局，确也曾让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会骨干的孙毓筠、刘师培不也成为帝制拥护者了吗？

然而，旧军人出身的黎元洪为何一旦投身共和，便至死靡它，对君主制再无留恋呢？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为人十分朴厚，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朝三暮四，尤其他不愿打破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共和元勋”的形象。从经验上来看，人常常会从不同的非政治的经验中，获得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发展的技巧和洞察力。大概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经过时，任何想复辟的人都会成为国民公敌，所以，一贯谨慎小心的他才不会冒这个险。

执法者难为

当上总统的黎元洪，很快便体会到做一个旁观的帝制反对者，比做共和与法治的执行者容易得多。

南方的护国军强烈要求大总统惩办复辟帝制的“祸首”——袁世凯帐下的“十三太保”。但是“皇太子”袁克

定不但自己毫发无损，还请求从名单上划掉两员大将；北洋老大哥冯国璋也来电为段芝贵求情；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曦则替严复和刘师培说情；国民党方面也要求特赦两位党籍人士。基于政治，基于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应，最后只得下令惩治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六人。

这便是黎大总统要面对的现实：虽然北京政府是立宪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也由法律予以区分，但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政治。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各自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

此时，最有力的派系是总理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一开始便把持了政府，这正是自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以来的政府组成模式。于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命运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以军队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如果没有私人积怨（在袁世凯授意下，威逼黎元洪离开湖北赴北京的正是段祺瑞），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性格上的互补，原本是一对绝佳的政治搭档。

黎元洪则踌躇满志，他准备重开议会，恢复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政治。为此，黎元洪延揽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从 7 月份起给梁每月津贴 2000 元。但梁婉言谢绝。这年 8 月，中华民国重开国会，519 名两院议员出席。黎元洪亲自到国会致祝词，他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在数日后的茶话会上，他

再次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由各方势力构成，变乱纷纷之后，对人对事莫要过分严格，以便和政府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他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9 月初，国务院人选全部通过。

然而，黎总统很快就体会到，他这个国家元首恐怕多数时候只是个“橡皮图章”。用丁中江的话说，“黎元洪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梁启超看得极为明白，他在给蔡锷的信中，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故而梁启超先是拒绝黎元洪的邀请，不想置身于旋涡之中，后来则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民国初年，宋教仁致力于“责任内阁制”，并为此丧命，谁曾想竟然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这个段祺瑞的心腹不久写了一张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黎总统的脾气涵养再好，恐怕也要出离愤怒了。

此时，国会也是政团林立，意见分歧。以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脑的“研究系”，原是反对帝制的中坚力量，现在转而和北洋系携手；而有国民党或依附国民党背景的其他几个社团，则坚持反对段祺瑞的立场。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消长，一直是北京政府面临的现实难题。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正是双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如今，黎元洪决心再次利用这个政治空间，积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视，府院过招，随即便发生了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贩毒案。因涉案主角是护国军首领唐继尧的弟弟，普遍认为这是北洋系借机打击西南派。而黎元洪提名的外交总长唐绍仪，上任途中便遭到北洋系联名通电反对，给他安上了十二大罪。唐绍仪无奈，只好通电总统总理辞职，电文里直指北洋系："枭雄柄国，颠倒舆论，仇视贤良，功罪错乱，黜陟舛迕，甚为骄兵悍将，嗾使干政，内外相结，上下交攻，遗毒无穷，于今为烈！"

南北方你来我往斗法，小动作不断，黎元洪仍然希望能弥合纷争。这一年双十节，因为共和重建，他发布大批授勋令，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是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三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其他的西南反帝制派、北洋帝制派，乃至逊清皇室载涛等人，分别都有颁赏。他就像个裱糊匠，用有纹饰的纸糊上裂缝，让这座纷攘械斗不止的宅子里的人停下来装修一番。自然，他也逃不掉"滥用名器"的罪名。

"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终

不得施行。总统、总理与国会正慢慢地陷入龃龉丛生的危机中，最终将不免破裂。政事每况愈下，使得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秩序的期望落空了。

矛盾在 1917 年春达到了顶点。

4 月份，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会议，要求总统、内阁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梁启超一力推行，他希望中国借由参战提高国际地位。在参战与否的问题上，民国的政府要员、各省督军们和社会精英们各有立场。军阀们支持参战，主张解散国会。督军团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的回答也是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幕僚们的撺掇下，黎元洪发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表示免段为非法，准备"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钧"。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要做和事老，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压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国会。

1917 年 7 月 1 日，黎重光回忆说，他在家里听到父亲在前面的办公室大发脾气，后来得知是梁鼎芬劝说总统"归政"。原来这天凌晨三时，溥仪已在乾清宫升座，宣布大清复辟了。

黎元洪怒气冲冲，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他骂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

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然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趁着活动还没有被限制，黎元洪又致电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很快，段祺瑞军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对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副总统冯国璋更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张勋复辟毕竟是由他援引入京，内心不免愧疚。他通电自我弹劾，真称得上民国熠熠生辉的文章。可知民国当政者尚有“政治德性”，也还有传统的道德感，一旦觉得有负权责，便引咎辞职。他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自责“寡草随风，卒隳操持”。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很快感觉到，京城对他来说已经是个险地。据黎重光回忆，家里的一个卫兵意欲刺杀黎

元洪，结果刺死了卫队长。黎元洪决定像民国名流和下野政客一样，退居天津做个寓公。

少了黎元洪这一黏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于是南北彻底分裂，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写《黎元洪评传》的沈云龙说，这是“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也”！

实业救国

据颜惠庆回忆，天津黎宅的生活中西合璧。黎元洪生活西化，日常起居为颇现代，常常吃西餐，也会用西餐招待客人。花园里又有一座旧式洋楼，每逢节庆便以堂会招待宾客。

政治失意的黎元洪，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他开始大规模投资实业。实业救国，也是黎元洪的夙愿。辛亥革命后，政府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黎副总统政书》里便提到“未雨绸缪，首倡实业”，“应以实业为根本。开源节流，即视乎此”等实业救国的思想。担任总统的一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他无力去关注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如今无事一身轻，五年之内，黎元洪投资了二十多家银行和厂矿。当资金少缺时，不惜向银行

借贷。

而北京政府再度风云变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所谓补足总统任期，恢复法统，一石二鸟，既推翻了徐世昌，又可打击孙中山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发出了三千字的“废督裁兵鱼电”，表示有条件地同意复职。一番讨价还价后，黎元洪终于发电宣誓就职。据总统侍从武官唐仲寅回忆，黎元洪大有“前度黎郎今又来”的畅快和得意。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穿着礼服来回踱步，对镜顾盼大笑：“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

或许忠厚和戆直只是一线之差，究竟是继任未完成的上一任总统还是临时总统？黎元洪纠结于自己身份的合法解释上。北方学人创办的《努力周报》评论说：“其实，黎元洪若能老老实实的认清自己的职务，是在非常时代被拥戴出来维持现状的一个临时总统。这一层还可以得国人谅解，还可以得历史的谅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在黎元洪复职之前，《努力周报》的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汤尔和、陶孟和等人便联名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后，也确实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与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的“好人内阁”。

然而，黎元洪绝没有“冲”的胆魄，他反而要倚靠直系来保住总统之位。对他的性格，他的老师严复曾有评价

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岂止保不了国，最后，甚至堂堂民国总统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到要饮弹自尽的地步。"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斩，正义之不可摧残……"

如今再读黎元洪从天津通电全国的文字，令人叹惋。共和、宪法，这些最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段祺瑞的最后十年

主要人物：段祺瑞（1865—1936）

这个北洋政坛的大佬，几度沉浮，三造共和，事功不可谓不大。然而，1926年3月18日执政府前淋漓的鲜血，被文学家鲁迅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晕染开去，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事迹不凡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

七十老翁开出的“复兴之道”，亦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几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朝三暮四。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传统道德沦落不堪。

段祺瑞主政的十几年里，充满着各种各样波折。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

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是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之行为。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以及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的、富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晚年的“名节”。1924年3月5日，北京大学做了一项“民意测验”，影响民国的大人物分别得票如下：孙文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能够与胡适并列为同等影响力的民国大人物，可知段祺瑞此时声望颇佳。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民国的这十几年可谓派系丛生，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组织以及私人关系网形成各种派系。“结成派系时总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或成套的理论——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福利，那是每个派系对自己的看法。别的派系则被认为是阻碍国家统一富强、有害于人民福利的组织或关系网，应该打倒、解散，那是每个派系对别的派系的看法。”陈志让在《军绅政权》里如是说。

自然，不同派系同时存在，实力皆有限，所以，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宽容大度”的斗争作风。

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通过宪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作出反应。”

历时三个月的善后会议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等。安德鲁·J.内森教授对此评价颇高：“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段祺瑞出山之前的内阁总理颜惠庆就认为，善后会议“除了良好愿望之外，实际上一事无成”。

然而，段祺瑞此时执掌民国最高统领，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他手无兵权，所凭借的无非是北洋前辈的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1924 年 11 月 22 日他入京之日，冯玉祥便对心腹将领训话："段已到京，张雨亭再到京，即是段、张、冯三大头，若说不干政是无有的事，就是段大元帅出山，也是个木头人。"

1926 年 3 月 18 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关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标题为"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　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 19 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现场回忆非常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的

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然而，他们彼此之间即便说不上有反差，也存在相当的距离。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没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呢？

唯有这个春天的鲜血是实实在在无法湮没的。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僵硬的尸体，放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有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据说他在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也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段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上广泛而详尽的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 年，

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发现段祺瑞的真实态度，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对此，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她的未婚夫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队对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 3 月 25 日所写的《死地》一文，发表在 3 月 30 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

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正在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

京师地方检察厅奉命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的周密调查之后，调查结果证明卫队屠杀的事实。在4月3日致陆军部的公函里，京师地方检察厅指出本次集会“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已经有触犯刑律的重大嫌疑。即便如今看来，当时司法机关享受一定的司法独立，而且法官们勇气可嘉：“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与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 月 30 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的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只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

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的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 月 18 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借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

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于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铺设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照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双方发生了冲突。

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回射。各国公使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为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召开。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

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惨案发生后，内阁已经动议辞职。但据《时报》报道，“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尚未得知，在考量中”。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指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作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4月9日，回京的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发布布告，说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驱逐了段祺瑞，恢复了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究竟在3月18日的事件中扮演了什

么角色？苏联国防部的档案显示，苏联早有谋划。普里马科夫回忆说："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 1925 年 3 月 21 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寓公

4 月 20 日，段祺瑞宣布下野，带着家眷和一批部属再赴天津。

此时的天津是下野政客们的乐园，上流社会的生活可谓迷人而有趣。人们津津乐道于日本总领事的招待会，前总统黎元洪的堂会或是逊帝溥仪的茶话会。毫无疑问，国内外政局总是这些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若是逢着另两位前总统徐世昌和曹锟的寿辰，两人的同僚旧部、亲友眷属纷纷前来祝贺，为此召开盛大的宴会。稍有不同的是，徐世昌是以诗画遣怀，还在自己的花园里养花种菜，对来访者回忆自己当政时的外交成就，而曹锟则常常因索居无味而郁郁寡欢。

相较之下，段祺瑞的境况显得颇为寒酸——他没有自己的宅邸，住在自己的妻弟家中。更令客人们叫苦的是，他宴请客人亦是素席。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搭子们也得在晚上十点前散去。他还患有

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当有人问他中国内乱不止的原因时，他的回答不出佛教的因缘。他总是说，国家蒙受苦难，来自恶魔降世，除非将诸魔孽斩杀，否则不能终结苦难。也许，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可以充当降魔杵。如今有一些证据表明，1928 年底，他曾经试图恢复自己的势力，为此还联络张宗昌向日本求助。

然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段祺瑞不得不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的积蓄不多，只能量入为出，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卷茶叶之类，管家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给他过目。家里的用人早就裁减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老部下昼聚夜散前来效力。

“三一八”的鲜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没有资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后来对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谁下令开了枪，不管是不是激进的党人们利用了青年的热情，不管是不是苏联人在背后使力，有一关是迈不过去的，那便是惨案发生后，《清华周刊》刊发的周传儒的质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

他每天早晨默诵《金刚经》半小时，可有为那些惨死

的学生超度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有扶植段祺瑞之意。风传日本人要劫持他，于是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劝他南下颐养。1933年1月22日，段祺瑞乘坐的火车抵达南京时，蒋介石通令少将以上军官，着军服至车站迎接前民国首脑。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蒋曾是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都出席了蒋介石的招待宴会。段祺瑞深知蒋正是要以此打击日本人的气焰，因此在向记者发表的对时局的书面意见里说：“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两天后，他到了上海，在霞飞路的一幢公馆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时光。

上海《申报》不失时机地报道，当日本以种种权力诱惑段祺瑞时，这位前临时执政表示，唯有日方先取消傀儡组织，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才可以与之商谈。《申报》因此感慨万分：“而一般无耻汉奸甘为亡国奴，受某国指使而奔走者，亦大有人在。”谁又能想得到，这个以“亲日卖国”出名的北洋大佬，当年袁世凯召集内阁研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唯独他主张动员军队，大不了与日偕亡。

段祺瑞去世两年后，吴廷燮撰写了《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文末说“合肥之行藏，非一人之得失，乃关一国之兴替”。他还提出了一种可能：若还是段祺瑞一直当政，或许“九一八”也不会发生。

摄魂者

主要人物：1928 年的南京市民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为最有效的报复手段。

1928 年 3 月，江南刚刚进入煦暖的早春。

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城里，突然掀起了一阵风潮：许多十岁上下的小孩胸前都悬挂上了一条红布，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歌诀，譬如“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快快回家转，自己背石板”；“你造中山墓，与我不相干。一叫你魂去，再叫你去当”。

市民们传言，有人正在收摄孩童的灵魂。在孩子们身上佩戴这种被称做“石和尚”的符咒红布，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魂魄被摄走。

妖妇摄魂

自从上一年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建立新的国民政府，

南京作为首都已近一年。南京特别市宣传科在报纸上刊发标语，号召市民们帮助市政府建立“艺术化”、“科学化”、“平民化”的新南京。

三月底的一天，住在下关一带的姚张氏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坐马车去了城东，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城西北的家中。当晚，孩子开始发烧。张氏以为是因早春料峭，小孩子受了寒气，便请大夫抓了驱寒的药。然而，第二天小孩高烧不退，开始呕吐，身上还出现了类似淤青的斑点，姚家人开始惊慌起来。张氏原本是姚家女佣，因少奶奶并没有生育，便做了姚家少爷的二房，这才为姚家添了一个男丁。当他们得知张氏头天带小孩去了城东，顿时感到大祸临头。一向很少出门的张氏，不晓得南京城里正在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

据说，从1925年开始修建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陵墓即将完工，石匠需要160个童男和160个童女的生魂以合上龙口。为了得到这些童男女的灵魂，市政府正在进行户口和学龄前儿童调查，要把小孩的生日时辰报了上去。南京东门一带，已经有好几个孩童被摄走灵魂而夭亡。如今，张氏的儿子三天后也死了，姚家人悲痛欲绝。街坊邻居对此更为恐慌，孙陵摄魂的谣言逐渐在全城蔓延。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进行二次北伐。翻看这段时期南京的报刊，充斥着政府的北伐宣传、头版社论、宣言标语，以及军事胜利的消息。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频频受到国府嘉勉，3月23日，他写下《北伐与民众》一文，呼

吁民众支持北伐，这场战争“不特本党的成败所关，实为我国的兴亡所系”。

蒋中正没有想到的是，修建中山陵，原是对孙中山身后政治资源的处置和国民党政治形象的建构，如今却引发了摄魂谣言，而他自己也成为谣言的主角。4 月初，南京城里的摄魂谣言有了新内容：前方需要阴灵助阵，所以政府派了许多妖妇出来施行妖术，摄人灵魂。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神秘妖妇，身边携带着药瓶、符箓、小针等摄魂工具，出没于南京的大街小巷，随时准备走向无辜的受害者。

4 月 13 日傍晚，南区剪子巷育婴堂的姚屠氏，行走在街巷之中时，被一个妇人用手一指，她顿时觉得头晕，至今卧床不起。那个被她指认的名叫倪王氏的妇女当场被巡逻的警察带走。这一天，南京市公安局还接收了一起摄魂案的作案人，“妖姑”董李氏被皮殷氏扭送到了警署，后者指责她使用邪术，摸了她儿子的头部后，她的儿子就开始发热。

两天后的一起摄魂事件使谣言变得愈发可信，在市民中间引发了更大的恐慌。

白兰花家住闸口，她八岁的儿子在街口与伙伴们玩耍。有一个妇女走到他身旁，摸着他的头，问他叫什么名字，还给了他三块面包。然后，这个妇女转身离去。孩子的脸色立刻变成了紫色，四肢不再动弹，身体僵直。愤怒的路人追赶这个邪恶的妇人，终于在摆渡口追上了她，扭送到

派出所。警察从她身上搜出了两只玻璃瓶，里面分别藏着红色和绿色的丝线、纸人。这位窃取人们魂灵的妇女说，她收一个人的魂，要花费 50 元，如今她所收灵魂已经“收支平衡”，即便因此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谣言四起

如今，南京的空气中都是谣言的味道。

市民们把自己的孩子藏在家里，自己也尽量减少外出。一些比较小的学校，儿童自动退学，市立小学一度也到了要停课的地步。

事实上，这类事件并非首次发生。1916 年，浙江杭州也因为普查学龄前儿童而引发一场谣言。在那场摄魂风波里，风传 7—14 岁的儿童灵魂会被招去定木桩，用以镇压钱塘江水，以便铺设铁路。谣言激起了市民的愤怒，他们鸣锣聚众捣毁学校，打伤教师，直至官兵出面弹压，局势才稳定下来。与引起 1916 年杭州摄魂谣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摄魂恐慌，最早亦与市政府调查学龄儿童有关。这两次摄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设新学校而丢掉饭碗的私塾先生，不仅仅牢骚满腹，甚至散布和助长摄魂谣言。

南京市政府的处理方法如今看来富有理性和建设性。当谣言刚开始传播之际，南京市社会调查处马上报告教育

局，请教育局通令各小学，细致耐心地向学生家长解释调查学龄儿童的意义，打消他们的疑虑，以此辟谣。4月2日，南京市教育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提议印发广告，向市民解释调查户口和学龄儿童纯是为了市民利益，是为了办理市政，兴办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误会。很快，教育局就发了一张白话布告，解释中山陵需要小孩灵魂之事纯是谣言惑众。

教育局长陈剑翛也亲自上阵，为该局作调查的良好动机“鸣冤”：“如果我们不晓得学龄儿童是多少，我们如何知道要办多少学校，要请多少教师，以及需要多少经费等……不料正在实施当中，竟发生许多笑话出来。”他还反驳那些将摄魂与学龄儿童调查联系起来的谣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恶劣的当道，要着你们的小孩子的命或灵魂，还来公开的调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将去了。”

市长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发表后，亲自到南门外询问佩戴红布条的孩童，查问谣言从何而来。4月9日，市政府特地发布第881条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劝止家长在孩童们胸前悬挂红布。

事实上，中国人历来认为，人之生，是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则意味着魂与魄的相离。民间百姓最恐怖的莫过于“勾魂鬼”，因为灵魂一旦离去，人便要死了。吴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从南北朝以来佛教文化兴盛，转世、轮回等灵魂观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岁时节庆和神灵诞日，吴地的民众就要到庙宇中去叩头祭拜，

或抬着神灵偶像四处巡游，驱除邪祟。占卜、看相、算命、求签、扶鸾、讲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9年，作为预备立宪的一项基础工作，官府开始户口调查工作。结果，江苏许多地方流传官府调查户口，是要查清每个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调查者的灵魂卖给洋人修建铁桥。谣言广泛流传，激起了慌恐不安的乡民们和官府的对抗。乡民群殴调查员，捣毁调查员住宅，撕毁调查册，拒钉门牌，毁坏自治局所和学堂，甚至与官兵发生武装冲突，民变覆盖了江苏绝大部分地区。同时，因反对调查户口的民变遍及全国10个省区，共计69次，其中江苏居首位，达37起。

如今，南京市政府与之对抗的正是民众内心深处的观念。那些歌谣和神秘谶语，唤醒了民众心理上的狂热激情。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曾说过："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妖术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

4 月中旬以后，“妖妇摄魂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体性的幻觉之中。

4 月 16 日，李高氏经过马巷口一家烧饼店，她发觉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问路。烧饼店主却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体麻木僵硬。一个卖油条的妇女正好经过，也犹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过去。

像李高氏这样的普通南京妇女，在 1928 年 4 月，突然成了众矢之的。这一次，南京市民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尽管在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却一贯是受歧视的角色。她们过分热情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看上去和摄魂妖妇有天然的联系。于是，民众见到这样的妇女，开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来，发展到凡是三姑六婆，言行稍稍有些怪异，就被众人殴打。

群情汹汹，南京街头，行人动辄被饱以老拳。一个女人仅仅因为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因有一面之缘，便对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误以为是摄魂妖妇，于是众人一拥而上，扭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

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人们心理紧张到丧失了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却前所未有的活跃。一只玻璃瓶、几张纸、一个微笑，或一句言语，都会引发他们的敏感情绪，进而

导致暴力行为。

其中，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乱牟利。市民邓荣福经过马马氏家门前，向她问路。孰料，马马氏高声喊叫，说他是摄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围住邓荣福殴打他，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携带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人乘乱抢走。纱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读成文玉到城南书店买书。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时，也许是因买到了想要的书籍，她的脸上带着高兴的神情。于是，有一个妇女突然指她是摄魂的，这位可怜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抢走了。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为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面店老板娘发现自己的幼女被来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声喊叫，说他是摄魂人，于是不用亲自动手，其他顾客便蜂拥而上，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媒体为此忧心忡忡。4 月 20 日《京报》发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摄魂把戏》。这位怎不愁氏描绘了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几天前，《京报》就发出“妖妇摄取魂魄耶，流行病之传染耶”这样的质问，记者说，如今春气和暖，而南京人一向不讲求卫生，可能是一种传染病的大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证实了《京报》记者的猜测。陈剑脩发布了七字韵语布告，解释妖妇摄魂纯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它的流传，实际上是由于“反动分子”的“乱凑趣”

和“时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首都卫戍司令部也发出辟谣报告，指出谣言是潜伏的敌探和地痞流氓等人编造的，目的是为扰乱后方秩序。1927年以来，时局动荡，南京始终是一个旋涡中心。当下白衣苍狗般的时局，过往南京的战争劫难，和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遗留给民众的总是巨创深痛，与挥之不去的恐惧阴影。所以，才会出现阴兵助阵这样的谣言。毫无疑问，国民政府正好借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敌对势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多管齐下

4月17日下午两点，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孙伯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当天上午，公安局已经发出了辟谣警示，针对连日来民众“聚殴六婆，时伤行旅”的混乱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来办，“民众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审判之地”。对于那些已经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讯取供词，转送地方法院依法讯办。同时，也通令各区警署严密缉拿在案的逃犯等。

这次研讨会可谓是谣言传播以来最有效的一次行动。

农、工、商、妇女团体，公安局各区官员、新闻媒体代表共50多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探讨防治谣言之法。根据医生诊断，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脑膜炎一类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这个背景下，东门一带孩童染病死亡这一偶然巧合，配合学龄儿童调查这一契机，谣言得以讹传蔓延。

整个南京被动员起来了，各界自发组织破除迷信宣传队，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市长何民魂也于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职员训话，要求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把涉及谣言的几十起案件审讯详情公开。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图书馆召集南京64个团体谈话。详细解说摄魂谣言的种种，请各团体向亲朋好友宣传，详为解释。自然，他也痛斥“地痞流氓、孙传芳党羽”从中煽动。

当天，南京市市政府也发布了政府布告，解释摄魂谣言，公布了对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妇”的审讯结果，证明所谓摄魂之事皆为子虚乌有。若市民私自殴打行人，也将受到惩罚。

很快，就有人充当了政府的“宣传工具”。20日下午，一个叫康泉生的人到下关永宁街一家肉档买肉，被陈姓屠户指认为摄魂人。结果，康泉生被殴打致伤。岗警把两人带到下关区第二分署，署员的处理结果是，罚陈屠户赔偿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医药费，原本要严办他，后经下关总工会办事处主任出面说项，这才作罢。最后，陈屠户被要求雇了一辆马车送康泉生回家，他还要披红插花，沿途

燃放爆竹。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教育局长陈剑脩乘机拟定了五条辟谣标语，广为宣扬：（一）莫信妖人摄魂的谣言；（二）严防反动分子鼓动邪说；（三）邪说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术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灭邪说。

于是，在各职能部门的努力下，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妖术恐慌渐渐平息下来。

这起摄魂事件无意中也推动着政府建设新南京的步子。4 月 24 日，内政部长薛笃弼根据各国成例，拟定了《扫除法草案》十条，保持南京市的卫生清洁和市容整洁。南京市政府也推动发起了5月1日—3日连续三天的“卫生运动”，鼓励市民自发打扫街道，对公共厕所进行消毒，参观卫生陈列等。此时，卫生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卫生程度之高下，一国强弱可推知之。”

国民政府在处理摄魂恐慌这一社会危机时，与社会各领域在动态的配合过程中，重构公民和社会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起来。这可是寻常政治运作都难以实现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渐渐趋于平缓的时候，摄魂谣言却在上海、镇江、扬州、无锡、常熟等地再度复活，尤以乡村为盛。谣言说中山陵即将竣工，需要 1500 名阴兵把守，甚至安徽无为县的父母也给自家小孩挂上了红布条。

编造出来的荒诞故事被成千上万的人接受，除了说明

民智的落后、保守，也不得不慨叹作为群体的民众，如此容易地接受简单而极端的谣言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慌情绪。这，恐怕正是人心的幽微之处。

一个革命者的自白

主要人物：陈独秀（1879—1942）

“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诉，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

1932年10月15日，中共“托洛茨基派”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下午两点半，上海市公安局警探连同法租界巡捕，闯入虹口区春阳里210号，逮捕了正在开会的五名“托派”高层，现场还查抄了106件文件和34种俄文共产主义书籍。春阳里210号的主人，托派青年委员会秘书长谢少珊立即供出了陈独秀的秘密地址。

是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捕。媒体报道，这位54岁的职业革命家被捕时“貌甚清癯，唇蓄微髭，发已微斑”，穿着淡蓝色哔叽长衫，戴着淡黄色呢帽，正患着盲肠炎。

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

危在旦夕

10 月 18 日，陈独秀、彭述之等 11 人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在 1921 年和 1922 年他曾两次在上海被捕，原因皆为宣传共产主义，分别被罚款一百、四百元。这次，他却要面临不可预知的判决。

10 月 19 日，一干案犯被上海市公安局探警押往上海北站，乘坐 11 点的夜车前往南京。上海市公安局着实紧张，派临时保安大队在火车站特别戒备。犯人陈独秀反倒极为轻松，据说在火车上，他一夜酣眠，对自己可能被处死的命运，大有君子不忧不惧的气度。

他会经由军事法庭审判，还是普通法庭审判？可以说，这是决定陈独秀生死的关键。和他同为中国共产党奠基者之一的李大钊，1927 年 4 月 6 日被安国军政府逮捕，半个月后便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陆军刑事条例判处绞刑，并于当日下午行刑。

从 10 月 15 日被捕至 26 日，一直传闻说当局将组织一个特别法庭来审理陈独秀案。20 日押送南京后，陈独秀和彭述之被关押于军部军法司监狱，无疑加深了这传闻的真实性。21 日，《大公报》记者为此特地采访狱方，狱方回应说属于“寄押”性质，军法司亦未开庭审讯。但军法司禁止陈彭二人读报通信，读书也只可以阅读三民主义和其

他总理遗教。访客，包括新闻记者，则一概不准接见。

此时，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双方激战正酣。国民政府正集中 40 多万兵力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行营。陈独秀恰好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被捕，形势可谓极其不利。

各界营救

与此紧急形势相对应的，则是营救陈独秀的力量也在迅速集结。陈独秀被捕后，他的老友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于 10 月 23 日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大打感情牌，为陈独秀摆功："此君早岁提倡革命，曾与张溥泉、章行严办国民日报于上海；光复后，辅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尤有间接之助。"他们还提出，陈独秀反对苏区暴动政策，因而遭到共产党除名，与欧美立宪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无异，希望政府"矜怜耆旧，爱惜人才"，则"学术幸甚，文化幸甚"。

宋庆龄也特地为陈案从上海抵南京，然后转飞武汉。甚至发表在国民党中统局主办的《社会新闻》上的一篇署名"仿鲁"的文章里，也认为"似可不至于死"。

虽然有精英们的百般求情，但在国民党内部，党政人

员基于1927年之后国共双方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武装对抗现实，更多的声音则是主张对待陈独秀应该从快从重，以反革命镇压之。

国民党广州市特别执委会宣传部控制下的《广州民国日报》刊发社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经历的危难，原因在于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所挑起的内乱；而日本的侵略之所以能得逞，原因则在于国民政府忙于剿共："溯吾国共匪之由来，不能不忆及十年前李守常、陈独秀等之提倡"，因此，"应处以极刑，勿能宽纵"，否则，就是一面剿共而一面纵共。

杨镜芙也在《十月评论》上撰文《论陈独秀的所谓"功"和"罪"》，说陈独秀"是一个危害民国的大罪犯"，"自民国四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所作的都是始终如一的共产党的工作。这种巨魁，一旦被捕，是只有处以极刑，绝对没有轻办和赦免的余地"。杨镜芙还呼吁，"希望政府严厉到底，拿出对邓演达的手段来对付陈独秀"。

不少地方党政人员则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处以极刑"，"迅予处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仍存放着这些电报，发电人包括新疆政府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湖南衡山县、湖北罗田县、江西上高县等党部，以及陆军的几个师团党部。

舆论争议

此时的陈独秀虽非共产党的领袖，却也堪称一面大旗。前一年 5 月 1 日，中国托派组织联合在上海开会，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全面领导五人“常委会”。1932 年 1 月，他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呼吁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集中力量于城市职工运动，推动工人群众参加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

以上种种行为，无论是按照军法处置，还是按照 1928 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暂行反革命治罪法》治罪，陈独秀都必死无疑。

10 月 18 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内容十分详尽的陈独秀被捕细节的报道，称该案为“自清共以来第一起巨案也”。

与社会贤达苦苦求情和党政人员严厉镇压的态度不同，中立报纸则多倾向于用司法途径来解决陈独秀案。

10 月 19 日《晨报》发表社论，社论作者先厘清共产党的两个派别“中央派（干部派）”和“托洛茨基派”，陈独秀已非事实上的共产党首领；作者接着提出，主持共产党学说，组织共产党与实行危害国家，是三件事，不可混而为一；共产学说以反抗社会为目的，之所以发生，则由于人心之不平，人心不平，说明国家本身早有病根。所以，社论作者引用英国政治学者拉斯基的话说：“依往事观之，政府兴文字之狱，而能阻遏人民之指责者，盖无几焉。其

准人民之自由言论也，弊政既除，自少可以攻击之机会，反是而加以禁阻也，愈令人民迫而为秘密行动。可知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之由来，其责任在政府，而不在倡异说之个人”。

社论作者最后说，政府有根据法令维持其生存的权利，“故禁止实行危害国家之结社，乃事之当然者也。然此有无危害国家之行为之问题，应由谁决定？曰此非政府自身之事，而应由法庭判决”，故而陈独秀案应该在司法保障下，公正审判。

10 月 20 日，《益世报》也发表社论，从法律角度指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上海既非戒严区域，亦非剿共区域，故而陈案应由普通法庭审判，绝无组织特别法庭的必要。

10 月 28 日《大公报》发表的短评“营救陈独秀”，则在法律逻辑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对人性尊严的呵护，“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诉，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作者因此反对“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作为领袖，就要“有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行始终一致”。

傅斯年两日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也表达出类似的意愿，他主张陈案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他希望国民政府公开审判陈独秀，即

便有罪，也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

不仅如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和胡适、翁文灏等社会知名人士也致电蒋介石，请求摒弃政治干扰，将陈案视为一起普通的司法案件，“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应由军法从事。

司法占了上风

10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派专员去武汉，向蒋介石汇报逮捕陈独秀的经过，呈送同时搜查到的重要文件。

面对国民党内部要求从快处理的声音和社会贤达主张司法审判的呼吁，蒋介石考虑再三，于 10 月 24 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当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蒋介石来电，决议陈案“交法院公开审判”。

蒋介石将政治案犯交由普通法庭审理的做法看似出人意料，实际自有其发展脉络。国民党在 1928 年占领北京之后，按照孙中山在《建国大纲》里描绘的蓝图，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军政”阶段已经完成，进入“训政”时期。

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自治。从以颠覆旧制度为目标、奉行斗争哲学的革命党，转而为执政党，便不能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要用合法、和平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和斗争，巩固政权和建设经济。

于是，拥有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希望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都能逐步规范化。1929 年岁末，蒋介石借《大公报》通电全国各报馆，希望各报馆能于 1930 年 1 月 1 日起，就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尽情批评，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不仅如此，以前为适应“革命”时期的特殊法条也随之进行了修改。1931 年 1 月 31 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布施行，施行之日，1928 年 3 月 9 日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同时废止。原来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法律被终止。而陈独秀案此后的审判，也正是按照新法，以“危害民国罪”起诉，而非“反革命罪”。

此后，国民政府在 1931 年 6 月 1 日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人民之权利义务”部分增加了第八条、第九条，更与陈案直接相关。第九条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此条规定是陈独秀案最终交由普通法庭审判的直接的法律依据。第八条的内容为：“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

法请求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学者黄伟英便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待遇之所以完全不同，“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颁布所反映并推动的司法进步相联系”。

10 月 25 日，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传讯陈独秀。陈独秀正式澄清，自己与湘赣、鄂豫皖的共产党毫无关系，还向何建议应该联合苏联抗日。何应钦则正式表示，“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所以军法司无权管辖，于是命令司长王振南，“备文将陈等转解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

于是，陈独秀案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例由普通法庭审理的国内公民涉共案件。

待遇堪称人性

10 月 26 日早晨，陈独秀、彭述之被转到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管，江苏检察官朱儁奉命到南京审理这个棘手的案子。陈独秀本人也表达了对法律的尊重，受江苏高等法院传讯时，他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11 月 3 日，陈独秀、彭述之正式聘请章士钊、吴之屏等五人为辩护律师（他被捕之初，章士钊、郑毓秀等就

曾表示愿意义务为他辩护)。

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堪称人性。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因疾病缠身，书面向监方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窃独秀等自到贵所以来，诸承优待，惟对于伙食一项，以身份关系，本应自备，奈独秀等旅费拮据，复无亲朋告贷”，往昔风云叱咤的革命家，如今不减孤傲，坚称无罪，无须吃牢饭，然而“现均添疾病，经医诊治尚未痊愈；普通囚粮菜蔬虽可饱腹，实非独秀等平日习惯与病体所相宜”。陈独秀和彭述之患病期间，监方延请看守所外的医生为他们治病，江苏高等法院亦批准。从11月1日起，由公家发给每人每日上饭两餐，稀饭一餐，支洋三角。他被捕时，身无余物，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地拨了一百元，为他购置衣被。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1933年3月，检察官朱儁按照公诉程序，提起公诉。陈独秀起诉书的大致内容，一是他的个人经历中“涉嫌危害民国”等犯案要点；一是“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的具体证据。检方指控陈独秀“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党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结论是：“察核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合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开庭审判

1933年4月14日上午，陈案第一次公开审理。

那天，南京城大雨瓢泼，民众对此案的关注却未见稍减。各地百余记者云集法庭听审。9：35分开庭，检察官先问各人年龄、籍贯、住址等，以及拘捕经过，宣布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提起公诉。据媒体报道，陈独秀蓝布长衫，两鬓已斑，须长寸许，面色红润，审问时态度安闲，顾盼自如。不时，他还以敏捷的回答引发满堂哄笑。譬如，法官胡善偁问他，被捕的十人中认识哪几个？陈独秀的回答嘲讽有加："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侦探。"

胡善偁一时语塞，最后问陈："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理由是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中国人穷到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次日第二次庭审，陈独秀不是主角，最后传讯阶段，法官又问陈独秀，托派的最后目的为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陈答：是。

4 月 20 日第三次开庭，因为有公开辩论，不少人从上海、无锡、镇江赶来旁听。二百多人挤满了旁听席、记者席，就连法庭门外都站满了旁听者。

当检察官控告完毕，陈独秀当庭抗辩，这时已经接近下午两点钟。他集中火力在检察官所言的“危害民国”上：“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在书面自辩状里，他以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对此点阐述得更加清晰：“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

陈独秀抗辩后，辩护律师章士钊起立辩护。53 分钟滔滔雄辩，他亦是紧扣检方要点，驳斥检方的起诉书“无中无西，无通无列，一切无据”。首先，他引用孙中山之言，“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驳斥检方陈独秀反对三民主义的论点；其次，陈独秀于民国七年（1918 年）曾任广东教育厅长，后又与国民党合作；再则托派反斯大林反共产党干部派，“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最后一条，可说是章作为律师为当事人作出的有力辩护，孰料陈独秀当庭申明，说章律师之辩护，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也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

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下午3：30继续开庭，辩论一直持续到下午6：35。

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陈独秀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随即自拟“上诉状”，与章士钊等斟酌字句后，递交最高法院。“上诉状”针对判决书中“叛国之宣传”、“图谋变更国体”、“根本推翻民国”等判词条文，逐条加以反驳。同时，继续指斥国民党才是叛国者：“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制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

据同案的濮清泉回忆，陈独秀曾告诉他，当时高等法院指派法官颇费周折，“谁也不愿审理这种倒楣案子，一点油水没有，还要上下受气，挨人咒骂”。果然，宣判的第二天，《大公报》便发表社论，批评“偌大案情，仅仅公开辩论三次，审判长讯问亦极简短”，而且检察官素养也太低，希望上诉过程中，应该进行更为严密深刻的审讯，法官也应选择洞明世界政治经济潮流之人担任，“然后发问诘难，乃可中其核要”。

一年后，最高法院刑庭最终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陈独秀没有被宣判无罪，但获得减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面壁读书、潜心于学问。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关押陈

独秀的那幢房子屋顶震坍，他躲在桌子下逃过一劫。老友胡适焦虑万分，致信汪精卫求援。汪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政府核准，经由司法部训令法院按正常司法程序，一天之内，以战争特例宣布陈独秀减刑释放。

1937 年 8 月 23 日，陈独秀走出了高墙。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陈独秀退居四川江津。“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他在孤寂中逝于 1942 年 5 月 27 日。病逝前一年，他写下了一篇令人震颤的文章《我的根本意见》，站在历史的全局论民主主义，指出“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可视做几年前那一段公案的余韵。

归来，司徒雷登！

主要人物：司徒雷登（1876—1962）

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2008年11月17日，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的安贤园，安眠于苍翠青山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学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说。

长久以来，司徒雷登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遗忘，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如今，他的名字再一次划过人们的视野。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度被书写为"声名不佳"的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在中西文化边缘的人，如何在个人意愿和宗教所需之间，在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并融合美好的理想和现实的困难？

一

1936年6月24日。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里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开幕前，年轻而英气勃勃的学生们向一位外国老翁献上了一幅中国传统刺绣。此时，全场观众起立，向他三鞠躬。

多年后，这位老翁回忆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动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不仅在燕大，全国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寿活动。在燕园的祝寿活动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他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

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赞美：“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

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他登上了在中国事业的巅峰。

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他曾经为了去不去做这个麻烦的大学校长而犹豫不决。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承认：

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催促我尽快作出决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时又得勉强答应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我多次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彼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应手，而且还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应该可以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传教士和写作者，但命运最终把他推向了一条更为辉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

二

1919 年 1 月 31 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

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然而，他发现自己身陷一团麻烦中。

首先是给这所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大学命名的问题。在《在华五十年》里，他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和“分歧”情形。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也声称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而其他学校的师生则坚决反对新校用“汇文”做校名。

通州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司徒雷登会见的双方毕业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教会工作中都表现突出。他们对学校联合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对情绪，被司徒雷登认为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

在纠缠的泥坑之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司徒雷登建议，校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一位叫诚静怡的杰出传教士提议用“燕京”做校名。古代燕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富有魅力和诗意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称是由蔡元培和胡适提出的。

然后是为新校选址而奔走。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

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司徒雷登认为，应当重新选一个新校址。

他回忆："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一次，他应清华一些朋友之约聚会，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于是，一次谈话产生了一座美丽的校园。

选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是大学最重要的筹款问题。在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之时，他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据说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鲁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荐鲁斯担任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由他主管经费方面的问题。

然而，到任后，司徒雷登却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资金而奔波。抗战前，他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后来还在中国发动募捐。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在遥远的中国的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上，他撰文说：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楼，更大的图书馆和图书设备，还需要添建一座妇女医院和几座教职员住宅。我们每年收入已超过七十万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

采用最经济的计划，也还是不够支付目前所进行工作的费用，而且还没有储备足够资金用作扩充建校计划及作临时救济金和弥补物价高涨之用……

事实证明，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会“找钱”的大学校长。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可以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

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其中教会拨款仅占到14%。

三

财政经费的增加使许多热情洋溢的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司徒雷登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一起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它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第20章第28节的“人本来不

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后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托马斯·杰斐逊书写在该校的正门上方。

灵感使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多年之后，他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长方形的汉白玉墓碑告诉过往的人，这里是著名的斯诺墓。墓地往南，是两幢古典式的二层楼，这是当年燕京大学新闻馆，斯诺曾经在这里教授新闻特写、旅行通讯两门课程。后来，这里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学楼。

燕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创办新闻系的大学，初创于1924年，中间因经费短缺而一度停办，1929年重新建系。新闻系的指导思想在今日的新闻人看来，仍然令人激动：“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彼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草创阶段。燕大新闻系的首届毕业生竟然只有赵恩源一人，若干年后，他成为著名的《大公报》的副总编辑。1931年始，新闻系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著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开办讲座。新闻系声誉日隆，毕业生大受欢迎。

这一切，当然与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有关，他曾说新闻系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当他躺在“临湖轩”寓所的床上，想着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一度“垄断”了中央新闻社派驻各国的代表，那种满足感一定非常美妙。而从司徒雷登寻到这块土地之时，他所希望建立的就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

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走向了更加彻底的中国化。在 56 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 36 位是中国人，其中的 20 位是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其余 15 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有一位是在中国旧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1928 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是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30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燕京大学所作的努力和作为个人的成功。

战争的到来打断了顺利进行的大学教育。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之前，华北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燕京大学升起美国国旗（这以前它只挂校旗和中国国旗），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

据当时的统计，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 800 多人，“七七事变”后骤增至 1200 余人。然而，小心谨慎并未能

使燕京大学逃脱厄运的打击。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即时由日军接手管理。“九日遣散学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携衣物，一时俱散”（邓之诚《南冠纪事》）。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做伤兵医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学生相继被日军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后两天），司徒雷登在监禁中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

以前，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盛极必衰”，那是因为在风云诡谲的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人为近代以来首次的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厄运时期。

四

1946年，二战结束，七十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毁于一旦。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

权，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美高层之间的接触机会稍纵即逝，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

1949 年 8 月 2 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离开了一生的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而在西子湖畔和燕园里，长眠着的他的父母和妻子。为了挽回影响，8 月 5 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因为他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1952 年蒋介石也明确表示不再欢迎他到台湾。

而 8 月 18 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 50 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永远淡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司徒雷登备受打击，中风偏瘫，被送到了医院。

13 年后，他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华盛顿，临终遗言是希望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的墓旁。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于有人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认为他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因此一直到 2008 年 11 月 17 日，他的骨灰才最终安放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

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他在开篇第一段写道：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

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1952年，几乎熔铸了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并入了其他几所大学。尽管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一般传教士身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北大校长蒋梦麟语），他仍然不免于困惑、无奈和尴尬。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青灯坐时细论文——萧红在青岛

主要人物：萧红（1911—1942年）

“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不仅仅是那个大时代中民族的悲剧，也是一个柔软女性试图精神突围却最终失败的悲剧。

1934年6月15日，日本轮船“大连丸”在青岛码头靠岸。

两个年轻男女满面风尘地走出船舱，走向迎接他们的朋友。悄吟和三郎，两个逃出东北沦陷区的文学爱好者，在这美丽整洁的海滨城市短暂地停留，开始了他们文学生涯最重要的起点。在这里，一个名叫萧红的女作家诞生了，并以她那独特的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05年6月22日，我站在观象一路一号的石门前。这是一幢石头基座的二层小楼，外观陈旧。像青岛常见的老房子一样，这幢小楼的楼基也是很高的石座。经过东侧一个水果摊，穿过石门，拾级而上，便是一楼。院子里随意拉着几根绳子，晾晒的衣服纠缠在一起随风飘动，如万国旗帜。

楼上传来不太熟稔的小提琴的声音。跟随着音乐声，我按了1号的门铃。一位大姐应门而出，我告诉她我是来

寻访萧红萧军的故居。

“最近好多人来找哦！”这位叫李春玲的文艺爱好者告诉我，这幢小楼里现在居住着七八户人家。原先简单宽敞的两层楼，被隔断成好多个房间。

“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萧军《青岛怀踪录》）

我猜测“突出的单间”可能就是李女士家现今的客厅。所谓的“太极图”山墙，早已湮没在后来涂抹上去的石灰里了。

从客厅里望出去，正对面是收拾得整洁漂亮的一栋栋小楼，一律淡黄色的墙体，在蓝天碧树的掩映下，不真实得像童话世界里的美好国度。小楼背后就是观象山，1905年德国人在山上建立了气象天测所，于是这座小山就有了一个名字“观象山”。

据李女士说，现在的住户中，这里最早搬进来的是西侧门牌号是4号的“丽莉幼儿园”。对于萧红萧军的事，她完全是道听途说。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石门旁的水果摊原先是个车库，一楼则是用人房。“他们那时候可是自己住哦，不像现在住这么多人。”我忍住了没告诉她，那是两个穷文学青年，不要说有车有用人，吃饭恐怕都成问题哩。

二萧的朋友梅林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们共同的青岛

生活：

三郎戴了一顶边檐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一个洋车夫，一个村女郎，却在青岛过起了神仙日子。他们徜徉在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午后则跑去海滨浴场，在蔚蓝色的海水里浸泡年轻的身体和快乐的心。

“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八年后，萧红无助而悲惨地死于香港陷落的炮火之中。

三郎和悄吟，两个热恋着文学的青年，在流亡途中开始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悄吟一边操持家务，一边从事写作，三郎以“刘均”的名字在一家小报《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

位于广西路上的荒岛书店对他们意义非凡。这家小店主营新文学图书，书店不大，开架售书，还放着几把椅子。夏天的时候，萧军常常要到海水浴场洗个海水澡，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他常常到书店里遛遛，喝杯茶，有时还

要吃个西瓜。书店的老板孙乐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故而荒岛书店是青岛“左联”的活动点之一。也正是在荒岛书店，后来的电影艺术家黄宗江认识了书店老板，孙乐文又把他介绍给萧军，从那时起，黄宗江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实践。

也就是在这几个月，23 岁的萧红在流亡中开始写作《生死场》，写得极顺手，9 月 9 日，小说写成。萧军也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小说写得好不好？怎样出版？这时，孙乐文提醒了他们。孙说起有一次在上海内山书店看到了鲁迅先生。萧军一下子想到给鲁迅写信，就寄到内山书店。在信中，萧军向鲁迅请教：一个决心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应该做些什么，此外还想请鲁迅看看他和萧红完稿的两部小说。在这封信中，萧军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此后就一直使用这个笔名。

很快，他们收到了鲁迅的回信，针对萧军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是——

1. 不必问现在要干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

2.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

收到信的二萧，高兴得跳了起来。萧军更是一遍遍地读鲁迅的来信，“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他

们把《生死场》的抄稿和二人已经出版的集子《跋涉》一起寄给了鲁迅。

此时，报馆发生了变故，同事一时星散。萧军萧红和挚友梅林勉强维持到了11月，连烙饼和大菜汤都吃不起了。于是他们将报馆里的两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辆独轮车上去拍卖。可能实在是穷极了，他们恨不能连门窗都拆下来卖。

12月初，他们搭乘一只日本船离开青岛，在货舱里，同咸鱼、粉条一道被运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见到了鲁迅，并成为鲁迅家中的常客。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率先出版，鲁迅作序："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

《生死场》的出版却不太顺利，被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搁置半年后，仍然未得到许可，后来终于作为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

鲁迅在序言里如是称许："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则在读后记里评价说："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一个叫萧红的女作家一跃成为一颗闪耀的明星。

环小楼转了一圈，我确信除了大门口的一块匾额，这里其实已经没有萧红萧军的丝缕印迹。一腔幽思没了着落

处，正烦恼，一个老大妈看我拿着相机左拍右拍，冲我大喊：

“小妹儿，你想干啥？”

是啊，我想干吗？

十年前，教现代文学史的教授带的研究生，一个瘦瘦高高的腼腆男生，给我们上毕业实践课，他讲的就是萧红。“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我至今仍记得他略带稚气的朗读声。再往前，上中学的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现代女作家的故事，深深地被萧红和萧军的传奇故事感动着。

我坐在观象一路一号的石级上，心中所想的正是十年前那被触动的柔软心怀。

在朋友眼里，萧红是个“神经质的聪明人”，“有着超人的才气……既温柔又爽朗”。胡风回忆，在上海的时候，一次从鲁迅家里出来已经夜深了，电车已经停运，只好步行回法租界，大概十里远近，他们一路走来谈笑，毫无倦意。萧红和胡风赛起跑来，萧军在后面鼓掌助兴，忘记了这是很危险的事。

能听到皮鞋敲击着柏油马路的声响吗？

此刻，我能想象穿着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的萧红，扎着花围裙愉快地收拾房子，坐在书桌前写下《生死场》的一页后慢慢微笑的样子。萧军曾回忆说：“每于夜阑人静，时

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

然而，良宵苦短。她并不是通常所谓的女作家，有优雅的文章和罗曼蒂克的生活。自从1934年离开东北，半生漂泊，1942年，于香港早逝。萧红的一生，就是一部灵魂吟唱的悲歌，充满了对生命消磨的无尽忧伤和体悟。

以《生死场》而言，确实呈现了民族危亡之际“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和悲壮”（胡风语），但其中所描摹的征服和抵抗、生和死、爱和恨，却不仅仅在民族、国家之间展开，同时也在性别之间。

萧红一生，没有突破社会的牢墙，她的天真被苦难污染。她临终前一心想回呼兰河，她说：“这样死，我不甘心”，又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骆宾基《萧红小传》）。然后掷笔微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不仅仅是那个大时代中民族的悲剧，也是一个柔软女性试图精神突围却最终失败的悲剧。

几十年后，重返青岛的萧军寻访旧时故居，在观象一路一号，他说：“当年，每当我写作累了，便从窗口向外探望。”后来，他写下了两首旧体诗《青岛怀踪录》及序。

“夜气如磐怀故垒，青灯坐时细论文”，他们当年一定觉得今生今世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感受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的目光，作为读者的我的目光，回头重新审视那些夜晚和那些渔火，我知道，那只是他们人生中诸多感受中的一种。

胡兰成：人如乱世

主要人物：胡兰成（1906—1981）

于性命家国大事，他待之如云影水流、风吹花开，虽说举重可以若轻，然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到底不是真轻，历史自有其沉重分量。

此间今日获悉，前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胡兰成，于7月25日在日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据日本共同社称，胡兰成因心脏衰竭，于25日在东京都青梅市寓所病逝。从他辞去台湾教职后，1976年回到日本。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中任职，中共占领大陆后，他于1950年来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1981年7月28日，美国合众社发了一条东京电讯，报道了一个叫胡兰成的文人的死讯。一个月后，胡兰成的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前来吊丧的人都收到了一份赠礼，上有胡兰成手书“江山如梦”四个字。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写了一段深情的说明：“内附的‘江山如梦’是亡夫多年来萦绕于怀的感慨，在晚春的一个夜晚忽然吟出的。所谓江山，是指故国的山河、扬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来，是指故国本身。所谓梦，就是空、是色、是善、

是美、是真、是遥、是永久的理想。敬请收下，以追忆胡人。”

如果不了解胡兰成的背景，很可能被这一段深情款款的言辞所感动，这分明是身在异域心怀故国的一位爱国者最后的怅惘，系怀于父母之邦，在在难忘。

但四十多年前他为自己挣得的一顶“汉奸”的帽子，却无法轻易抛掷一旁。人们记得才子胡兰成，津津乐道于他和女作家张爱玲的一段倾城之恋，同样不会忘怀他曾经进入汪精卫集团，官拜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集团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等。

投身汪伪

胡兰成介入汪精卫集团，亦是因文而起的“恶缘”。

1937年，31岁的胡兰成在广西小试牛刀，在《柳州日报》发表社论文章，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惹怒了地方势力，被关了33天。出狱后，他回到故乡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探望久别的家人。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年轻人面临着这个年龄的普遍窘境：身无长物，却要赡养父母抚育儿女，他需要一个有“钱途”的事业。

经济的因素，在他投身汪伪的过程可能占据着不少分量。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这样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却说我从广西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古泳今，他今在中华日报，要我撰稿试试，到胡村后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手工业，又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寄去发表了，都当即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且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中华日报以为有了面子，就请我当主笔。本来是当总主笔，因我谢绝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故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

他的这段自我表白颇有不合情理之处。《中华日报》竟然因为一个无名文人的两篇经济文章就要聘他做总主笔？胡兰成的一生，真真假假，不仅对女人，就是他的经历，也颇多涂抹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亡命温州之时，化名张嘉仪，便告诉别人说自己肄业于北京大学。在《今生今世》中，他更正说自己当初亦只是在北京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文书抄写一年。

他就像是乡下的一个聪明孩子，读了些书，出来闯天下，一如江弱水所言，“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日后他为和张爱玲合办的《苦竹》第一期撰文《贵人的惆怅》，说英雄的子孙，“他们之中多数是软弱的，什么惊人的事也做不出来，只是沉湎于性欲，刚刚即位，就变成了大行皇

帝，很少有活到二十几岁的。他们如同茧子裹出来的蚕蛾，交媾完了就死掉，原始的生物。”他亦是一个原始的生物，无有节行，又兼有创业之主的野性和雄心——一个乡下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

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首先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故而相信胜败也无非“桃花开了荷花开，我们去了新人来，亦不是我们有何做得不对”。其次，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对日本，他则全无恶感，甚或目为亲戚。“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又说“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以至见到南京机场沿途的日本兵，也觉得“着实有一种大气”，就连恶名远扬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他也觉得有梁山泊的“阳气”。他的这些糊涂话，偏要用“民国世界”、“一统河山”一类的大言装点。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任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同时还在皇后道华人行蔚蓝书店兼职，研究战时国际情势，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分担按月写一篇报告（《南华日报》和蔚蓝书店均由汪派控制）。真正令胡兰成声名鹊起的，是他为《南华日报》所写的一系列社论，为汪精卫集团进行舆论造势和新闻宣传，尤其是他所写的《战难，和亦不易》这篇社论，为已如离

弦之箭的汪精卫摇旗呐喊，由此得到了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赏识，进入了汪伪集团的核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一开始疾言厉色："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接着话锋急转，"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这无异于一份招降书，日本对所谓"新生的中国"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蒋介石对此反应激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长篇演讲《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认为近卫的声明"表面空泛支离，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他也担忧出走河内的汪精卫，"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在12月21日的日记里，蒋介石如是说。

心神不宁的汪精卫在旅馆摔了一跤，扭伤了一条腿，在卧榻上读到近卫的声明，尽管与之前的重光堂密约（11月12日汪日所签汪精卫参加"和平"运动的条件）相差甚大，但此时他已是过河卒子，便起草了一个声明，主张和日本讲和，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这便是臭名

昭著的“艳电”（因汪精卫电文末尾签署日期是12月29日而得名）。

仅仅五天后，胡兰成便为《南华日报》撰写社评《我们的郑重声明》，抗议国民党中常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他列举了五条理由，证明汪精卫护党爱国，认为汪、蒋都是要“和”，“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所以不是原则上的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

文章收入了《战难，和亦不易》这本社论评论集。这本集子一共收文104篇，写作时间从1939年1月4日《我们的郑重声明》开始，到12月12日的《建军的使命》止，胡兰成摇唇鼓舌，一年之中，平均约三天就有一篇政论文章问世，其写作的热情令人咋舌。他为汪精卫辩解骂敌，分析时局，预测战争形势走向，激越昂扬。

汪精卫对这员干将也不吝赞美，他亲自为这本社论集作序：“胡兰成同志所谓‘战难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兰成同志于艳电以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胡兰成同志大声疾呼‘争取主动的和’实在是对症下药，稍微留心和战大计的人，没有不点头叹息的……”

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进入汪伪集团也才短短两年，便获得党魁如许高评，胡兰成不免沾沾自喜。

汪精卫从河内抵达上海后，即召见这位鼓吹“和平运

动”的旗手。事后追述时，胡兰成一贯地用词虚实夹杂：“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汪精卫和胡兰成拉起了家常，嘘寒问暖，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张爱玲曾说胡兰成“你是对人易生感激，却难得满足”。汪精卫的知遇之恩一时让胡兰成感激万分，他成了汪的“文胆”，每月有不菲的收入，还有巨额机密费。但当成立汪伪政府时，重心已经从宣传工作转移到政府组建上，摇笔杆子的胡兰成无缘各个热门职位，便做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摇唇鼓舌

同为汪政权媒体人的金雄白，1959年回忆往事，写下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他感慨：“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

“依违其间”，“夤缘谋食”，“侥幸得志”，可谓道尽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头几年风光。然而，很快，他将要再次遭遇囹圄之灾。“霸图兴亡事，我所参加的一份却只像是春天斗百草”，他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文人，感性而没有坚固的思想，自以为举重若轻，实则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缺少默契。他爱做官的那种感觉，“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却并无做官的智慧。在汪集团内部，他属于汪精卫的公馆派，和周佛海派不和，但在公馆派内部，他亦不属于重量级人物，兼之文人张扬个性，也只敬服汪精卫一人而已。

1940年，汪政权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穆时英被重庆派来的特工人员暗杀，胡兰成辞去了《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职务，接手穆时英担任社长的《国民新闻》。从汪精卫的“代言人”，转而为边缘人，似乎更加远离汪政权权力核心，实则他始终保持着对汪精卫的敬意。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则把《国民新闻》归于李士群系。

胡兰成办此报的目的，是“借这个报来重申和平运动当初的主张，拒绝承认现状，不肯称和平区而仍称沦陷区，且指出沦陷区与抗战区是一个中华民国”。他因此向汪精卫提出，当初说“和即是全面和”，因此日军应该从江苏撤退，由南京政府来维持秩序。汪马上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没想到日本人居然同意了，还提出单只警察和特工不行，还要军队接防军队。于是在这一年，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李士群担当主任，可以以汪

精卫的名义指挥南京政府在江苏的一切军队和行政、经济机关。胡兰成本来有希望担任秘书长，但最终清乡的建议由警政部部长李士群联合最高军事顾问部顾问日本人晴气庆胤提出。这正被奉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日本人利用。

就在这一年，胡兰成因为发表在《国民新闻》上的社论，开罪了汪政权里的实力派周佛海，被免去了宣传部政务次长一职，在周佛海派和李士群系之间发生了一场内讧。金雄白十多年后感慨：“政府成立不过二年，而一切现象，何以酷似南明与洪杨的两个时代？大人先生们动不动高张盛筵，穷奢极欲，又往往召名伶演剧，继续至数昼夜，这样的粉饰太平，醇酒妇人，与马士英、阮大铖辈在南京迎立福王之后，有什么不同？”结果，李士群被毒死。战后，周佛海的干将罗君强在南京高等法院法庭上供认，毒杀李士群正是他所主谋。

在汪政权内部的钩心斗角中，胡兰成先担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充当汪精卫的“挡箭牌”。一年后，他得罪了不少人，众议沸腾下，汪精卫取消了法制局，调胡兰成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接近于免职。闲极无聊，他和继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去参加每周六日本大使馆的恳谈会，从此开始了和日本人的“亲密接触”。

他结识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亦为自己招来一次牢狱之灾。与池田相识之后，他写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政论文章，“无意中”被池田看到。

池田翻译成日文，给当时的日本大使过目，最后又传到了汪精卫那里。“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国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状，我将来逃走，也要留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文中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胡兰成后来如此解释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想表达的意图。

因文招祸，胡兰成被关在了上海路十二号——“政治工作局”（汪政权的另外一个特工组织）的看守所，逮捕令由汪精卫亲自下达。胡兰成被关押了48天，最终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2005年5月号《印刻文学》刊发了李黎等访问胡兰成侄女胡青芸的文章《今生春雨，今世青芸》，提及1943年胡兰成被逮捕，几遭杀身之祸，是侄女青芸从上海至南京奔走营救，找到池田出面，胡兰成才免除杀身之祸。江南女子，有情有义，自有一番惊天动地。

乱世才子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他身陷囹圄之际，同为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作者的张爱玲，动了怜才之念，还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请代向汪精卫求情。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张胡“初见”——胡兰成一腔热情去拜访才女，吃

了闭门羹，留了名片，然后是张才女回访旧才子。

1944年，胡兰成降优了沪上的知名女作家，“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女作家的才思也刺激了他。2月，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批判》。3月，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皂隶？清客与来者》、《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5月，在《天地》月刊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瓜子壳》。5、6月，在《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发表《评张爱玲》。六月，在《天地》第九期上发表《读了红楼梦》。7月，在《天地》第十期上发表《随笔六则》。8月，在《天地》第十一期上发表《乱世文谈》。就这样，他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来来往往。

这段爱情中不乏世俗常态。据沈寂回忆，有一次，两人去兆丰公园游玩，不料被佘爱珍得悉，追踪到公园，猛掴了女作家一记耳光。这个佘爱珍原是上海滩著名的“白相人”吴四宝的太太，吴四宝是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警卫大队队长，后被李士群毒杀。金雄白说起那一段，特别看不起胡兰成，措辞极不堪：“（胡兰成）曾以吴四宝作为他生平的第一知己，但吴四宝暴毙后佘爱珍抢天呼地，他去扶持她的时候，毫不讳言温香在抱，忽起淫心，可谓恬不知耻。两人侨居日本时，一鳏一寡，难安寝枕，遂尔废物利用，居然结成夫妇。”

同时和第二任、第三任妻子登报解除婚姻关系之后，

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了，一纸婚书定了乾坤。“……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张爱玲遗作《小团圆》里，女主人公九莉将这一段感情看得如许重要，那应该也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境写照。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挫败，颓势已显。而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也在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不治身死，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事实上汪政权已经日暮途穷。闲置已久的胡兰成却有了“不受束缚、大干一场”的机会。这一年 11 月，由池田陪同，胡兰成带着沈启无（曾为周作人弟子）、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楚报》。

办报是他的老本行，这次挟日人之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先以言论吸引读者，然后整顿内务，并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日本人对他亦多所照应。日本在华军的三品报道部长，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都和他交往密切。有这样的背景，一切都好办，即便偶有所谓“反日”言论，亦可标榜报纸的独立性，符合日本的更高利益。

“乱世情意漂失，便道德文章学问亦于身不亲，不能得我敬重。”1944 年末，盟军对武汉的空袭愈来愈密，日军日渐衰微。“空袭使我直见性命，晓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华，又什么是骨力。”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如是说，他倒把才结婚的张爱玲抛在一边，

又和 17 岁的护士周训德谈起了战时恋爱。

每每遭逢生活零落之际，胡兰成却执著于一切小事而非大局，日常的柴米油盐，爱人的轻颦浅笑，这是他的内心出口抑或真是“天道无情”？抗战胜利后，他颠沛流离，在 1950 年去香港前，一直辗转隐匿于杭州、金华、诸暨、温州等地，亦仍然不忘才子红颜故事，和收留他的人家的姨太太范秀美同居。

1945 年，日本败局已定，投降在即，时任《大楚报》社长的胡兰成出版了《中国人的声音》一书。书中收有 31 篇政论文章，写于 1945 年 1 月中旬至 3 月初。胡兰成以一身而指陈“中国人”，为日本人张目：“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日本倘使战胜……她将不能不让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这篇《日美战胜对于中国》写于 1945 年 2 月 21 日，离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胡兰成仍可以如此这般自欺欺人。此时，就连周佛海在 2 月 9 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从日军那里要了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踌躇满志，想和蒋介石讨价还价，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他的计划胎死腹中。9 月初，他逃离武汉，在给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袁雍的信中，他依然自诩国士：“国步方艰，天命不易，我且暂避，要看看国府是否果如蒋主席所广播的不嗜杀人，而我是否回来，亦即在今后三五个月可见分晓。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杀者。”

钱定平在《胡兰成五题》里评价说："早年生活如果穷愁困顿，能给一个人带来生的振奋，也能够给他造成志的沉沦。"胡兰成最终沦为汉奸，且无论如何无法"漂白"，大概和他"志的沉沦"有直接关系。

许多年后，胡兰成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钱定平愤然说："好一个'如天地之不仁'！简直就是'以万物为刍狗'的翻版。但老子是说天地，胡却把这反过来用到自己身上，磨练砥砺他的不仁不义、逆伦异心。"

胡兰成自诩是中国文化的通识，却不晓得古人的大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经·说卦传》）于性命家国大事，他待之如云影水流、风吹花开。虽说举重可以若轻，然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到底不是真轻，历史自有其沉重分量。

他以士自诩，却是典型的"策士"心态，为个人的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凭借机谋智慧、口才文章，四处奔走游说，即俗语所说"有奶便是娘"。胡兰成流亡日本之后，经岁寂寞，晚年曾回台湾重弹旧调，在台湾中华文化学院教书。不久汉奸身份暴露，被台湾一帮文化人驱逐回日，几年后命丧异国。他亦曾给蒋经国上书，皇皇两万长文，大谈"民间起兵"、"士的文化"、"教育改革"等：

中国史上自汉以来，凡开启新朝皆经过民间起兵，此民间起兵之传统为世界上他国所无，所以总理定出军政时期，以发扬民气。又自尚书周礼以来一直以士为政，此亦是中国独有之传统，为他国所无，所以，总理定出训政时期，以党治国，中国说“政教”，不像西洋说“政权”，政治的本质即是教育性的，所以中国文化人对于政治那样的抱有兴趣，而且对于时局有着那样大的影响力，凡此皆为他国的文化人多不能了解。中国的文化人是士，此又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

余英时曾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中国的“士”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士的特性便是“通古今，决然否”。胡兰成却不记得，“士”这种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里，“士志于道”，是要明道救世、维护基本价值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作为一个“士”，需有“澄清天下之志”，胡兰成以士自诩，非但没有澄清天下，还乱中牟利。钱定平说他是“政治上无大义可言，思想上无原则可说，生活上无道德可讲的无聊文人”——他根本便是一个乱世。

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主要人物：无数战时青年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

1941年10月30日，西南联大昆华工校二楼大教室，许渊冲第一次有了生离死别的感觉。当学生代表、低他一级的学妹林同珠带领大家合唱“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时，往常平淡无奇的学生生涯顿时显得熠熠生辉、格外亲切。多年之后，已届垂暮之年的许渊冲回忆起这一幕，不禁热泪盈眶，他看上去有些伤感，却又带着遥远的记忆的甜蜜。

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同学四年，直到离别时才体会到潜藏心灵深处的友谊。同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参加欢送会，不来也好，来了可能会分散我对大家的注意力，那就是为了个人而损害集体了。”这一年，许渊冲20岁，是联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正思慕着学妹林同端。

八天前，他和同班的黄维、杜运燮、吴琼、罗宗明、万兆凤等三十多人报名参军。

这一年，抗战进入了僵持阶段，日本人决心使用拖延战术，直到中国因内部分裂而崩溃。1940 年 9 月，日本人占领了越南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铁路线。于是，国民政府只得依赖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香港的空运和通往苏联的路线，从外部获得供给。重庆和昆明，这两个并没有军事目标的重要城市，不断遭遇日本人的狂轰滥炸。“日本人精心选择，蓄意要把重庆夷为平地。对于城里的所有人民，是想挫垮他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精神；对于政府，是想摧毁它的抵抗”，《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为此愤愤不平，“从那时起，当我们轰炸日本时，我从未产生过一点内疚之感”（《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许渊冲和他的同学们一次次躲避空袭。1938 年 9 月 28 日，第一批敌机来袭，扔下十颗炸弹，两名学生不幸身亡。很快，空袭成了家常便饭。“空袭警报响了。城里人纷纷向外跑，只有我一个人向城里走。回到北院宿舍，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宿舍的门都已关上，就像闭着的眼睛。一点人声也听不到，只听见飞机的嗡嗡声，只看见飞机在天上画下了几个三角。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寂静和恐惧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

1940 年 9 月 30 日，27 架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市区。学校不得不改变作息时间，避开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的空

袭高发期，改为上午七点至十点上四堂课，下午三点至六点再上四堂课。六点吃顿干饭，中午吃米饭，有警报就不吃，晚饭则是六点半吃干饭。

然而，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10 月的一个夜晚，大轰炸过后，外文系教授吴宓穿过房屋毁圮、瓦砾尘土堆积的劫墟，去新校舍讲授柏拉图。许渊冲记得，他是仅有的两名听课者中的一个。

有一天，那些画三角的飞机被击落，在空中燃烧，成为残骸碎片，将会有他的一份功劳。

没有经历过烽火连绵的战争岁月，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体会到联大人的“刚毅坚卓”，是建立在战胜现实之困和心灵之苦上的。与战前相比，僻居西南一隅，昆明的生活实在令人沮丧。尤其是 1939 年前后，昆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和微薄的政府补助，使得知识精英们变得有些无精打采。

1941 年 7 月，法学院的钱端升教授写信给费正清，抱怨“这里的大学生活极其不尽如人意。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是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它还是。要是这样，那么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很差。三所学校不能同一条心……无论什么事都是打水漂。没有人有积极性”。

不过，过惯了漂泊生活的学生倒不觉得特别的辛苦，为了维持生计，1940 年前后，学生们开始兼职，到 1943 年已经非常普遍。此外，他们专心学习、泡茶馆、打桥牌，

青年人的适应能力，让他们很快找到了应对孤独、忧虑的排遣方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联大男女比例为九比一，相比其他系，外文系的女生最多。除了听课、读书，和同学谈天，许渊冲开始注意起漂亮的女生们。

许渊冲的同班同学杜运燮和黄维，都是1939年转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借读生。战时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战区失学青年，联大的不少学生都是从其他大学转来的借读生，一学期或一学年之后，只有通过联大的转学考试，才能算是正式的联大生。此举既在特殊环境下保证了莘莘学子能够就学，也吸引了全国众多成绩优异的学生。

事实上，联大远离政治中心重庆，一直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它也是战时中国自由的象征。1939年入学的何兆武回忆说，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教育部规定党义是必修课，联大采用灵活的方式，用讲座的方式，后改用交读书报告代替。实际上，有些学生从未听过课，也未交过读书报告，但所有学生成绩单上这门课都被列为及格。

实际主政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直奉行着他的学术自由宗旨，一如他数年后在日记里写下的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

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于是，联大的校园里活跃着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组织社团，出版壁报，排演话剧和音乐会。

杜运燮是左倾文艺团体“冬青社”的骨干，也是每年“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聚会的积极分子。黄维则是外文系教授吴宓钟爱的学生，师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联大研究《石头记》(《红楼梦》) 的“石社”的核心人物。

二

不过，在许渊冲的记忆中，那时候联大校园里最大的政治便是“抗日”。1938年底，左派学生加入当地的金马剧社，排演了多幕剧《祖国》，由联大教授陈铨改编，讲述无私的教授带领学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祖国》演出时，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们自发地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

而教授们在上课时，也经常与现实联系。历史系教授皮名举上必修的西洋通史课时，讲到英法百年战争，鼓励背井离乡的学生们说，英国开始打胜仗，但无论打多少胜仗，结果还是法国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无论日本占领了我们多少土地，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20岁的少年许

渊冲也坚信，无论日本人怎么轰炸，中国都不会屈服。

但是，如果人们因此相信联大的所有学生都热血沸腾地要求上前线去，那一定只是个传奇。事实上，从抗战开始，救国与求学，团结与自由，一直就是彼此矛盾的主题。南京陷落后，一位狂热的抗日分子对那些等待战争结束、拿着毕业文凭尽职尽责的学生极为蔑视：当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却忙着个人的文凭，假如国家亡了，你这张文凭也只能拿到“支那国”，去做“奴隶总管”了！他质问：“百万将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入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教育工作者则反对“战时教育”主导大学教育。梅贻琦决心要保存文脉：学生的使命便是完成学业，为民族复兴这个长远目标锻炼才智。1941 年 4 月，他在《清华校友通讯》里说，“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声，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此皆因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树建国之基……”之前，还在清华、北大和南开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时，政府的高级官员陈诚也劝告学生专注学业。他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有知识的人，临大的学生，是中国的国宝，是中国最后的希望。

不过，青年人的热血不是可以轻易凉却的，仍然有不少人坚持投笔从戎。临大时期，至少有 295 名学生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不少学生未

办任何手续就直接去了前线，这是联大抗战初期的第一次从军热潮。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

1935 考入清华外文系的查良铮，写下了这些宏大的诗句，要用“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这些堂皇的修辞，正是在中国初期挫败时，一代年轻人内在的情感所寄。

1941 年 7 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在上一年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他带着 68 架飞机、110 名飞行员、150 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回到中国。这支被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急需配备翻译人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了为期两个月的“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联大也动员学生担任翻译官，尤其是外文系学生。1941 年 10 月 4 日这天，吴宓在日记里写道：“研院助莫泮芹劝导外文系三四年级生往任美国航空员招待、翻译之职。”10 月 15 日，联大常委会决定，学生充任译员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

许渊冲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同学们的回应，并按照哲

学系教授冯友兰的“四境界”说给同学们贴上标签。有的同学囿于旧观念“好男不当兵”，宁肯休学也不愿意给美军当翻译官，这是自然境界；有的同学，比如吴琼，因生活艰困早已在图书馆半工半读，参军既可练习英文，挣得比大学教授还要高，这是功利境界；而像罗宗明这样的同学，本来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优渥，如今毅然放弃高薪从军，这是道德境界。他自己则在前三种境界之间徘徊不前，既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又因高中军训的经历，对军队生活深恶痛绝。但想到中学的几位同学参加空军，有人已经为国捐躯，可说是进入了天地境界。

于是，这位外文系最用功的学生也报名参军。最终，除了徐树淥、马稚甫，四年级的外文系男生全部投身军伍。

三

崇尚自由的学子们，很快便经历了一场考验。当四年级外文系的三十几个男生去翻译训练班报到时，一位军事委员会的接待者让大学生们很不舒服——他提醒大学生们，报到之后便要遵守纪律，不可以再像从前一样自由散漫。为此，黄维发起了一次民主商议，讨论是不是应该和系里以及训练班交涉，保证学生有回校听课的自由。有的同学提出，不同意的话，愿意去训练班的就去，不愿去的就不

上训练班了；有的同学反对，国家需要我们去做翻译，到底是两个月的课重要，还是做一年的翻译重要？最终责任派占了上风。

1941 年 11 月 3 日，译训班开始上课。

联大的一些教授也受邀担任训练班教员，赵九章讲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英国概况，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

至今，许渊冲仍津津乐道当年的一件骄傲事。那是训练班欢迎陈纳德上校，会上负责人黄仁霖致欢迎词，由一位同学翻译成英语。当他讲到“三民主义”时，那位同学不晓得如何翻译。黄仁霖直译为“民族、民权、民生”，陈纳德还是一头雾水，台下的许渊冲举手，大声说“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许渊冲回忆说，前后发生了两场游行，颇能看出联大自由散漫的风气，和当时一般学生的思想倾向。

先是 12 月 10 日，为了庆祝英美加入反法西斯抗日战争，译训班的全体同学兴冲冲地去游行，出乎意料的是，联大学生响应者寥寥。

紧接着《大公报》报道，随着日军进驻香港，知识分子试图逃离此地，有一架开往重庆的飞机载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太太宋霭龄的狗，却没有清华最著名的学者陈寅恪的一个座位。八天后，《大公报》刊登了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来信，其中指出，经过仔细调查，根本就没有“飞狗”这

件事。事实上，那只狗是美国飞行员的宠物。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学者易社强在1974年有了更权威的证明：对宋家颇为了解的《纽约客》记者项美丽告诉他，宋霭龄实际上非常讨厌毛茸茸的动物，绝不可能容忍一条狗和她待在一起。

但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腐败是爆炸性的话题，也是普通人对政府最为常见的指责。在中国通史课上，历史系教授吴晗把此事与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联系起来，斥责孔祥熙为“飞狗院长”。1942年1月6日，昆明街头发生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何兆武当时正是联大历史系学生，他回忆说，游行的同学都说“今天真痛快”！好像是出了一口怨气。国难期间民不聊生，却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多年的一口怨气。

“左倾的群社停止活动以后”，易社强说，“联大校园正从政治上的朦胧睡意中苏醒过来”。许渊冲、杜运燮他们当时未曾意识到，事情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作家林语堂形容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当老师和学生们在飞涨的物价中挣扎，精神上的悲观泄气迟早会反映到行动上来。而联大，是当时社会经济变迁的缩影。

翻译训练班的课程提前结束。1942年1月22日分配工作，许渊冲、杜运燮等外文系的同学们大都被分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

真做了翻译官，还挺神气。何兆武回忆说：“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

表……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许渊冲被分到航空大队机要秘书室，他的直接领导是机要秘书林文奎少校。林是清华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可谓文武双全。

而黄维由于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同空军上尉”（大部分同学是中尉）。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1941 年 12 月 23 日和 25 日，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中英两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中国将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缅北的英美军队。远征军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组成，由罗卓英和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官。

吴宓在 1941 年 12 月 26 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黄维来辞行，随四十七师（参考后来的日记，应为四十九师）赴缅甸。”浪漫主义的老师被触动，也动了从军的心思，“因之宓颇动壮心，欲自效为秘书、顾问之流，随第九集团军或第五军出国南征”，这个被爱情折磨的才子希望“以增阅历而洗郁愁。一般人，尤其女友如琼等，或将另眼视我也”。两天后，他又觉得自己的一生最大职责是“精神道德之探求及指导，此责任不宜抛弃也”，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外文系年轻的助教查良铮——他以“穆旦”这个笔名闻名于现代中国诗坛——这位天才诗人此时也饱受着失恋的痛苦。而他真的付诸行动，决心参加远征军。此前，他有过一次“长征”——他曾是 1938 年长沙临大湘黔滇旅行

团的一员。在历时 68 天的徒步旅行中，他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就把那词典的一部分丢掉。到达昆明时，那本词典已经所剩无几了，他的毅力赢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如今，他再次出征。

四

当许渊冲在昆明东南三公里外的航空军官学校机要秘书室里翻译情报时，黄维和穆旦则踏上了去缅甸的旅程。

滇缅路上，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仰光，抢购城市居民需要的紧俏货。国民政府里的官员也私下做了半个商人，借机倒卖物资。难怪通晓中国人情的联大外文系教授温德会如此批评中国人，“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黄维所在的第六军第四十九师首批进入缅甸，2 月初，主力集结于保山、芒市、大理等地，开始入缅。随后，第五军也相继进入缅甸。

在翻越国境线时，黄维和穆旦也一定目睹过联大校友，同为第六军翻译官的杨重野所看见的景象，公路两旁驻军哨卡上都有蒋中正题写的“戍卫边疆”四个大字，他们以

为国境森严，这里一定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后来兵败缅甸，方知在这西南边疆的千里国防线上，没有一处有国防工事，以致敌人长驱直入。若非怒江天险阻隔，不出十日，日军便可兵临昆明城下，或从西昌北上直取重庆。

一开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远征军指挥杜聿明相处还算融洽。史迪威的联络参谋王楚英还记得，3 月 11 日，史迪威带着蒋介石的手令来到缅甸，立即会见杜聿明，两人相谈甚欢，史迪威对左右说："我感到中国是一心在保卫缅甸的。杜聿明不错，战术很灵活，有旺盛的进攻精神。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但在随后的同古保卫战时，因双方力量悬殊，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命令，下令守军戴安澜的第二百师突围，于是史、杜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历史令人怅然，多少人的命运就此埋下伏笔。后来，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如是评价："缅甸北部的战争是一场几乎卡断中国咽喉的灾难，它还在刚组成的英国、中国和美国同盟军之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这场充满血腥的战争中，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盟军之间根本没有合作。"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黄仁宇《黄河青山》）。

1942 年 3 月 26 日，在昆明的吴宓接到了穆旦的信，得知远征军失利，穆旦在信中还提到英军腐败。此时，英军的实力和战绩的糟糕已传遍远征军。杨重野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中路我军和西路英军都发生了战斗，可是东线连枪声也没有。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连同蒋介石，谁也

没有到过第六军，也没听说过对第六军作过什么指示。可是日本人却处心积虑的盯着第六军，等待时机猛扑过来。当东线枪声响起时，也是中国远征军开始溃退时。

到 4 月 16 日，西路英军全线崩溃，退守中路中国军队后方的仁安羌，被后面追击的日军包围。七千名英军水源断绝，弹尽粮绝。杜聿明不得不放弃以聚歼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彬文纳会战”，派出孙立人的三十八师救援英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救出了被围的英军，有装甲部队、炮兵、骑兵和步兵共七千多人，还有被俘的英军、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

“仁安羌大捷”轰动英国，孙立人被英国女皇授予“帝国司令”勋章。此时，东线枪声响起。杨重野此时正在第六军军部，据他回忆，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频频发来急电，潜伏在同古的敌人攻势猛烈。后来，“士兵们被敌人战车冲散，避开公路，军官对士兵也失去控制，全师溃败。当日堡垒失守，师长陈勉吾下落不明”。

五

缅甸战火纷飞之时，在昆明的许渊冲则在绞尽脑汁地翻译情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把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交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和美军自己的情报，分

配三个中队的81架P-40飞机。虽然时速才400公里，P-40已经是当时飞行速度最快的飞机了。

多年之后，许渊冲仍然十分得意于自己获得了一枚“飞虎章”。他看到情报说，日本一艘军舰到达越南海防，登陆士兵多少人，飞机多少架进驻河内机场，觉得事关重大，赶紧报告林文奎秘书。林文奎在和四个参谋研究之后，认为日军可能会对昆明发动空袭，于是命令许渊冲火速将情报翻译成英文，派专车送他到陈纳德的指挥室。

次日，日本飞机果然轰炸昆明。飞虎队早有准备，不待敌机飞去市区上空投弹就进行截击。“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机枪扫射的啪啪声，”许渊冲在日记里写道，“只看到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浓烟，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从此，昆明很少遭到空袭。然而，飞虎大队也损失了几位飞行员。许渊冲写了一首诗并翻译成英文，纪念这些美国勇士。陈纳德写了一份英文战报，许渊冲连夜翻译，第二天由专机送往重庆，呈报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

多年之后，他曾沾沾自喜的这段经历，在批斗者的嘴里，却成了“帮助美帝国主义残害日本人民”。因为美国人不会念中文名字，每个译员都有一个编号，方便美军称呼。年轻的爱国者们未曾想到，此后，这个号码会变成“特务代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不过，那时候的许渊冲不会料及于此，他的工作不仅得到了上司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他在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

即使有些许情绪，那也是追求林同端不如愿的爱的轻愁而已。他的运气不错，上司也是目光远大。若逢联大有学术报告，林秘书会派专车送他回去听，然后向秘书室传达，以期提高军人们的素质。

他的同学黄维却没有这般幸运。1942 年 4 月 19 日，日军以一个师团从东路进攻，十几天就打垮了远征军的五个师，前进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切断了中路四个师的归国后路。黄维所在的第六军溃不成军，一路狂退。败军撤退，流血漂橹，人性之恶彰显无遗。

一位幸存者回忆说："归国途中，死亡相继，尸体遍野，幸存者身体虚弱，每日至多走 20 余里。手持木棍，背挎小包，衣衫褴褛，活像乞丐。"这与当日在"石社"与众同学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的风雅何啻天壤之别！参军原是血气所至，据同班女生甄露茜回忆，黄维饱经历练，竟造就了一个精神活泼体魄强健的青年。甄露茜也是第六军五十五师的随行翻译官，撤退时骑着骡子在水中跋涉，靠着难民们剩下的一点陈粮、野菜，才捡得了一条命。5 月中，她和黄维短暂相逢，相约同返昆明。

然而，6 月 17 日刚到澜沧江边，甄露茜才得知，就在一刻钟之前，黄维和他的爱马渡江时落入水中，被急流卷走。

六

穆旦虽然不曾丢掉性命，却度过了一段炼狱般的日子。他参军后被派到第五军工作，担任少校英文翻译官。日军占领蜡戍，直抵怒江，惠通桥被迫炸断，中路军的归国之路被切断。西路英军已经退归印度，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命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和属下的三个师西退印度。杜聿明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电请蒋介石，按蒋的命令北进，决心绕过北端的日军，向国境内撤退。

孙立人遵从司令长官的命令，率领三十八师只走了两百多公里，十几天后约7000人到了印度。而杜聿明下属的两百师穿越日军控制区时被伏击，师长戴安澜阵亡，走了四十余天，只有两千六百人回到怒江东岸。九十六师奉杜聿明的命令穿越东北的丛林峻岭，从怒江上游到滇西北，历时九十多天，幸存者只有两千多人。

杜聿明亲自率领的二十二师则向北进入了野人山区。这里是缅甸的最北方，再往北就是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山峦重叠，林莽如海，瘴疠横行，据说曾有野人出没，所以当地人称这块无人区为“野人山”。

一位随军女生回忆：

5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车辆，开始徒步进入

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给中断，全凭个人谋生。初时部队还能像蚂蚁队伍一般，一个接一个前进，几天后就渐渐分散，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了。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疲惫不堪……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李明华：《野人山余生记》）。

原始森林人烟绝迹，又逢雨季，粮药俱绝。杜聿明1959年在回忆录里如是描述：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成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24岁的穆旦双腿肿胀，迷失在胡康河谷。他的战马早已倒毙在路上，传令兵也牺牲了。没有粮食，甚至地上的水、溪里的水，因浸泡过死尸也不敢喝，他只能用树叶接些雨水来喝。一度断粮八天，经历过让人发疯的饥饿之后，穆旦从地狱中生还，五个月后到了印度。

更多人没有这般“幸运”。联大物理系的朱谌，这个声音洪亮为人热忱的年轻人，早在1938年参军，参加过昆仑关战役。1940年他考入联大，又在1941年底再次入伍。在野人山，他把粮食和药物和同伴们分享完后，又累又饿，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多年之后，他的同学仍然记得，朱谌颇有相声天赋，参加文艺晚会时，编排歪讲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引来满堂大笑。远征军第

五军军部、军部直属部队和二十二师，总人数一万五千人左右，最后到达印度的，只余三四千人。

这段真切而残酷的生命体验永远地改变了穆旦，对此，他不愿多讲。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他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后来，他把这些写进了诗歌。

1945 年 9 月，穆旦写下令人难忘的《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在绿叶后面 /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 / 它轻轻跟随。”那是令人恐怖的原始森林里动物的眼睛，那也是倒下去的兄弟们的眼睛。“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他在诗歌里，为那些永远留在野人山的士兵们建立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七

在印度，穆旦又差一点死去，长久的饥饿，使得人吃得过饱也足以致命。在加尔各答，他见到了好友杜运燮。杜运燮在担任了一年的翻译官后，又加入了驻印军，参加

了在兰迦的训练营，直至 1943 年回联大复学。这支军队后来打通了中印公路，把日本人打得从对攻到固守，从固守到节节败退。

至 1945 年，前后三次大的从军运动中，联大有八百余人入伍，加上临大时期，共有一千一百多人。这段军旅生涯，在许多联大学子此后的人生中如影随形，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起起伏伏。

据许渊冲回忆，一些翻译官随着美军去了美国，他自己则在这年的 7 月返回校园。飞虎队被编入了美军部队，林文奎秘书调任成都空军总司令部，他很希望许渊冲同去。但许渊冲的兴趣仍在学业上，兼之梅贻琦来视察联大学生翻译官时，曾亲自到秘书室看望他，鼓励他合同完成后，要继续回校学习一年，才可以毕业。

8 月 23 日，他参加了外文系为黄维开的追悼会，地点就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译员训练班。深情而浪漫的老师吴宓在会上回忆这个学生在文学上的非凡才华时，伤痛再次袭来。在外文系 38 级同学（包含 1939 年的借读生）心中，联大参军学子中的第一位牺牲者黄维，永远活在吴宓亲撰的那副挽联之中："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

这段从戎生涯也让联大学生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甄露茜在第六军中服役时目睹了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无能：军官一心享乐，随行带着咖啡可可、网球拍、留声机等，每到一地，都征用当地最豪华的住宅，搜

求当地的美女自娱。打起仗来，师长、团长远居后方，不上前线；撤退时，军官们用汽车满载物资急归，却把伤病员弃置路旁听天由命。而新招来补充第六军的士兵，为了免于出征，竟有不少人不惜跳入河中求死。多年后，人们才晓得，这些已成为中国内部分崩离析的推动力，也让中国在盟友眼中从受伤的白雪公主变成邪恶的老巫婆。

对于诗人穆旦和杜运燮，战争开拓了他们的精神视野。当死亡成为瞬间之事，个人反而从中解放。他们因此可以抛开先验的政治立场，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生存感觉和体验来认识世界。穆旦写下了《森林之歌》，杜运燮也写出了《滇缅公路》。

他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所以，传统文化中的担当道义和西方的自由独立融合得自然生动。在他们身上，看不见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分裂和纠结。至今，许渊冲仍可以流利地背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他们也相信自由为联大带来了成功，在同学王佐良的眼里，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

然而，他们注定是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联大外文系的教授诗人冯至曾经骄傲地宣称：“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我们的时代》）。

1949 年之后，穆旦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面对一个新鲜又陌生的祖国，他谨慎地停止了诗

歌创作。饶是如此，1954年，他因参加远征军的这段历史，被作为“肃反运动”中的“肃反对象”。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危机，诗人在1957年写下了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

然而，这种自我撕裂、了断灵魂的写作并未带来预想中的效果。他被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杜运燮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地躲过了前几场运动。1970年，作为马来西亚归侨和前国民党军翻译官，被认为“历史和社会关系很复杂”，全家被送往山西永济的干校。几个月后，他被强迫从新华社退职，成为侯马一个公社的农民。

从巴黎大学留学归来的许渊冲，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50年代，因为这段从军经历，他也被审查，幸亏夫人是14岁便参加解放军的老革命，才幸免成为“右派”。

然而一俟形势好转，许渊冲便开始了堪称狂热的翻译工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把唐宋诗词翻译成英文法文，把《诗经》、《楚辞》、《西厢记》翻译成英文，也把《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等西方名著翻译成中文。而穆旦待境况稍稍好转，就想着“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

人生意义”。从此，他便把精力放在翻译普希金、拜伦和雪莱的诗作上。

杜运燮在1979年恢复原职之后，仍然笔耕不辍，同时为老友穆旦编辑诗集，让这位伟大的诗人再次“复活”。

如今，90岁的许渊冲继续在他的斗室里玩味翻译的魅力，风与云在他的手指下飞驰而过。他的大部分同学已凋零作古，在有生之年，他们是教授、翻译家和诗人。

1926年，吴宓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定下了目标：“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汇通东西方之精神而互为介绍传布。”

许渊冲和他的同学们，堪称联大（清华）外文系教育的典范。